

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论战

关于恩格斯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争论和评论

季丰 韩文臣 闻文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论战

——关于恩格斯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争论和评论

季丰 韩文臣 闻文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 新登字028号

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论战

——关于恩格斯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争论和评论

季丰 韩文臣 闻文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

850×1168 1/32开本 9.625印张 244千字

印数0001—1000

1995年7月第一版 1995年7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576-6/D·133 定价: 14.6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1895年2—3月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是恩格斯一生最后一篇重要的政治论文，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作了全面的论述。《导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引起极大的反响。长期以来，国外一些党的代表人物和学者们围绕着它发表了种种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这些不同看法，其中包括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有意歪曲和因为对恩格斯写《导言》的背景了解不够，研究不够而产生的片面见解。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由此可见，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导言》中所论述的基本思想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书收集了国外有关这篇《导言》的资料，包括恩格斯发表《导言》前后的经过，以及从那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七八十年间许多有代表性的人物发表的评论。通过这些材料，对恩格斯写《导言》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精神，对围绕《导言》的几次论战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论点，都可以有较全面的了解。本书不仅为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中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对恩格斯《导言》中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思想有较正确的理解。只有正确理解革命导师的著作中的思想，才能学到他们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增强我们对事物的分辨能力，学会科学的处事方法。学习恩格斯《导言》中论述的革命策略思想，将给我们智慧和力量。

*

*

*

本书开头是恩格斯《导言》全文。恩格斯撰写《导言》的年代正

值德国工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德国已成为真正的第一流工业国，随着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大工业无产阶级都有了新的发展，已被推到社会发展的前台。无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觉悟日益提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已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恩格斯估计革命可能就在十九世纪末发生，同时，他看到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社会条件的变化，以及威力强大的武器的采用，认为必须考虑制订新的革命策略，以适应新的形势，迎接将要到来的革命。恩格斯在九十年代初的一些文章和书信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策略作过论述，例如，《德国1890年的选举》、《今后怎样呢？》、《德国的社会主义》、《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读者的告别信》等等，而《导言》对这方面的问题的阐述更为系统，也可说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总结。

《导言》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前进报》出版社的负责人理查·费舍的请求而写的。1895年1月费舍在翻阅旧报纸时，看到马克思于1850年刊登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的三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和《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他想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小册子，于是写信给恩格斯，征求他同意，并请他为小册子写一篇导言。这正符合恩格斯的心愿，因为他早就希望出版1851年以前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认为这些作品有重大的价值，便接受了费舍的建议。恩格斯对马克思这三篇文章第一次发表的文本重新作了校订，增添了马克思和他写的《国际述评(三)》^①中有关法国的部分，作为第四章，并将小册子题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本书除《导言》外，共分五个部分。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页和第520—531页。

第一部分收集了《导言》发表前恩格斯与同时代人的有关书信以及当时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这些材料主要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同恩格斯磋商修改《导言》的实际情况。当时正是讨论德国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的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时候，这对社会民主党是一大威胁。恩格斯在写《导言》时，已经考虑到这种情况。但是《导言》写成以后，一开始就未能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完全接受，费舍代表执委会于1895年3月6日写信给恩格斯表示对《导言》中的某些段落有些“担忧”，认为在有可能通过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情况下，《导言》中某些段落很容易被敌人所利用，这是必须力求避免的，因此请恩格斯接受他们随信附去的修改方案，主要是要求删改有关暴力斗争的部分。当时恩格斯身居国外(英国)，考虑到国内同志的处境，对他们提出的意见不能不尊重。他在保持《导言》革命性的基础上，采纳了他们大部分的建议。他在3月8日的复信中表示他尽可能考虑到党执委会的“担忧”，除了几点以外，他接受了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他说：“我绝不会再多走一步！为了减少你们在辩论期间的烦恼，我已尽了我最大努力。”但恩格斯对执委会的“担忧”表示不甚理解，他批评他们说：“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并告诫他们不可效法《前进报》有时以过去宣传革命的那种劲头来否定革命。恩格斯3月8日的这封信的原件一直没有找到。1965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已故的德国部主任维尔纳·布卢门贝格发现了这封信的打字稿，他没有来得及发表此信全文就去世了，只是在他的文章中引用过其中的若干段落。直到1967年此信全文才由联邦德国的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格博士第一次发表在《国际社会史评论》第12年卷第2册的《革命和合法性》一文中。这封信十分有助于理解恩格斯在《导言》中所表述的思想。恩格斯在1895年3月25日给卡尔·考茨基和3月28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里也都谈到执委会这种“担忧”是过分了，并认为《导言》经过修改，“受到了

一些损害”。3月11日和14日倍倍尔和费舍先后给恩格斯写信为执委会解释，说他们谁也没有想“立誓忠于绝对守法”和“宣扬放弃暴力行为”。倍倍尔在信中还谈了他对德国形势的看法，他说：

“如果你相信草案(指防止政变法草案——编者)已被否决，那你也错了，报纸上所写的那些东西，全是胡扯，政府并没有撤回草案的想法。”

接着，3月30日《前进报》发表了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从已经过恩格斯同意删改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若干段落，而且把谈到革命权这一段最重要的部分删去了，而这在事先并未征求恩格斯本人同意。恩格斯对这篇社论感到十分气愤，认为社论把他歪曲成“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前进报》出现这样的问题，作为该报主编的威·李卜克内西当然负有责任，而且这同他当时的思想倾向有关。恩格斯在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和4月3日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都表示了因这件事对李卜克内西的不满，而且他强调：“我谈的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他特别希望《导言》能在《新时代》上全文发表，以消除这个可耻的印象，1895年4月考茨基在《新时代》(见第13年卷第2册第27和第28期)上先于预定出版的小册子发表了恩格斯的《导言》全文。这里所说的全文当然是指恩格斯同意删改后的《导言》全文。

以上材料说明，恩格斯同德国党的领导人对当时德国的形势的估计和应采取的策略的看法是有一定距离的。

第二部分收集了恩格斯逝世后爱德华·伯恩施坦挑起争论这一阶段有关《导言》的材料。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公开发表修正主义观点，引起党内不少人的反对，他们要求在1898年10月召开的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批判伯恩施坦的错误观点。伯恩施坦当时在伦敦，未能出席大会，他于9月先寄去了《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在声明中他仍然坚持他的

修正主义观点，竭力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恩格斯写的这篇《导言》。他说，恩格斯写《导言》时“深信以灾变（实际上是指革命——编者）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说恩格斯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殊途同归的”。接着，1899年伯恩施坦在他那本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又暗示恩格斯的《导言》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最强烈反对伯恩施坦的是刚加入德国工人运动队伍的波兰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她在1898年9月21—28日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论文的第一部分，批判伯恩施坦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一系列文章，1899年4月4—8日又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论文的第二部分，着重批判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其中也驳斥伯恩施坦对《导言》的歪曲。她认为恩格斯的《导言》论述的不是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在夺取政权以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框内无产阶级应如何行动的问题。

考茨基差不多同时在《新时代》上（第17年卷第2册第28期）发表《伯恩施坦和辩证法》一文，对伯恩施坦进行驳斥，他明确提出，“恩格斯始终还是原来的那个老革命家”，文中援引恩格斯1891年写的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和《德国的社会主义》两篇文章，说明这些文章同《导言》中阐述的“革命权是唯一真正历史权利”的思想是一致的。考茨基在这篇文章中透露了《导言》原稿被删改的事。他说，《导言》的这种思想表述得不那么明确，这个责任不在恩格斯，而在那些强求恩格斯删去结尾部分（实际上并不是文章的结尾被删节，而是在文章中间删改了一些句子或段落——编者）的德国朋友，因为他们认为这部分“太革命了”，“没有那部分结尾也够清楚的了，但是显然情况并不是这样。”他要求掌握恩格斯遗稿的伯恩施坦把删节部分公布出来。对此，伯恩施坦立即发表了一篇题名《辩证法和发展》的文章来

回答。他一方面表示他不知道有此结尾，手头也没有这份遗稿，另一方面继续宣扬他的修正主义观点，说什么“革命权”是人们事实上已经搁置起来的事，重提“革命权”“是一种给假花浇水的做法”。

在这一个时期，格·瓦·普列汉诺夫写有一系列批判伯恩斯坦的著作。1900年他为《共产党宣言》的俄文新译本写了一篇序言，题名《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其中也批判伯恩斯坦对《导言》的歪曲。他指出恩格斯建议避免暴力行动，利用合法手段坚持和平斗争是从当时德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他“不是一般地指责暴力行动，而只是指责为时过早的暴力行动，因此，这和那些无论如何也要‘和平发展’的卫道者们的论据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他并认为恩格斯的观点虽然有了“相当”的改变，但这同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采取的暴力行动并不发生任何矛盾，恩格斯“只不过说明了为使这种行动获得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列宁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伯恩斯坦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他于1901年在《火星报》上发表题为《新的激战》一文中也直接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对《导言》的歪曲。他结合1901年5月彼得堡奥布霍夫工厂工人同军警进行暴力斗争的事件，驳斥那些“批评家”对恩格斯的《导言》中所论述的策略思想的歪曲，肯定了同现代化军队进行巷战是可能的。他指出：“其实恩格斯当时所谈的（而是有保留的）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暂时的策略。”

1909年考茨基写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摘要发表了恩格斯于1895年3月25日和4月2日给他的两封信。两封信的摘要只透露了当时德国党领导同恩格斯磋商删改《导言》的部分情况。恩格斯《导言》原稿被删节的部分和他3月8日给费舍的那封最能说明恩格斯当时态度的信，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始终没有发表。倍倍尔在他写的1911年出版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文版单行本的序言中对《导言》删节的问题一字未提。这本小册子里的恩格斯

《导言》同1895年第一次出版的文本几乎完全一样。

1918年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再次谈到恩格斯的这篇《导言》。她对删改《导言》的详细情况是不知道的，只是根据考茨基发表的材料和当时德国党的情况来判断。她说，恩格斯的《导言》是“在当时国会党团的直接压力下写出来的”，她认为，在九十年代初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工人运动中有一股左倾激进主义思潮，倍倍尔等同志为了借助于我们导师的权威来消除这股思潮对广大群众的影响，挽救工人运动不致误入无政府主义的迷途，所以要求恩格斯写了那篇《导言》，而《导言》中街巷革命过时的观点在德国党内起了作用，这不如说是“扼杀了这个党”，如果恩格斯看到“单纯议会主义”的过分做法，会第一个起来反对的。

某些社会主义者对恩格斯的《导言》没有正确的理解，有的人曾认为晚年的恩格斯是议会主义者。例如，德国社会主义者麦克斯·比尔在1922年第4期《劳工月刊》上发表的《恩格斯的遗嘱》一文中就说，这篇导言“是充满了改良主义的”，他的名著《社会主义和社会斗争通史》1924年的德文版中还写着恩格斯在晚年的“社会主义观点是改良主义的和议会主义的”（见该书第461页）。但是这本书在1929年的版本中和法文1931年的版本中对恩格斯都没有这类的评论。这说明他改变了过去的观点。

伯恩施坦为了否定革命，把恩格斯在《导言》中所说的针对德国当时的情况所采取的暂时的革命策略，歪曲为绝对的唯一的策略。如果在这点上观点模糊，就不能正确理解恩格斯的策略思想。

第三部分的材料是反映《导言》原稿中被删节部分全部发表后引起新的争论的情况。1924年达·波·梁赞诺夫在伯恩施坦转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文件中找到了恩格斯这篇《导言》的手稿。当年，他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一卷中发表了《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这篇文章在莫斯科

出版的德文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5年第1期上也发表了),他根据《导言》的手稿和校样把所有1895年发表时被删改的地方都作了介绍。这才使人们第一次了解到《导言》中被删改的全部内容。梁赞诺夫十分强调《导言》被删去部分中谈到的街垒战,并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没有发表恩格斯的《导言》全文。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对梁赞诺夫的一些看法进行驳斥。这里收集了费舍为1925年德文版《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和考茨基发表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斗争》1925年第12期上的《恩格斯的政治遗嘱》。费舍否认《导言》删改是背着恩格斯干的,并且认为“在一个政治上没有自由的国家,为了传播这样一本著作,有时甚至作者本人不知道,而且也许违背作者的意愿作出一些删改”,这也是常有的事。从考茨基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在刊登梁赞诺夫这篇文章的这一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编辑部写了一篇序言(我们没有收集到这篇序言),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了严厉的批判,而且对梁赞诺夫的文章加了脚注(见本书第112—113页),说《导言》是经过伯恩施坦的篡改歪曲后发表的,等等。考茨基对此十分不满,指责编辑部把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导言》文本同《前进报》的摘录混为一谈,还把不相干的人也扯进来了,并且驳斥梁赞诺夫关于《导言》中一部分删改是党内书报检查机关干的这一说法。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收集的材料看,考茨基所说的这些情况基本上符合实际的。但是,他在文章中一味强调合法斗争,把《导言》说成是“现在和今后都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强有力的论证和辩护,是对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坚决批判”,并且说:“即使把在1895年的《导言》中被删掉的地方补充进去,也丝毫改变不了任何情况。”这也反映了他当时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的立场。

此外,在梁赞诺夫的文章发表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同美国工人党(后来改称美国共产党)围绕《导言》展开了争论。1925

年11月，美国工人党的机关刊物《工人月刊》发表了亚·特拉赫坦伯格写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一文，谈到梁赞诺夫发现恩格斯《导言》原稿的事，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删节《导言》是对恩格斯思想的歪曲，并且发表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24年根据《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小册子中的《导言》翻译的英译文和1920年《前进报》发行的德文小册子中的《导言》，两种文本都插进了梁赞诺夫发表的《导言》删节部分（《工人月刊》上的文章，我们没有收集到）。这就引起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同美国工人党之间的争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观点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相似，认为被删节的是重复恩格斯已经说过的话，是恩格斯自己在校订手稿时删改的。它的矛头不仅仅是针对工人党，而且还谴责了同工人党持相同观点的英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费舍、考茨基同梁赞诺夫的争论以及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同美国工人党的争论，除了因对删改《导言》的具体情况不了解而造成的误会外，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在暴力斗争和和平斗争的问题上立场不同。争论的一方强调街垒战和暴力手段已经过时。另一方则持相反的观点。

第四部分是三十年代对《导言》的争论和评论，其中主要是英国共产党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争论文章。这场争论是英国共产党副主席R·帕·杜德在1933年3月号的《劳工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十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起的。杜德在文章中强调的是武装斗争，他说，恩格斯“以大师之笔勾划出了革命斗争的未来，在合法的外衣下逐渐积聚工人的队伍，引向最后的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并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删节《导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歪曲。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此文章进行驳斥，写了一篇题名《更大的歪曲》的文章，刊登在《人民周刊》上，其观点基本上重复他们1926年的说法，强调武装斗争已经过时，并再次刊载了1926年《人民周刊》上曾经发表

过的《谁是歪曲者?》的一组文章(见第三部分)。杜德于12月写了一篇《对歪曲恩格斯〈导言〉的评论》，详尽地驳斥了对方的观点。他认为，《导言》被删节的部分是至关重要的，他说，1895年3月《前进报》刊登《导言》摘录是对《导言》第一次歪曲：伯恩施坦利用《导言》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修正为资产阶级民主合法主义，这是第二次歪曲；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在原来曾用以证明进行临时删节有理由的那种情况已经过去以后，仍然继续发表被删节的本文，这是第三次歪曲。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同英国共产党的争论焦点仍然是暴力斗争和平斗争的问题，也可说是二十年代那场争论的余波。

除此以外，还有著名的德国进步史学家古·迈尔于1934年写的《弗·恩格斯传》中论述《导言》的部分。他的评论比较客观。

三十年代任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的弗·维·阿多拉茨基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十六卷说明，几乎全篇都是论述恩格斯这篇《导言》的。他的观点同梁赞诺夫基本相同，并结合俄国十月革命，说明了合法斗争同武装斗争的关系。

第五部分收集了当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外学者和一些政党代表人物对《导言》的评论。这个时期虽然围绕《导言》的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已经平息，但是仍然有各种不同的评论。这里只是重点地作一些介绍。

伯恩施坦把《导言》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种荒谬论调，至今在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中仍有影响。例如联邦德国的克·格诺伊斯在1957年的《争取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一文中说，恩格斯的这篇《导言》中有“修正主义理论的萌芽”，他的思想和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理论非常接近，等等。又例如美国的诺·莱文在他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中，评论恩格斯《导言》

中的思想时说，恩格斯把选举胜利取代实际革命策略，确实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还说，恩格斯的议会政策，为修正主义敞开了他自己也准备通过的大门。

苏联这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即起初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文章，对《导言》被删节看法，有一些变化。例如，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的两卷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中对《导言》所加题注的基本倾向，同1924年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的文章，和1936年该院院长阿多拉茨基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说明相似。它笼统指责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为机会主义者，批评他们粗暴歪曲《导言》，并“企图利用这篇论文残缺不全的部分来为自己的机会主义政策辩护”。而196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2卷中，对《导言》所作的题注，比较详细而客观地叙述了德国党领导人同恩格斯就删改《导言》的问题磋商的过程，而且把德国党个别领导人及《前进报》的错误同整个领导区分开。它仅仅批评社会民主党领导在德国不存在颁布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危险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发表《导言》全文，并且认为“即使经删节后发表的《导言》还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质。要用改良主义精神来解释这个文件，就必须粗暴地伪造恩格斯的观点”，就象伯恩施坦以及其他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七十年代苏联发表的文章中对《导言》删改的看法基本上与此相类似，例如，1977年出版的列·伊利切夫主编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本传记中对这方面的论述也比较客观，其基本倾向也没有什么改变。

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海·格姆科夫主编的《恩格斯传》中叙述《导言》的删改问题也是比较客观的；对合法斗争和非合法斗争、和平斗争和非和平斗争、争取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比较清楚。他说，恩格斯令人信服地证明，为什么策略方法和斗争方式的选择，总是以具体的历史情况为转移。

个别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都是从他们本国本党的情况出发来评论《导言》的。例如，西班牙共产党的前总书记圣·卡里略结合欧洲当时形势，强调通过普选取得政权。他说：“今天的欧洲，社会主义力量可以通过普选首先进入政府，然后执政……。”日本共产党的理论家不破哲三从少数人革命和多数人革命这个问题的角度评论《导言》。他说：“我认为这篇《导言》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恩格斯不管革命的形式如何，把通过多数人民自觉的集结而进行的多数人革命，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规律提到了首位。”联邦德国的前总理、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勃兰特的评论强调的是民主选举。

此外，联邦德国的学者汉·约·施泰因贝尔格所写的《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恩格斯的革命战略》一文所提供的史料比较丰富，很有参考价值。他对《导言》有较多研究，他发表过题为《革命和合法性》的文章，1895年3月8日恩格斯给费舍的这封重要书信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全文发表的。

* * *

本书收入的恩格斯的《导言》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是根据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的译文。其他文章一律按发表时间顺序编排。有些已有译文的文章，在收入本书时，也作了个别修改。作者的简介都编入书后的人名索引，因缺乏资料，对其中一些人只好从略。

本书编者虽力求把有关《导言》的重要文章都收集齐全，但因条件的限制，难免有所遗漏。此外，收入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首次译成中文，译文如有不当之处，尚望读者指正。

目 录

序言	(1)
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 书导言	(1)

第 一 部 分

《导言》发表前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5年2月26日)	(27)
理查·费舍致恩格斯(1895年3月6日)	(30)
恩格斯致理查·费舍(1895年3月8日)	(32)
奥古斯特·倍倍尔致恩格斯(1895年3月11日)	(36)
理查·费舍致恩格斯(1895年3月14日)	(39)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5年3月25日)	(41)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5年3月28日)	(42)
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社论) ...	(43)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5年4月1日)	(50)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5年4月3日)	(51)

第 二 部 分

恩格斯逝世后爱德华·伯恩施坦

挑起的对《导言》的争论

爱德华·伯恩施坦：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斯图加特代表大 会的书面声明(1898年9月29日)	(55)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	(58)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年9月)	(60)
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和辩证法	(63)

爱德华·伯恩斯坦：辩证法和发展(1899年6月)	(66)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阶级斗争学说 的最初阶段(《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1900年)	(69)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新的激战(1901年6月)	(77)
卡尔·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年)	(78)
奥古斯特·倍倍尔：《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	(88)
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 12月30日)	(93)
麦克斯·比尔：恩格斯的遗嘱	(100)

第三部分

《导言》被删节部分全部发表后引起的新争论

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恩格斯的《法兰西阶 级斗争》导言(札记)(1924年)	(105)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对梁赞诺夫文章的题注 ...	(112)
理查·费舍：《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	(114)
卡尔·考茨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1925年)	(116)
亨利·库恩：谁是歪曲者？	(129)
既是笨蛋又是歪曲者(1926年8月6日《人民周刊》社论)	(134)
奥利夫·M·约翰逊：既是歪曲者又是伪善者	(138)

第四部分

三十年代对《导言》的争论和评论

R·帕姆·杜德：五十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143)
L·科坦：更大的歪曲	(148)
R·帕姆·杜德：对歪曲恩格斯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 斗争〉导言》的评论	(156)
古斯塔夫·迈尔：最后的五年	(166)
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阿多拉茨基：《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十六卷第二册说明	(172)

第五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外有关
《导言》的评论

-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
-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题注……………(179)
- 克里斯蒂安·格诺伊斯：论理论和实践的一致——爱德
华·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181)
- 普勒德拉格·弗兰尼茨基：几个发展阶段……………(188)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二卷恩
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题注……………(191)
- Б·А·查钦：九十年代恩格斯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反对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倾向的斗
争……………(194)
- Б·Г·塔尔塔科夫斯基：最后的几年……………(197)
- 米歇尔·佩罗特：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权问题……………(199)
- 维利·勃兰特：恩格斯和社会民主党(1970年11月27日在
乌培河谷恩格斯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205)
- 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格：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恩格
斯的革命战略……………(208)
-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新时代的预兆(1972年)……………(227)
- 山本统敏：恩格斯的“政治遗嘱”……………(232)
- 诺尔曼·莱文：科学社会主义是国家救世主义……………(236)
-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等：反机会主义斗
争中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42)
- 不破哲三：自由和人民主权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
和现代革命……………(245)
-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伊利切夫等：《法兰西阶级斗
争》导言……………(251)
- 戴维·麦克莱兰：政治方面……………(260)

圣地亚哥·卡里略：对普选估价方面的修正·····	(264)
奥西普·K·弗莱西泰因：恩格斯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	(269)
淡路宪治：关于《导言》争论的经过——结束语·····	(273)
人名索引·····	(277)

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1〕}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时期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经有相应的专业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连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逐日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从而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随时作出一般性的总结，更何况，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还没有突然有力地显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长时期处于隐蔽作用状态。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观，决不能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

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作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难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所面临的种种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

当马克思着手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无能为力。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1849—1850年的秋冬，情况也是一样。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撰写本书。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马克思由于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对当时的事变作出的叙述，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能达到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

第一次检验是这样的：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空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是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生身母亲；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前三篇论文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2〕}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在期待革命力量新高潮不久就会到来，那么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月），就

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是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①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作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续评就表明了这点。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评作为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检验更为严格。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从1848年2月起直到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为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版，^②）185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谈到了本书中所描述的时期，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作出的第二次记述与本书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只需作很少的改动。

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第二章中，讲到被称作“初次概述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但是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而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③可见，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扩大到占有交换手段上，那末这种扩大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1卷，第488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598—703页。——原编者注

③ 同上书，第426页。——编者注

出的结论罢了，况且，按《共产党宣言》来看，这种扩大是不言而喻的。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交给社会。这些先生大概很难说清楚，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森林地^[3]及其他捐赠在内的贫民救济。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即归了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正是我们想要废除的。

*

*

*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为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的作用，而现在又是它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暴动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第一次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在国外^[4]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一举彻底打败“压迫者”，我们却估计到在铲除“压迫者”之后，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彼此之间会进行长时期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经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因为这个

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关照，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实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一个统治的少数这样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撇开每一次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态度，于是，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

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得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或表面的利益的。在个别场合，这些比较激进的要求也曾实现过，不过往往都只是瞬间的，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了上风，刚取得的成果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呼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大多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一旦达到这一点，从而得到眼前需要的东西，激

进派及其成就又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就连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白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然而终究有了运动，有了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虽然这次革命是由少数人领导的，但这一次已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拚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那么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正好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了他们自己还没有理解到、而只是刚刚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很快就变为心灰意冷，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现在，问题不是要欺蒙，而是要实现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当时还根本没有为这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亲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识。并且，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经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而另一方面，却使所有的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以致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已经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有了经验教训已经变得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革命变成多数人革命的前景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

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以外只在巴黎以及充其量是几个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及全欧洲，并且达到了1848年难以想象的猛烈程度。那时有的是许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那时候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纪律、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5]，但是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太平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这就始终存在突发暴力事件的威胁，而这种突发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任何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好象专为第三者，即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追求者路易·波拿巴举行行政变造成的良机。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内部的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6]。从下面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向帝制的倒退，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愿望还不成熟。但是向帝制倒退本身必定会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愿望成熟起来的条件。内部安宁为充分发展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需要把革命潮流转移，使之对外，结果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让“民族原则”^[7]发挥有利作用，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效尤者俾斯麦，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俾斯麦实行了他自己的政变，在1866年，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同样也对那个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院，实行了一个从上面进行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疆界是·小了点，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纠纷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而在他们旁边则已经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令人生畏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8]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于是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险恶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这再次表明，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经不可能了。在胜利后，统治权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这又表明，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二十年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

面，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使公社本身发生分裂，其中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没有结果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的送上来的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人都应召编入人数以百万计的军队，以及威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全面的变革，从而一方面使得空前酷烈而结局绝对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其他战争都成为不可能，这样就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它使得军费按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敌对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它却成了两国工人的新的联系纽带。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目前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的数十亿^[9]，简直象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则更加迅猛和持续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 000张，1874年为352 000张，1877年为493 000张。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10]高度赞扬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 000张。但是这种状况就很快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

长：1884年为550 000张，1887年为763 000张，1890年为1 427 000张。于是，国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没有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 787 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夜人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被看不起的工人那里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数以百万计。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起程。

但是，德国工人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头一个重大的贡献，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老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在那里因为被波拿巴政府滥用而声名狼藉。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的^{〔11〕}，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所有严肃的反对党的通则。瑞士实施普选权的结果，恰恰最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族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作陷阱，看作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促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12〕}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

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能估量我们行动分寸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退缩，又可避免不适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非常非常足够了。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的独一无二的手段，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的宣传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么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就是说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对起义者

而言，关键在于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而这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会有任何作用、或者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如果做不到，那就证明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但由于装备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兵力调度得当和遵守纪律等长处，起义在实际战术行动中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熟练地构筑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支援、后备力量的配置或使用，即各分队的互相配合和协同动作，在防卫一个市区时已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了，但这在起义的场合却多半根本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是漏洞百出；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自然就谈不上了。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消极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攻势，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装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兵，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战斗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累斯顿，——一当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政治上的考虑而按纯粹军事观点采取行动，并且手下的士兵仍属可靠的时候，就都以起义失败而告终。

1848年以前起义多次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都站着市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向起义者，或者是因采取冷漠的犹疑不决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它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种市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总是遭受失败。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到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命令下达迟缓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执行命令，

由于指挥官优柔寡断，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可见，即使在盛行巷战的时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坚持不到，就遭受失败。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①。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政府方面去了；“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经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作“人民”，而是把他们看作叛逆者、扰乱分子、抢掠者、分肥分子、社会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形式：他们已不是毫无掩蔽地径直冲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穿过花园、庭院和房屋迂回前进。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用得巧妙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得手。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都对军队有利。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而军队就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还没有增长到四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到四倍以上。有了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一支大军。这种人数大量增加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击发式前装滑膛枪，现在是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它的射程是旧式枪的四倍，准确性和射速则是十倍。先前大炮发射的，是威力不大的球形弹和霰弹，现在则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原编者注

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而使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就是说“人民”看来将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在1848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役的兵士，那么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豪华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在近距离的射击中也远比不上士兵的弹仓枪。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造出所需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的子弹都各不相同，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用的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废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象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今后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样多的兵力，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13]那样，到时候恐怕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①。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鸣剑啸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贸然走上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这一段被删去。——原编者注

坚决恳求我们最后一定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徒然地在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这么笨。他们也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同样要求敌人，把军队排列成老弗里茨式^①的横队，或是排列成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14]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持燧发枪。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他们自己就会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②。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在罗曼语族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③。在法国，虽然在一百多年以来地基已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掏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采取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不信赖军队，一般说来，环境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民中的广大群众——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

① 弗里德里希二世。——原编者注

②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原编者注

③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这句话被删去。——原编者注

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经有五十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经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15〕}，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经一致认定再不能继续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即小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算在内，那里的贵族革命是1755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而告终的。^{〔16〕}革命权已经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甚至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引伸出要求给自己的皇帝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也就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却拥护他们的那些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已经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加，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不可遏止的，并且是平稳的，正如自然界中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对此进行的一切干预，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赢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

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①。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个时期内倒退：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象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假以时日这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成员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弹仓枪都做不到。但是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使得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②就会推迟、延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17]，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面带红光，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颠覆。又是一切都颠倒了。难道今天疯狂的反颠覆的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们引起了1866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要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原编者注

②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本文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使得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战斗”印成“解决”。——原编者注

候、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18〕不正是这些颠覆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在那里埋怨颠覆吗？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① 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骂颠覆呢？

他们尽可以去通过他们的反颠覆的法案，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把全部刑法都变成一块可以随便捏的橡皮，但是，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他们要想认真地对付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采取完全另外的办法。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而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颠覆，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的颠覆，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颠覆。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给他们指明了也许能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骗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君主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那就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同一切小国家，也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是一种**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整个契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示范过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②。

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有一个危险的颠覆派活动过。这一派人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他们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法律，他们没有祖国，是国际性的；他们散布

① 尤维纳利斯的第二首讽刺诗。——原编者注

②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原编者注

在全帝国，从高卢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他们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但是他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感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应该公开活动了。这个叫作基督徒的颠覆派，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整个的军团都信奉基督教。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非基督教的国教会的祭典礼仪时，颠覆派的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标志——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惩戒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社会党人法，请原谅，我是想说反基督徒法。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或者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正像在萨克森禁止红手帕一样。基督徒不得担任公职，他们甚至不能当上等兵。由于当时还没有在“徇私”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这种为冯·克勒尔先生的那个反颠覆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干脆被禁止到法庭上寻求公道。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它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底亚放火烧毁了皇帝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来进行报复。这也就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则宣布基督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于伦敦

注 释

- 〔1〕《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 主编是马克思, 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 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 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 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 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 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 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 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 《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 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 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 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受迫害, 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 《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 “无论何时何地, 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 工人阶级的解放!”——第1页。

- 〔2〕《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 ökonomische Revue》)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 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 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 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 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 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 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

停办——第2页。

〔3〕 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为汉堡附近的地产萨克森森林——第4页。

〔4〕 *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词来指完全不顾国内实际情况而在外国成立的各种流亡政府——第4页。

〔5〕 指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

正统派是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两个保皇集团组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第7页。

〔6〕 在拿破仑第三统治时代，法国参加了克里木战争(1854—1855)，为意大利问题发动了对奥战争(1859)，和英国一起参加了对华侵略战争(1856—1858和1860)，开始侵占印度支那，策划了对叙利亚(1860—1861)和墨西哥的远征(1862—1867)，最后，1870—1871年间对普鲁士进行了战争——第8页。

〔7〕 恩格斯指的是第二帝国当权派提出的所谓“民族原则”，他们普遍地利用它来从思想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拿破仑第三冒充自己是“民族的卫护者”，利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巩固法国的领导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揭露，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第八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6—587页)和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0—183页)第8页。

〔8〕 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9卷，第274页)——第8页。

〔9〕 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根据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的规定，

于1871—1873年向德国偿付的五十亿法郎赔款——第9页。

- 〔10〕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支持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9页。

- 〔11〕普选权在西班牙从1868年（1868—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实施，并经1869年宪法批准。西班牙共和国在1873年宣布成立、到1874年由于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第10页。

- 〔12〕恩格斯引自马克思所写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这个纲领是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页）——第10页。

- 〔13〕1870年9月4日，在得到关于法军在色当溃败的消息后，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

1870年10月31日，在得到关于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败和梯也尔根据国防政府的委托开始同普鲁士人进行谈判的消息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市政厅后，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和决定在11月1日进行公社选举。但是政府利用了巴黎革命力量组织性差的情况，以及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国民自卫军中站在政府一边的几个营的帮助之下，违背自己关于辞职的诺言，重新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政权。

对这两个事件的评述另见《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法兰西内战》1970年中文版第5页）——第14页。

- 〔14〕1809年法奥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指挥的法国军队在1809年7月5—6日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击败了查理大公的奥地利军队。

在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战在1815年的

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欧洲列强反拿破仑同盟的最终胜利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垮台——第15页。

〔15〕比利时在1890—1893年开展了争取实施普选权的斗争。由于在工人党领导下进行了群众性的发动和罢工，众议院于1893年4月18日通过了关于普选权的法律（4月29日由参议院批准），但是作了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限制。这一法律规定对年满二十五岁、居住期限满一年的男子实施普选权。此外，还规定了多次投票制——对某几类的选民，可以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第16页。

〔16〕恩格斯指梅克伦堡—施韦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中，公爵政权和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这个斗争以1755年在罗斯托克签订了作为宪法基础的关于继承权的条约而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梅克伦堡的贵族获得了对自己过去的优惠和特权的确认，争取到自己的一半土地，以及商业和手工业可以免税，自己在国家开支中的那部分可以固定下来，并且巩固了自己在等级议会及其常设机构中的领导地位——第16页。

〔17〕恩格斯引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话：“合法性害死我们”，这句话反映出1848年底至1849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恢复君主制的意图——第17页。

〔18〕暗指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和几个德意志小邦的战争取得胜利后，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在1866年归并于普鲁士——第18页。

（以上注释系《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文版单行本中原有的，删去了原有注释1、2。）

原书空白页

第一部分

《导言》发表前

原书空白页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1895年2月2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拉法格：

用挂号件给您寄回注了几条意见的原稿。象往常一样，翻译得很好。我耽搁了几天，因为柏林有人要出版马克思论述1848—1849年法国事件的三篇文章（1850年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而不写导言就无法出版。导言相当长，因为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由于德国要实行危及我们的新法律^[1]，这点很重要。帝国国会委员会竭力使一切刑法典条文意思暧昧，如何使用要看被告属于什么政党。称赞任何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在下列场合应受惩罚：如果进行这种称赞的具体场合可使人得出被告想唆使或挑动犯罪行为的重复等等的结论！换句话说，同样的话出自你们社会主义者之口要受惩罚，出自任何一个保守派、自由派或教权派之口却不受惩罚。在这个委员会里教权派比政府本身表现得还要坏。请想想看，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凡在公开场合或报刊上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死的人，一律监禁两年。

如果不认为**政变**威胁着所有这帮先生，反动分子的这种疯狂就是毫无意义和绝对不可理解的。这次政变由**高级官员们**公开鼓

吹。部的顾问康斯坦丁·律斯勒曾在他写的小册子^①中提出这种要求。辞职的博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是这样。^{〔2〕}自由派和教权派都懂得，他们只有服从政府的这种决定了。在有二百万社会主义者选民的情况下，这帮先生们不敢公开抗拒政变，政府会利用这一威胁解除他们的武装，而他们在“拯救”宪法和国内和平的名义下不管什么都会投票赞成的！您看吧，他们将投票赞成威廉所要求的一切税收，一切军舰和一切新兵团，如果选民不加干预的话。我们这里的资产阶级议员胆小如鼠，他们可能连懦夫的胆量都不及。

无论如何我们在迅速地走向危机时刻，只要在这个一切都磨掉棱角的资产阶级的德国还能够发生危机的话。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我们的朋友又要开始遭到一系列的迫害。谈到我们，那末我们的政策应当是在当前时刻不受人挑拨；否则我们将毫无胜利希望地流血搏斗，象1871年巴黎人那样；如果再过两三年，我们的力量可能增加一倍，象实行非常法^{〔3〕}时期那样。现在我们的党将单独同在社会秩序的旗帜下团结在政府周围的所有的人斗争；再过两三年，因税收而破产的农民和小资产者都将站到我们一边。战斗的基本力量不参加先头部队的冲突，而是等待危机时刻的到来。

然而我们还是看看所有这一切将如何结束。

.....

忠实于您的 弗·恩·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39卷，第389—391页

① 康·律斯勒《社会民主主义》。——原编者注

注 释

- 〔1〕 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原编者注
- 〔2〕 博古斯拉夫斯基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了《实实在在的斗争——不是虚有其表的斗争。评国内政治形势》,宣扬进行上层政变来对付国内反对派。
——原编者注
- 〔3〕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然而在这以后,在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反动集团继续实行类似的新法令。——原编者注

理查·费舍致恩格斯^①

1895年3月6日于柏林

亲爱的“将军”：

早在阅读你的导言手稿时，我对其中个别段落就有些担忧，而且对党的政策的担忧甚于对惩治法的担忧。但是，我本想等校样来了以后再说，现在我已征求了奥古斯特^②、保尔^③、纳齐^④的意见，我们对这里所附的这个校样取得了一致意见，请你接受我们的观点。

在我们的书报检查官那里^⑤，我们担心：那些“遭到指责的”地方可能很容易给我们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防范^⑥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么，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⑦似乎是“浪费时间”——在这方面你对林泰伦和施潘^[1]好凶狠——。

不过，你总得承认，一个心术不正的对手不难把以下的两点

① 这封信曾由伯恩施坦删节发表在1926年第32年卷第63卷《社会主义月刊》上，——编者注

② 倍倍尔。——原编者注

③ 辛格尔。——原编者注

④ 伊格纳茨·奥艾尔。——原编者注

⑤ “在我们的书报检查官那里”一句在伯恩施坦发表时删去了，而且未作任何可供辨别的标记。——原编者注

⑥ 伯恩施坦误认为“避免”。——原编者注

⑦ 见本书第29页注释[1]。——编者注

作为你的论述精华公布于世。首先，承认我们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进行革命，只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因为军队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感染——而对于防止政变法草案来说，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其次，如果我们遇到战争或别的严重动乱，譬如公社，我们就会在面临祖国的敌人这类情况下举起起义的旗帜。

这样的“材料”在今天正是“正中心意”的东西，而我们的一切声明只会被理解为宽恕或否认的企图^①。

我相信，你定会承认我们的担忧是正当的，谨致衷心的祝愿。

您的 理·费舍

我差点把书名问题给忘了：我想采用你提出的三个方案中的第一个，即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你也许还有更好的，请同校样一起寄往汉堡。

还有一个问题：顾客和读者百分之九十九是工人，那么多的法文引文不应在正文(括号)里都译成德文吗？你的意见如何？

选自施泰因贝格《革命和合法性》一文(载于《国际
社会史评论》1967年第2期，第181—182页)

(蒋仁祥译 朱中龙校)

注 释

- 〔1〕 在1894年12月和1895年1月帝国国会关于防止政变法草案的第一次讨论同1895年5月的第二次讨论之间，由于中央党的决定性影响，政府的草案在委员会中变成了一个保护道德和宗教的法律草案，施潘是中央党在该委员会中的代言人之一。——原编者注

① 伯恩施坦发表的文本到此为止。——原编者注

恩格斯致理查·费舍^{〔1〕}

1895年3月8日于伦敦西北
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费舍：

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还是不能理解——起码在议论的中途——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不错，《前进报》上有时人们以过去宣传革命的那种劲头否定革命，而且他们可能以后又来宣传。但我认为此事不可效法。

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我还必须考虑到，阅读我的著作的还有外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士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等，我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这样糟蹋自己的名誉。

因此，我接受你们提出的修改意见，但以下几点除外：1.长条校样第9页，关于群众现在是这样写的：“他们应该明白，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了什么”^①。2.下一段：关于进攻的话**全部删**

①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凡是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他们自己就会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见本书第15页）——原编者注

掉^①。你们的建议^②有事实上的错误。法国人、意大利人等每天都在运用进攻的号召,只是不认真罢了。3.长条校样第10页:“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其命运现在取决于……”,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因此我拒绝写什么相反的东西,我说:“正是现在遵守法律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十分有利”。

为什么你们认为涉及破坏宪法问题时指出俾斯麦1866年的行为是有害的呢?这是我绝对无法理解的。事实上这是适应其人的最好证据。好吧,我给你们这种称心如意^③。

就这样。我绝不会再多走一步。为了减少你们在辩论期间的烦恼,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如果你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就更好些:守法的义务是法律上的,而不是道义上的,象博古斯拉夫斯基(这里有一个长S)给你们庄严指出的那样^④;如果掌权者违犯法律,上述义务就完全解除。而你们(起码是你们之中的某些人)却表现软弱,敌人提出守法的义务是道义上的、是适用于一切场合的,你们对这一要求未能给予应有的抵制,当时本应声明:你们掌权,你们制定法律,我们如有违犯,你们可以根据这些法律处置我们,我们只得忍受;如此而已,此外,我们再没有任何义务,你们也再没有任何权利。天主教徒在五月法令时期是这样做的,麦生的老路德派教徒和那个在各家报刊上出头露面的门诺派教徒士兵^[2]也是这样做的;你们没有权利从这个立场后退。防止改变法草案^⑤反正是要完蛋的,类似的东西很难搞成,更难实

① 指的是手稿中下面这句话:“……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见本书第15页)。——原编者注

② 执行委员会成员建议将这句话改成这样:“……号召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原编者注

③ 在发表的《导言》文本中,引起执行委员会成员反对的地方被删去了(见本书第18页)。——原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29页注释[2]。——编者注

⑤ 见本书第29页注释[1]。——编者注

施；但是，如果这些人将来有了权力，他们会设法堵住你们的嘴再和你们较量的。

如果你们不想让政府的先生们了解，我们现在立意等待，只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自己帮助自己，因为队伍还没有受到彻底的熏陶；既然如此，我的亲爱的，那你们为什么天天在报纸上吹嘘党的巨大成就呢？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十分了解，我们正在不可阻止地走向胜利，再过几年我们将成为不可制服的，因此他们想在当前和我们较量，可惜他们不知道怎么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演说什么也不能改变，这一切他们了解得和我们一样清楚；而且他们还知道，将来我们有了力量，我们将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他们的利益。

因此，当事情发展到在帝国国会开展大辩论时，你们要考虑一下：你们现在对抵制权的维护，和博古斯拉夫斯基过去维护反对我们的抵制权完全一样；听你们讲话的还有老一代的革命者，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匈牙利人和英国人；“合法的”一词很久以前在维登被删掉一事^{〔3〕}，必须严肃对待的时刻还会到来（谁知道多快到来）。请你们看看奥地利人，如果选举权不很快实行，他们将尽可能直接地使用武力威胁^{〔4〕}，回想一下你们自己在非常法^①时期的非法行为吧，现在人们又想用它让你们就范！守法——目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还是适用的，但绝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即使是口头上也罢！

你的 弗·恩·

把引用语（大部分已包括在正文里）译成德文现在太晚了，因为早已排版。

校样从这里寄往汉堡。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401—404页

① 见本书第29页注释〔3〕。——编者注

注 释

- 〔1〕 恩格斯这封信的原件一直没有找到，1965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已故德国部主任维尔纳·布卢门贝格发现了此信的一份打字稿，以后在他编辑的恩格斯和倍倍尔的通信集的序言中引用过这封信的若干段落。1967年不来梅大学教授汉斯·约瑟夫·施坦因贝格在《国际社会史评论》第2期的《革命和合法性》一文中第一次发表此信全文。1968年苏联《历史问题》第7期发表了该信的俄译文。196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9卷，1974年出版的中文版第39卷和1981年出版的俄文版第50卷都收入此信。——编者注
- 〔2〕 指新教教派门诺派教徒特伦涅尔，他由于宗教信仰拒绝执行军勤。
——原编者注
- 〔3〕 1880年8月20—23日在维登（瑞士）举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态度，等等。代表大会谴责了以莫斯特和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论，他们否认利用合法机会和利用议会等等的必要性，走上公开同党决裂的道路，他们俩被开除出党。同时代表大会反对右派的立场，把1875年在哥达通过的那个纲领的第二部分中谈到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提法中的“合法”一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原编者注
- 〔4〕 1895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争取在国内实现普选权，组织了广泛的运动。2月19日在维也纳就有十二个群众集会支持这一要求。维·阿德勒为此在《工人报》的“时事”栏内连续登载了一批简讯。——原编者注

奥古斯特·倍倍尔致恩格斯

1895年3月11日于柏林西区

亲爱的“将军”：

今天读到你给费舍的信^①。我认为，你是以错误的前提为根据的。我们不指望你说一些你不愿说也不应该说的话，而是指望你不要说那些一旦说了出来在目前只会使我们难堪的话。

你写的东西我们都认真加以阅读，并且受到了我们给予党的首脑应有的重视。你的言论可能正中敌人下怀，他们巴不得我们现在就告诉他们，有朝一日我们掌权以后打算干些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否认，但是他们想听到的事我们同样也不说。没有人想到要说，将来我们要走“合法”的道路。我们不容置疑地表明，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会把政权交到我们手中，至于怎么个交法，我们并没有表示过意见。我们只是驳斥了说我们热中于尝试一下新的弹仓式步枪的那种看法。

这里的气氛是这样，我们方面任何一点举措失当都会给中央党提供它所希望得到的借口，能投票赞成这项法律。

如果你相信草案已被否决，那你也错了。报纸上所写的那些东西全是胡扯。政府并没有撤回草案的想法，如果它不是执迷不悟，它就会当机立断，在委员会一读结束时便声明：鉴于当前的气氛和形势，它接受委员会的决议，同时寄希望于以后有机会时得到更多的东西。

^① 即1895年3月8日恩格斯给费舍的信。见本书第32—34页。——编者注

委员会对第一一一条甲、一一二条、一二六条和一二九条甲作出的决议^①使政府得到了它在一年前连做梦都不敢想并且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东西。虽然这几条与政府的草案相比被缓和**许多**，但是现在这个样子仍然符合我国刑法的思想基础，而政府的草案却把刑法搞得面目全非，同时草案对刑法的补充很可能导致一系列新的改动和强化。这一点我曾反复指明，政府里的那班先生们没有一个能反驳得了。

中央党即使投票赞成这些在它的帮助下炮制出来的条款，也不会担什么太大的风险，我们试想想看，中央党所依靠的人多数是反动的。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也是它的一块心病，而且它和政府一样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们，所以就和政府采取同样的手段，只是不那么笨拙而已。

中央党现在热中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搞点小骗术，这一点在讨论陆军预算和海军预算时已有所暴露。因为财政收入出乎意料地增加了，此次他们还可以躲过征收新税的问题，这样也就不会做出什么**过分开罪**选民的事。如果他们进而使耶稣会教徒返回家园^{〔1〕}，那他们可就笼络住了一群蠢货。

说来说去，这笔代价最后仍不得不由我们付出。即使我们承担得了，那也不可把帐单搞得比现有的还大，否则就是干了一桩蠢事。

你说，奥地利人也发出了威胁，他们倒行得通。首先，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其次，许多在我们这里不可行的事在他们那里都是可行的，历来如此。例如，象昨天的游行^{〔2〕}在我们这里根本不行，那种游行无异于巷战。难道要我们现在就不顾一切地搞这种游行？我们若是那么一搞，正中敌人的下怀。

奥地利的法律虽说更坏，但是当局行使起来却并不那么认真；我国的法律尽管好些，但在当局的手里却比奥地利最坏的法

① 见本书第29页注释〔1〕。——编者注

律还要坏。我们所缺少的正是维克多在巴黎曾经恰如其分地谈到过的奥地利人那种松松垮垮的作风。若是把正在讨论中的奥地利人的新刑法用到德国，当局会给我们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个法律可以说比我国的防止政变法草案还坏，但是这个刑法在奥地利却受得了，因为其中大部分条款都是一纸空文。

本星期防止政变法委员会可能结束一读。为拖延辩论我花了不少力气，不过再拖是行不通的。复活节前当然别想召开全会进行讨论了。

尤莉娅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奥古斯特

选自《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1985

年中文版，第940—943页

注 释

〔1〕 帝国国会于1893年12月1日和1895年2月20日两次决定废除1872年的反耶稣会教徒法。联邦会议拒绝废除这项法令。该法令于1897和1899年重申有效。——原编者注

〔2〕 1895年3月10日上午在维也纳召开了几个群众集会，讨论的题目是：《1848年革命》。下午在中央公墓的三月革命殉难者纪念碑旁举行了有三四万人参加的大会。会后队伍游行穿过全城前往议会大厦。——原编者注

理查·费舍致恩格斯^①

1895年3月14日于柏林

亲爱的“将军”：

非常感谢你同意我们的修改意见。但是，你提那些意见的前提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要“立誓忠于绝对守法”^②等等，也没有想到要“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

你也是完全对的，谁也不能使我们相信这一点，至少是现在。因此，即使这是一次愚蠢的举动，但是，如果我们硬要一味地以威胁口吻对那借助于防止政变法草案掐我们脖子的敌人说：你等着，只要我有一天能恢复行动，我定要掐断你的脖子^③这样做同样也是愚蠢的。不，我们同那个有理智的农村少女是一个心眼儿，她对她的笨拙而胆怯的情人直截了当地说：“对这样的事人们是只做不说的”^{〔1〕}。

你对我们的指责也许是没有道理的：你以为我们让敌人逼得承认守法的义务也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无论从哪一点上说我们都没有承认过，相反，无论老头子^④还是奥古斯特^⑤恰恰在最近

① 这封信曾由伯恩施坦删节，发表在1926年第32年卷第63卷《社会主义月刊》上。——编者注

② 从这里到这段结尾在伯恩施坦发表时都被删去了，并作了删节标记。——原编者注

③ 以下直到这段结尾在伯恩施坦发表时都被删去，而未作任何标记。——原编者注

④ 威廉·李卜克内西。——原编者注

⑤ 倍倍尔。——原编者注

曾多次非常明确地强调，自上而下践踏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会取消自下而上的各种义务。

我们今天是合法的，因为我们占居优势，顺便提一下，其他方面也强大得足以使我们这样做；今天我们提倡这种合法性，因为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今天的敌人特别不舒服，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如此而已！^①

你还将看到，我们不会给法国人、意大利人等等在这方面对我们嗤之以鼻的机会，同样我们也不会忘记或否认，我们在维登就从纲领中删去了“合法的”一词，在爱尔福特也没有再使用这个词。

其他一切情况你都知道了，否则你也不会同意我们的修改意见^②。

谨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理·费舍

选自汉·约·施泰因贝格《革命和合法性》一文（载于《国际社会史评论》，1967年第2期，第185—186页）

（蒋仁祥译 朱中龙校）

注 释

- 〔1〕 这个比喻显然出自费舍的挚友伊格纳茨·奥艾尔之口。奥艾尔根据伯恩施坦的倡议，把“对这样的事人们是只做不说的”这句话实际运用于修正主义的争论后，便成了党内实践派的纲领。——原编者注

① 以上一整段，在伯恩施坦发表时都被删去。——原编者注

② 伯恩施坦发表的文本到此为止。——原编者注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1895年3月25日于伦敦
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男爵：

对你的来电我立即答复：“同意”。校样我按印刷品给你寄去，标题是：弗·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导言》。内容是《新莱茵报评论》上的老文章的重印，这一点在正文中已有说明。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①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

.....

你的 弗·恩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
第425—426页

^① 见本书第29页注释〔1〕。——编者注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1895年3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

柏林人正在重新发表《新莱茵报评论》上摩尔^①关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国的文章，我写了导言，它很可能先在《新时代》上登出。由于我们的柏林朋友们在我看来是过分的要求，这篇导言受到了一些损害，他们希望凡是会被帝国国会作为通过防止政变法案^②的借口的话都不要讲。在目前条件下我只好让步。可是这个法律草案以及德国的极不稳定的局势——虽然对我们党取得总的成就是很有利的，——却大大地打乱了我的计划。.....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430页

① 即马克思。——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29页注释〔1〕。——编者注

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

(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社论)

我们的老先锋战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防止政变法^①的迹象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在给最近出版的马克思关于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小册子写的导言中论述了这个课题。恩格斯在这里以他惯用的大师之笔指出(对所有那些叫嚣“采取行动”的律斯勒、博古斯拉夫斯基和米尔巴赫之流^[1]有好处，对所有那些把剑看作是君主手里对付国内反对派的手段的人有好处)，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经常受压迫的阶级的革命技术也发生变化。他指出，今天的无产者不管遇到任何挑衅，都应冷静，也不打算再回到老式的街垒革命；用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渗入日渐衰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方面他掌握一种更为革命的手段。让我们的老大师自己给我们说说吧。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目前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的数十亿，简直象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日益迅猛地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则更加迅猛和持续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 000张，1874年为352 000张，1877年为493 000张。

① 见本书第29页注释[1]。——编者注

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高度赞扬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 000张。但是这种状况被很快就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 000张，1887年为763 000张，1890年为1 427 000张。于是，国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没有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 787 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夜人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被看不起的工人那里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数以百万计。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起程。

但是，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头一个重大的贡献，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 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手段。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选票数目的定期确认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敌手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能估量我们行动分寸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宜的退缩，又可避免不适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非常非常足够了。……

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就是说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对起义者来说，关键是要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士气，而这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会有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惶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如果做不到，那就证明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但是由于装备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兵力调度得当和遵守纪律等长处。起义在实际战术行动中所能达到的，最多也只是熟练地构筑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支援。后备力量的配置或使用，即各分队的互相配合和协同动作，在防卫一个市区时已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了，但这在起义的场合却多半根本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是漏洞百出；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自然就谈不上了。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消极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攻势，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装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兵，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战斗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累斯顿；——当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政治上的考虑而按纯粹军事观点采取行动，并且手下的士兵仍属可靠的时候，就都以起义失败而告终。

1848年以前起义者多次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都站着市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向起义者，或者是因为采取冷漠的犹疑不决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

摇，并且它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种市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总是遭受失败。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到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命令下达迟缓。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由于指挥官优柔寡断，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可见，即使在盛行巷战的时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坚持不到，就遭到失败。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政府方面去了；“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经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作“人民”，而是把他们看作叛逆者、扰乱分子、抢掠者、分肥分子、社会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技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穿过花园、庭院和房屋迂回前进。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用得巧妙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得手。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都对军队有利。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而军队就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还没有增长到四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到四倍以上。有了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增为一支大军。这种人数大量增加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击发式前装滑膛枪，现在是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它的射程是旧式枪的四倍，准确性和射速则是十倍。先前大炮发射的是威力不大的球形弹和散弹，现在则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

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而使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就是说，“人民”看来将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在1848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役的兵士，那么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豪华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在近距离的射击中也远比不上士兵的弹仓枪。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造出所需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的子弹都各不相同，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用的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废物。最后，各大都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象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鸣剑啸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贸然走上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后一定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徒然地在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这么笨。……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他们自己就会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应该拥护什么。近五十年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正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一个最广大坚不

可摧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经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加，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不可遏制的。并且是平稳的，就象自然界中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对此进行的一切干预，都毫无成效。我们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赢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并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控制能力。^{〔2〕}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象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假以时日这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弹仓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决定性的战斗就会推迟、延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面带红光，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选自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

（禾子译）

注 释

- 〔1〕 律斯勒、鲍古斯拉夫斯基、米尔巴赫之流主张进行上层政变,即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来对付国内反对派。——译者注
- 〔2〕 《前进报》在这里删去了原稿一句话:“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
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而且也没有
标出删节号。——译者注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1895年4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明信片收到了。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

.....

你的 弗·恩·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432页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1895年1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

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①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所以我请您等到全篇文章发表后再作评论（文章大概将登在《新时代》上），我天天等着小册子的样书。可惜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

你的 弗·恩格斯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436页

① 见本书第29页注释〔1〕。——编者注

原书空白页

第 二 部 分

恩格斯逝世后爱德华·伯恩施坦

挑起的对《导言》的争论

原书空白页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 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

(1898年9月29日)

〔德〕爱德华·伯恩斯坦

.....

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谁只要坚持灾变论，它一定会象这一理论的彻底拥护者以前也做过的那样，尽可能反对上述的那种发展并且试图加以阻止。但是难道所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只能是通过政治灾变夺取政权吗？难道这就等于说，由无产阶级独自占有国家权力并运用它来反对整个非无产阶级吗？

对于凡是赞成这种说法的人，我在这里要提醒他两件事。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新版的序言中宣称，特别是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中详细地说明，政治性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①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和军队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是会暂时阻止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或甚至使它倒退一个时期的手段——总之，社会民主党“用合法手段却比

① 见本书第15页。——编者注

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①。他并且据此指出党的迫切任务是，“使自己的选票继续不断地增加”^②——或者是“议会活动的耐心宣传”^③。

由恩格斯所举出的数字可以看出，他不管怎样总还是要把发展过程的速度估计得过高一些的，但是连他也讲了上面这些话。难道因为他不愿意看到由合法宣传加以保证的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被一场政治灾变打断，我们就要议论他，说他不要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了吗？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同意他的论述，那末在听到如下的说法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不会大发雷霆了：社会民主党还必须长期从事的，不是痴心妄想大崩溃，而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按民主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

这就是我在我那篇受到非难的文章中所说的话，我现在仍旧不折不扣地坚持这种说法。就我们目前所谈的问题来说，**我的说法和恩格斯的下一原理是殊途同归的：在任何时候，工人阶级就其智力成熟程度和一般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有多大能力实行自己的统治，民主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统治。**此外，恩格斯在上引文章中还明确地援引说，《共产党宣言》已经宣称，“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④。

总之，恩格斯深信，以灾变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因此他

①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7页，此处引文和恩格斯的原话有出入。——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5页，这句话同恩格斯的原话不一致，原文为“耐心的宣传和议会活动”。——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10页。——编者注

认为即使在罗曼语国家（那里的传统比德国更有利于这一策略得多）也有必要对这种策略作出修正。他写道：“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①。大家难道已经忘记了吗？

.....

摘自《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8年柏林版，第123—124页

^① 见本书第15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德〕爱德华·伯恩斯坦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

第一节 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陷阱

.....

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为《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马克思和他在估计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所需时间方面所犯的错误的。他通过这篇文章（人们恐怕可以正当地把它称为他的政治遗嘱）为社会主义运动立下的功绩，是无论怎样高地评价都决不会过分的。它所包含的比它所许诺^①的还要多。不过这篇导言既不是从如此坦率的自白中作出一切结论的地方，人们也根本不可能指望恩格斯自己会对理论作出因此成为必要的修正。如果他作了修正，那末他即使不明白地说出来，但是实际上一定会无条件地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清算了。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贩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恩格斯不能或者说不愿超越它。他仅仅就政治斗争的一定的方法和形式从已经得到的认识作出了结论。他在这些方面所说的话尽管是意义重大的，但是这毕竟只涉及现在提出的问题范围中的一部分。

① 此处德文是“versprechen”（许诺），考茨基引用他这段话的时候，用的是“aussprechen”（表达）。见本书第63页。——编者注

因此显然的是，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遗留给我们一些论述政治斗争的专著，而我们今天却必须从与他们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些斗争了。他们在论述事件的进程时醉心于自我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们的观察方法是很现实的，他们对于党派和人物的判断决不可能完全中肯，他们的政策同样也不可能永远正确。正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著述中，仅就对最近时期的观察来说，传统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同时在其他方面也一再有人回过头来抓住这些过去的斗争当作例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后来追加的纠正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但是同近来的社会主义历史著作根据恩格斯的导言所必须作的纠正比起来，从同一导言产生的对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任务的整个见解的纠正是更为重要的。这一纠正首先把我们引向一个迄今很少讨论过的一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布朗基主义的原来的内在联系和这一联系的断绝。

摘自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26页

（殷叙彝译）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1898年9月)

[德]罗莎·卢森堡

第二部分

三 夺取政权

.....

在政治关系方面，民主的发展（只要它处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导致了各阶层人民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建立“人民国家”。但这采取的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形式，在这里，阶级对立，阶级统治没有被废除，倒是展开和暴露出来了。既然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矛盾中运动的，那么，为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内核从同它矛盾着的资本主义外壳中剥出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就需要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伯恩施坦当然知道另一种劝告^①：如果说，民主的发展是使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而不是使它缓和，他回答我们说：那时“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想给自己的工他增加困难，那它就必然要尽力阻挠社会改良和民主设施的扩大”。不错，如果社会民主党学小资产阶级的样子，对于从历史上去选择一切好的方面，抛弃坏的方面

^① 二版改为“伯恩施坦从这里得出的当然是另一个结论。”

的吃力工作还是津津有味的话。不过那时社会民主党势必也要对整个资本主义“尽力阻挠”，因为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是罪魁祸首，是它在社会民主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设下了种种障碍。实际上，资本主义在设置障碍的同时，也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唯一可能性。这种情况对民主制也完全适用。

如果说，民主制〔……〕对于资产阶级已经一部分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一部分变成了障碍，那么，它对于工人阶级却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首先，民主制是必要的，因为它创立了各种政治形式（自治、选举权等等），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可以给它充当跳板和支撑点。其次，民主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制中，在为民主制而斗争中，在运用民主权利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历史使命。

总之，民主制所以不可缺少，不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倒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唯一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当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审查当前工人运动的策略并把合法斗争同街垒对立起来时，从导言的**每一行都看得很清楚**，他论述的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对待^①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框框内它的态度问题。一句话，恩格斯对被统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对胜利的无产阶级作了指示。

马克思关于英国土地问题的著名言论则相反（伯恩施坦也同样引用过），他说：“假如对地主实行赎买，也许是最便宜的”^②。这

① 二版未加着重号。

② “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85页）——原编者注

里讲的不是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前而是胜利之后的态度。因为显然只有在工人阶级执掌政权时才谈得上对统治阶级的“赎买”。而马克思在这里作为可能性来考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的运用，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来代替这个专政。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不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没有怀疑过。而伯恩斯坦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窝当作负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使命的机关，这是他的权利。

摘自《卢森堡文选》中文版上卷，第133—135页

伯恩施坦和辩证法

〔德〕卡尔·考茨基

.....

但是，使我更难理解的是他^①对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那篇著名的导言所持的观点。

伯恩施坦说：“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为《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马克思和他在估计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所需时间方面所犯的错误。他通过这篇文章（人们恐怕可以正当地把它称为他的政治遗嘱）为社会主义运动立下的功绩，是无论怎样高地评价都决不会过分的。它所包含的比它所表达出来^②的还要多。不过这篇导言既不是从如此坦率的自白中作出一切结论的地方，人们也根本不可能指望恩格斯自己会对理论作出因此成为必要的修正。”

“……但是同近来的社会主义历史著作根据恩格斯的导言所必须作的纠正比起来，从同一导言产生的对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任务的整个见解的纠正是更为重要的。”^③

读了这段话后，人们一定认为，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承认了一个在那以前还没有公开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完全改变了我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任务的整个见解”。但是，对恩格斯来

① 指爱·伯恩施坦。——编者注

② 此处德文是“aussprechen”（表达），伯恩施坦的原文用“versprechen”（许诺）。见本书第58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59页。——编者注

说，作这种必要的修正本身已太晚了。这必需由恩格斯的后继者来完成。但是，实际上恩格斯在那篇导言里论证什么呢？“对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任务的整个见解”在撰写这篇导言的时候，甚至早在几十年前在我们的队伍里就普遍认为是正确的。恩格斯的这个政治遗嘱并不是什么纠正，而是对社会民主党迄今为止的策略的认可。在导言中没有一个字能使伯恩斯坦有理由把他自1895年以来的转变称之为实行恩格斯的政治遗嘱。

恩格斯在导言里批判的不是1895年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式，而是1848年的斗争方式。关于这一点他说道：“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①。恩格斯把这种斗争方式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最先应用的斗争方式作对比，当时该党“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②文章的字里行间没有暗示要纠正斗争的观点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恩格斯始终还是原来的那个老革命家。“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③1891年恩格斯仍反复强调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句话（《法兰西内战》导言^④）。这一年的年底他写道：

“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

① 见本书第5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0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6页。——编者注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坏合法性，以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吗？”^①

恩格斯在《阶级斗争》的导言中正是表述了同样的思想。如果说这种思想在后一篇文章中表述得不是那么明确，那这个责任不在恩格斯，而在那些德国朋友，他们强求恩格斯删去**结尾部分因为它太革命了**。他们认为，导言没有那个结尾也够清楚的了。但是，显然情况并不是这样。

伯恩施坦掌握着我们大师遗留下的手稿，如果其中也有保留着被删去的结尾部分的这篇导言原稿，那么我要求发表这个结尾部分，恩格斯只是出于考虑外界的形势才删去的，而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这将会清楚地表明，伯恩施坦要引证恩格斯来支持他是多么没有理由。

但是，就是现在印出的这个文本也足以说明，恩格斯的“承认”是指1848年的错误，而不是指其他，而且他鉴于1848年的错误推荐1867年的策略。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谈不上政治遗嘱对理论修正的必要。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可能进行这种修正，他们的重要著作《资本论》和《反杜林论》是受到同样的观点和经验的影响而完善的，新的策略来源于这些观点和经验。所以马克思在他那些最成熟的著作中的理论也就没有矛盾的地方。谁要是对此有所怀疑，伯恩施坦就一定要说服他，他出去寻找矛盾，他宣称他已经获得整整一批最难寻找的资料，如果让他把它们拿出来，他却什么也没有，除了大话，什么也呈献不出来。

.....

摘自《新时代》1898—1899年第17年卷，第2册，
第28期，第46—48页

（柴野译 禾子校）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2页。——编者注

辩证法和发展

(1899年6月)

〔德〕爱德华·伯恩斯坦

.....

最后，考茨基还认为必须保护恩格斯，使他免受这种嫌疑：似乎他在《阶级斗争》的导言中所纠正的是某种别的东西，而不是1848年的错误。他认为恩格斯在那里批评的是那时的斗争方式，而不是18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式。不错，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写过一句主张后一见解的话呢？考茨基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时代之后的整个时期内所主张的关于运动进程的见解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遵循的斗争方式等量齐观。但是，它们早就不是这样了。马克思关于哥达纲领草案的信，以及象在今天国家中普选权“决不可能具有比成为衡量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尺更多的东西”^①的种种意见，据我看来就充分清楚地表明，对斗争还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以前，恩格斯从来没有象在这篇导言里那样毫无保留地承认普选权的价值。这篇导言毫无疑问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迄今所采取的策略的批准。我说的正是这件事，我所反对的并不是这种策略，而是用过了时的1848年的策略的口号和论据来装饰这种策略。这就是我从这篇导言得出的

① 恩格斯的原话是：“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4卷，第69页）——编者注

结论。

“不”，考茨基说，“恩格斯一如既往，仍旧是一个老革命家”。他引证了恩格斯谈到社会民主党不能放弃革命权的一段话作为证据，并且告诉人们说，恩格斯原来为《阶级斗争》的导言写了一个同发表的那个不同的结尾，只是按照德国朋友们（他们觉得这个结论“太革命了”）的愿望才把它删掉。如果这一结尾在恩格斯的遗稿中，那考茨基要求我把它发表出来。它将表明，我引证恩格斯的话的权利是多么小。

首先，我要回答说，一直到我读到考茨基的有关报道的时刻为止，我毫不知道那个被压下来的结尾，而且我手头没有这样一份手稿。考茨基所报道的事实并没有因此就被否认。这一手稿也很可能还存在，——只不过不在我所保存的文件里。它可能在存放于其他地方的函件中。其次，这个结尾也许只会证实我在不知道它的情况下所写的一句话：恩格斯并没有彻底发挥从导言的主要内容中产生的一切结论。如果一个人一方面赞扬“长期、持续的工作”、“缓慢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工作”，并且把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看做能够阻碍运动前进的唯一手段，那么，“革命的结尾”对此就完全格格不入了。

此外，恩格斯并不是头脑不清的人。虽然他对于在结尾时拿出强有力的王牌来有所偏爱，但是用一种同前面的话直接矛盾的东西来作结语，这并不是他的风格。恩格斯在导言结尾所讨论的，是起草这篇导言时正好在德国提上议程的防止颠覆的法案^①。他可能超出德国朋友们认为是必要的或者适当的程度，更加率直地针对这一法案而力倡“革命权”。但是，这同导言的其他内容毫无原则性的对立。

因为第三，就“革命权”而论，它是不成问题的。如同我在

① 见本书第29页注释(1)。——编者注

我的著作中^①所指出的，既不能把它列入法律，也不能加以禁止。如果一个民族认为革命是必要的和可能的，那末它就进行革命，对此既不容许稍加禁止，也不容许稍加胁迫。要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实际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根本无法控制的感情和不可衡量的影响：普遍的情绪，特别是政治状况。各国人民曾经为了微不足道的挑衅而推翻政府，也曾经平静地忍受更加恶毒得多的挑衅。但是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愈自由，引起革命起义的动因也就愈会消失，而用暴力推翻由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任命的政府是一种没有人会赞同的行动，这都是不言而喻的。

经常重提“革命权”，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权宜之计，是至少在形式上还培植一件人们事实上已经束之高阁的事情，是一种给假花浇水的做法。

.....

摘自《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1901年柏林
——伯尔尼版，第362—364页

① 指《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编者注

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

(1900年)

[苏]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

不错，强力和暴力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国际政治关系上，每个国家的势力取决于它的强力，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每一个各别情况下，强者权利的被承认，都要以暴力行动作为前提。各阶级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各该阶级的势力总是决定于它的强力，但是为了使它的势力得到承认，并不一定总是需要暴力。暴力的作用有时缩小，有时扩大，这要以各该国家的政治制度为转移。伯恩施坦先生认为，在现代的民主国家内，工人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必要使用暴力。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看法，是由于我们这位“批评家”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断关怀的结果——他怕惊吓了他们。现在的法国拥有民主宪法，但是，凡是熟悉这个国家内部生活的人，谁也不能担保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将来不会被迫公开以暴力反抗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不单是这样。每个熟悉法国宪法的人都会说，在这个国家里，选举权逻辑的本身就很容易导致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①。或者就以北亚

① 参看饶勒斯《法国的社会主义》，载《世界主义者》1889年1月，第119—121页

美利加的美国为例。这也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在这个民主国家里，只是经过内战才使黑人得到解放，因而不能担保，美国无产阶级在为自己的经济解放扫清道路时不需要采取暴力。伯恩斯坦先生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际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可能而且必须使现代社会制度不经历抽搐性的动荡而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去的形势和条件”^①。在他的这些话中有一部分真理。社会民主党确实希望不经过动荡而完成向更高级的社会制度过渡。但这是不是说，他们应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完全不是！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他们非常希望不经过流血就占领中国的都城，然而他们却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占领它的念头。任何目的都不会因为人们要花最小的力量去达到它而有所改变。一旦人们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达到其目的时，方法的选择就已经不能决定于他们自己，而要决定于环境了。正因为社会民主党不可能预见到工人阶级在争取自己的统治权时所遇到的一切情况，所以它在原则上不能放弃行动的暴力手段。它应该铭记着那条金科玉律：要想和平，就得准备战争。

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在恩格斯的晚年，他自己曾经坚决地建议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避免暴力行动，而要利用合法手段坚持和平斗争^②。我们要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恩格斯的这个建议是根据三条理由提出的：（1）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是工人群众觉悟的高度发展，而这需要时间^③。（2）德国的保守派正在竭力设法引诱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起义，企图粉碎它，从而使它不断取得的胜利中途夭折^④。（3）由于军队有现

① 《社会主义可能实现的条件》，第158页。

② 参看本书第10页。——编者注

③ 参看本书第15页。——编者注

④ 参看本书第14页。——编者注

代化的装备，街头起义的任何尝试都是没有希望的^①。

前两条理由不需要任何“修正”，也不需要任何论述。它们阐述得非常清楚，显然无可争辩，不但那些真正长于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人不会反对，就连那些只会“打着批判的招牌”炫耀自己的人也不会反对。但这两条理由并不是一般地指责暴力行动，而只是指责为时过早的暴力行动，因此，这和那些无论怎样也要“和平发展”的卫道者们的论据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至于第三条理由，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它的意思就并不完全象乍看起来的样子了。

恩格斯进一步发挥这一理由时说，1848年以前，巷战往往使武装起义者取得胜利，这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的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发生的大多数巷战中，国民自卫军起了决定作用，它或者是由于采取了不坚定态度，使正规军失去了锐气，或者是它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了。在国民自卫军立即起来坚决反对武装起义者的地方，起义就归于失败。例如1848年6月在巴黎就是这样。总之，武装起义者只是在他们能够动摇军队的精神上的坚忍性的地方和时候，才能取得胜利。甚至在街巷战斗的典型时代，街垒所具有的精神作用也要比物质作用更大一些。街垒使军队行进困难，从而给了武装起义者影响军队士气的机会。但如果军队不受武装起义者的影响，它就会得到胜利。

这样，即使在街巷战斗的典型时代，起义的成败完全决定于军队的同情，那末便会产生以下一个使我们关心的问题：武装起义者目前能不能对军队产生对自己有利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肯定地回答说：“决不是”。他说，起义，今天不能象在1848年那样依靠所有阶层人民的同情，虽然现在会有更多通晓军事的人归向起义方面，但是他们要得到适当的武器是非常困难的。对这一点，恩格斯补充说，从1848年起各大城市增加了许多新的街

^① 参看本书第13、14页。——编者注

区，这对建筑街垒十分不便，他于是问道：“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鸣剑啸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贸然走上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后一定答应去当炮灰？这些先生们完全是徒然地在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这么笨。”^①

这些都讲得非常肯定，看来不能使人们对恩格斯的观点有任何怀疑。但要注意，他的这一论断是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得出的，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经不起统治阶级的阴险挑衅，那它就真是太冒失了。这一论断，似乎带有一般性质，然而现在却具有独特的、局部的意义；读者现在会开始觉得，恩格斯指的仅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恩格斯以下的几句话更为有力地增强了这种印象：“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也就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②接着他解释了为什么德国政党现在采取暴力行动没有好处。因此很自然地会产生这样一种推测：关于德国政党现时状况特殊的想法，使恩格斯的关于工人阶级对其剥削者进行公开斗争的全部论断加上了特殊的色彩。但是读到导言结尾的一个地方时，这种推断就被信念所代替了，恩格斯在这里说，由于社会民主党不断取得胜利，德国政府也许可能决定废除宪法和恢复专制制度。他在这里暗示，这种企图会引起人民起义，反动势力将要碰得粉碎。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即便现在也不是所有的人民起义都没有成功的希望。导言最后的一些话更加强调了这一必然的结论，它们使读者转而想到1600年前基督教和多神教斗争的时代。多神教界把基督教徒看成是社会原则的破坏者而加以鄙视，

① 见本书第14—15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6页。——编者注

并残酷地进行迫害。基督教徒为了自己的事业在很长时期内只能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但是，逐渐地，他们的教义非常广泛地传播开来，连军队中也有了拥护他们的人；“一大批一大批的人加入了基督教”^①（着重点是我加的）。当他们为了工作不得不参加多神教教堂举行的宗教仪式时，这批笃信新教义的军人，便用十字架装饰了自己的头盔。一般的纪律惩处对他们这种傲慢的行为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于是戴克里先大帝开始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颁布了“一道反社会党人法请原谅，我是想说反基督徒法”。^② 社会原则动摇者的集会被宣布为非法，举行过会议的场所被封闭，十字架被禁止佩戴等等。大肆迫害基督教徒成了303年的一个特征。但是这种迫害也是最后的一次了。“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③，于是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假使这几行话有某种含义的话，——当然这些话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末它指的是，当革命思想深入军队，即当我们时代的“军团”感染到了社会主义精神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才能获得胜利，而在这以前，社会主义政党应当避免与军队发生公开的冲突。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从恩格斯的论点中所作出的通常的结论。

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军队有没有可能呢？不仅有可能，而且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军事的现代化组织，要求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而全民义务兵役制将把人民中流行的思想带入军队。社会主义思想在群众中传播得越广泛，武装起义者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前面我们已经从恩格斯那里知道，街巷斗争的结局经常取决于军队

① 见书中译为“整个整个的军团都信奉基督教”，参看本书第19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9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9页。——编者注

的同情^①。

毫无疑问，“军团”并不是很快就会接受我们的影响的。但是正象法国人所说的，迟到并不等于不到。早晚社会主义思想必然会深入到军队里去，那时我们再看反动分子的好战情绪还剩下多少，他们会不会不再招引我们到街上去……

假使我们把刚才分析过的恩格斯的论点和《共产党宣言》中的几行有名的结论对照一下^[1]，我们就可以看到恩格斯在晚年对公开起义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作用相当地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观点。而在发表《宣言》时，他和马克思认为公开起义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恩格斯在晚年承认，在一定的形势下，合法的方法也可以获胜，他开始认为起义这一行动方法在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条件下，并不预兆社会主义者的胜利，而恰恰预兆残酷的失败，只有当军队本身感染到社会主义精神时，失败的预兆才会消失。

恩格斯这一新的观点当然完全值得我们重视和尊重，但是它与刚才我们在上面所说到的关于暴力行动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可能意义并不发生任何矛盾。他只不过说明了为使这种行动获得成功所必需的条件^[2]。

对这一点还需要补充的是，某一阶级的专政是一回事，这一阶级为了要取得专政而采取暴力的行动又是一回事。在复辟时期，基佐和他的同谋者非常热心并且完全有意识地企图建立“中等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想到采取暴力的行动，特别是街头起义。很可能基佐会尖锐地谴责那时街头起义的各种计划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是革命家，因为他一刻也不停地在“中等阶级”人们的思想中启发他们认识他们的利益与贵族的利益是

① 街垒只在公开武装斗争的局部地区才会出现，我们认为指出这点并不是多余的

处在敌对地位的，并向他们证明，一切与贵族妥协的想法都是有害的幻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是这样的革命家（只是他们站在另一个阶级的观点上），他们直到呼吸停止时也依然完全是这样的革命家。在这一点上，不管那些所谓“批评家”们如何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却丝毫没有改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些批评家是由主张“这一方面”和主张“那一方面”的人们组成的，他们非常盼望既能解放无产者，同时又不得罪资产阶级。对他们可以用尼采的说来说：这些贪睡者真幸福，因为他们可以马上打瞌睡了。

摘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2卷，
第562—569页

注 释

- 〔1〕“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 〔2〕1892年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直截了当地叙述了社会主义思想迅速深入到军队，他欢呼道：“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2页）这就是我们在序言里所找到的论点，只是在序言里有意地将这一论点表达得不明确。这样做是由于一些朋友们的坚持，他们认为不便明确地表达这一论点（关于这一点可参看考茨基的《伯恩施坦和辩证法》，载于《新时代》第17年卷第2册第47页）。恩格斯对进行实际工作的朋友们的劝告作了让步，因而造成了对他的观点在理论上的错误理解。这种在理论上的错误理解，已

经对群众造成了实际的不方便,而这比之于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表达他的观点可能引起的各色各样的不方便要不方便得多。对于作了过多让步的理论家的教训是:他们应该牢牢地记住,在谈到表达理论观点时,实际上往往是非常不实际的。

新的激战

(1901年6月)

〔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

最近有很多人说，同现代化的军队进行巷战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希望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批评家”特别坚持这个论点，他们用资产阶级学术的破烂货冒充公正的科学的新结论，曲解恩格斯的话，其实恩格斯当时所谈的（而且是有保留的）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暂时的策略。我们甚至从个别的战斗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些论点完全是胡说八道。巷战是可能的，一旦政府要同不仅是一个工厂的工人较量，那末没有希望的不是战士的处境，而是政府的处境。.....

摘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5页

载于1901年6月《火星报》第5号

取得政权的道路

(1909年)

[德]卡尔·考茨基

五 既非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也非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

……有人拿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立起来，硬说他有个时候也曾经极富于革命情绪，但是在他逝世前不久改恶从善了，意识到甚至承认了自己革命观点的错误。

的确，1895年时恩格斯曾经在他给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指出革命斗争的条件已较1848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说，为了取得胜利，我们必须把“已经懂得应该怎么办”的广大群众带领起来；说我们“革命者”、“颠覆者”采用合法手段，要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变革办法，更能获得远为巨大的成就。但是不应忘记，恩格斯这里只是说的当时的形势。要想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些话，必须拿这些话同我不久前在《新时代》(第27卷第1期第7页)上引用的那些恩格斯的信里所说的话加以比较。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坚决反对把他说成“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的企图。关于这一点，我在《新时代》上曾经这样写道：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注明写于1895年3月6日。这本书在几个星期以后才问世。我曾请求恩格斯允许我在该书出版以前把这篇《导言》在《新时代》上加以刊载。

对于这个问题他在3月25日答复我说：

“对你的来电我立即答复：‘同意’。校样我按印刷品给你寄去，

标题是：弗·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导言》。内容是《新莱茵报评论》上的老文章的重印，这一点在正文中已有说明。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①

为了明白这一点，必须记起那个建议大大加强现存法律严厉性以便阻止社会主义宣传的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这个草案于1894年12月5日提交德意志帝国议会，而于翌年1月14日交付小组委员会审议，审议时间长达三个多月之久（直到4月25日）。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时候写作他的《导言》的。

这封信的另一段话表明，恩格斯是多么认真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他在那里写道：

“我认为，奥地利将实行选举改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将使我们进入议会，只要不突然出现一个全面反动时期。在柏林人们好象正为此做最大努力，但是可惜得很，那里的人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②

1月3日，即还在开始写作《导言》以前，恩格斯曾经给我写信说道：

“看来，你们在德国面临着十分活跃的一年。如果冯·克勒尔先生今后继续这样干下去，那什么都可能发生：冲突、解散、钦赐、政变。当然，人们也会乐于接受小恩小惠。容克地主会完全满足于扩大恩赐，但是要达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满足个人统治欲的某些要求，并要放纵这些要求到一定时刻；那时，反抗的因素将发生作用，而后不可预见和估计不到的情况也会出现。要保证自己得到恩赐，就要以冲突相威胁，但是只要再多走一步，首要的目的——恩赐，就会变成次要的，王位将起来反对帝国国会——

① 见本书第41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1卷，第428页。——编者注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那时就会发生许多麻烦。我正好在看加德纳的《查理一世的个人统治》；许多地方常常和现代的德国完全相同，令人好笑。例如，关于议员在议会中的活动不受侵犯的论据，就是如此。如果德国是一个罗曼语族国家，革命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①

修正主义者硬说，恩格斯曾经宣告无条件合法的和平发展时代已经到来并将永远保持下去，而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恩格斯预见了这样严重的、孕育着冲突的形势。

十分显然，恩格斯在对形势做这样的估计时，曾极力回避一切可能被敌人利用来危害党的东西；他在有关革命事业的一切问题上都仍然是绝对坚定不移的，不过在表述上力求含蓄一些罢了。

《Vorwärts》（《前进报》）显然为了对审议《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小组委员会发生良好的影响，只是发表了他的《导言》的某些片断。这些从全文中断章取义地摘出的片断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有着后来修正主义者所强加给他的那种想法。这使恩格斯非常恼火。他在4月1日的信里写道：

“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 my 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②。

恩格斯没有想到，过了不多时候，甚至那些理应率先维护他的观点免遭歪曲的亲近友人，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仿佛这个被歪曲了的观点确实是属于他的，而他认为是可耻的那个东西则是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345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50页。——编者注

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功绩：仿佛这个革命战士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终结了自己的道路。

如果这些摘录还不足以确定恩格斯对革命的观点，那末可以再援引他在1892年、即写作马克思《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前几年曾经发表在《新时代》上的一篇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以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吗？我们等着瞧吧。而现在：‘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

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袖手旁观；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暴力能够扼杀一个在有限的地区进行活动的小宗派；但是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一个遍布巨大帝国各地的、拥有200万^①人的党。暴力的反革命^②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③

这段引文，也和有关的信件一样，值得每一个想正确理解恩格斯《导言》中关于我们借助于法制可以获得很大成功的话的人

① 德文版本中是“200万至300万”。——编者注

② 德文版本中不是“暴力的反革命”，而是“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2页。——编者注

加以注意。这些话丝毫没有表明他放弃了革命思想。

但是，不言而喻，这些话却表明他彻底摒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应该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做孤注的一掷，而这次革命应该按照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的形式重演。认为我在这里的观点同恩格斯的观点有矛盾的人是错了。实际上，我还在恩格斯的《导言》之前，便从另一种角度以另一种不同的形式发挥了我们在恩格斯那里所看到的那同一个思想。

1893年12月，我在《新时代》第12卷上发表了《社会民主党的信条》一文。这篇文章详尽地考察了革命的问题。那里写道：

“我们是革命者，而且不仅仅是蒸汽机的革命那种意义下的革命。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只有通过政治革命、通过战斗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实现。而共和国，而且是最通常的意义下的共和国、即民主共和国，乃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国家形式。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我们不能举行这个革命，正象我们的敌人不能阻止这个革命一样。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举行或准备革命。既然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举行革命，所以我们就无从谈起革命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到来，以及革命将要采取什么形式实现。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取到它借以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政权以前，是不会停止的。我们知道，这个阶级斗争将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激烈；无产阶级的人数以及它的精神力量和经济力量将越来越增长；因此，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只能模糊地预测这场社会战争的最后决战将在何时发生和怎样发生。在这一切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既然我们对于这场社会战争的决战毫无所知，我们就无从谈起这场决战是不是流血的：是武力将在决战中起巨大的作用，

还是只有借助于经济的、立法的和道义的强制才能决定胜负？

但是有一切理由设想，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中，后一种手段将比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所用的实力即武力更为优越。

未来革命战斗之所以显然将更少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时政府军的装备较之‘公民’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总是预先决定着公民的任何反抗的失败。

但是，革命阶层现在却比十八世纪时拥有更为优越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道义的反抗武器。在这方面只有俄国是例外。

.....

现在，至少在那些有着某种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人们把这种制度称为社会的安全活瓣。如果人们想借此说明，民主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已不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已满足于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怒和诉说自己的痛苦，因而放弃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那就错了。民主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防止这种矛盾的不可避免的结局——推翻这个社会。民主只能做到一点，不是防止革命，而是防止时机尚未成熟的、没有希望的革命尝试，使某些革命起义成为多余的。民主使各个政党和阶级的力量对比清楚地暴露出来；它不是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和转移它们的终极目标，而是一方面阻止新兴阶级去着手解决那些他们还无力解决的任务，另一方面迫使统治阶级做出他们已无力拒绝的那些让步。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发展的趋向，而只能使发展的进程更加顺畅、更加平稳。在有着稍许民主的制度的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前进运动的特点，既不是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时期所获得的那种惊人的胜利，也不是它所遭受的那种惨重的失败。从现代的社会民主工人运动在六十年代勃兴时起，欧洲的无产阶级就只遭受过一次大的失败——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当时，法国还苦于帝国所遗留下来的灾难，帝国没有给予人民以真正民主的制度，法国无产阶级还只有不大一部分人觉悟起

来，而法国无产阶级的起义是出于被迫的。

无产阶级的民主斗争方法看起来可能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采取的方法较为枯燥；无疑地，这种方法不够轰轰烈烈和有声有色，但是它所要求的牺牲也远为微小。或许，这对于那些抱着欣赏体育竞技的趣味和为了搜集引人入胜的材料而唱社会主义高调的文人墨客说来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于那些实地进行斗争的人们说来却不是无关紧要的^①。

只限于使用非军事手段如议会斗争、罢工、示威、报刊以及诸如此类影响手段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和平方法，越是在那些民主制度行之有效、人民的政治眼界和经济眼界宽广、人民的意志坚定的国家里，它的前途也就越是广大。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敌对双方中那个感觉自己优胜于对方的一方，将更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相反地，那个不相信自己和自己的事业的一方，则将过于轻易地失去沉着和冷静。

在现代的一切文明国家中，只有无产阶级是最相信自己和自己事业的阶级。它完全不需要为此而沉溺于幻想；它只要研究前一代的历史就足以理解它是在不断地前进着，而只要研究现时的发展就足以确信自己的必然胜利。因此，不应该认为某一个国家已经达到较高发展的无产阶级，会轻易地失去沉着和冷静而采取冒险主义的政策。工人阶级的教养和眼光越高，这个国家越是民主，那末做这种估计也就越少根据。

①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5页——编者）。当然，1852年时马克思在拿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比较时，还没有能够把民主制度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估计在内。

但是对于统治阶级却不能表示这种信心。他们感觉到并且看到自己是在日益削弱，他们变得越来越焦躁和神经过敏，因此逐渐失去把握自己行动的能力。他们的情绪越来越使人耽心他们的疯狂的发作。那时候，他们将在盲目狂怒的支配下猛扑敌人，消灭敌人，而不考虑这将给整个社会和本身带来的损害，也不关心将要造成的可怕破坏。

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使人可以设想，它将力求采取上述‘合法的’方法。破坏这种意愿的危险，首先就在于统治阶级的神经质。

统治阶级的政治家照例总是希望这种疯狂的发作在社会民主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进行抵抗以前尽早地发生，而且不仅仅希望统治阶级如此，最好局外的群众也能如此。这是他们延缓（哪怕几年也好）社会民主党的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办法。的确，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做法，因为如果资产阶级不能把无产阶级镇压下去，它就将因为精疲力尽而提早倒台，而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将更快地实现。但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大都认为孤注一掷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他们由于害怕革命而希望挑起内战。

相反地，社会民主党则没有任何理由采取这种绝望的政策；无宁说它有一切理由尽可能延缓统治阶级疯狂的发作，而如果这种发作已经成为不可避免，那就尽可能使它在无产阶级强大到足以战胜和制服疯狂敌人的时候发生，以便使这种发作成为最后一次的发作，使这种发作所造成的破坏和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

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避免甚至反对一切可能变成对统治阶级的无谓挑衅的东西，反对一切可能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利用来煽动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疯狂仇恨社会主义的东西。当我们说举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认为力图掀起革命的做法是无益的甚至有害的，并且遵循这一方针来决定我们的行动的时候，这决不是为了讨好德意志的检察官，而是为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致的。由于这个方针，统治阶级的政治家直到现在还未能在对付无产阶级的斗

争中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还不够强大，但它在现代国家中已经成为一支资产阶级政治家所必须正视的巨大力量。采取微不足道的行政手段已经不能使他们有任何收获；这种手段只能激怒它所损害的那些人，但并不能吓倒他们和削弱他们的斗争能力。实行旨在摧毁无产阶级斗争能力的决定性措施的任何企图，都有引起国内战争的危险；而国内战争，不管它的结局如何，必将招致惊人的破坏。每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人现在都了解这一点。尽管资产阶级政治家有一切理由希望社会民主党尽早受到它所力不胜任的实力考验，资产阶级生意人却压根儿不愿去做那种可能使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破产的冒险尝试，至少当他们还处于正常状态、还没有陷于疯狂的发作时是如此。而一旦陷于疯狂的发作，资产者当然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而且他们越是恐惧，他们也就越是绝望地嗜血。

现在，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它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坚决地避免一切可能无谓地挑起统治阶级采取实力政策的东西。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就应当从这里着眼。

但是，现在有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派或社会革命派的派别，它认为除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以外，挑起统治阶级的实力政策，是它的最主要的任务。统治阶级的政治家所幻想的那个唯一能够阻止无产阶级胜利前进的东西，成了这个受到普特卡默之流青睐的派别的代表们的主要目标。这个派别的信徒不是力求削弱资产阶级，而是力图激怒资产阶级。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是无产阶级的最后一次重大的失败。自那时以来，无产阶级利用上面提到的那种方法，在多数国家中获得了不断的进展。固然，这种进展要比我们希望的缓慢得多，但是却比以往任何一种革命运动更加充满了信心。”

.....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今天仍然坚持恩格斯和我在上面所援引的那些写作于1892—1895年间的文章中所发挥的观点。

我既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的拥护者，同样也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者。我们知道，历史形势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任意创造，我们的策略必须以历史形势为依据。

我在九十年代初曾经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无产阶级组织和无产阶级斗争在现存国家制度基础上的进一步稳步发展，将最能把无产阶级事业大大推向前进。因此，人们不能责备我过分热衷于革命和过激主义，即使我基于对当前形势的研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九十年代初起，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期；这个斗争可能在有时胜利有时失败中延续几十年，斗争的形式和延续时间暂时还无法确定；但是这个斗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大大加强无产阶级，甚至使无产阶级在西欧建立起自己的专政。

.....

摘自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中文版，第56—71页。

（刘磊 译，根据1959年俄文版）

《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

〔德〕奥古斯特·倍倍尔

本书第一版是1895年春问世的，当时对社会民主党采取新的强制措施的叫声甚嚣尘上，自那时以来，德国国内的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虽说政治上的变化微不足道，但经济上的变化则愈益重要。

从那时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步，主要由大银行所体现的资本的集中，和主要由辛迪加和托拉斯所体现的工业的集中，标志着这种发展正在达到顶峰。然而，同这些进步相对的另一极，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威力也在增长。1895和1907年两年的工商业统计数字和1893年以来帝国国会历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选民的增长数字清楚地表明了这两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把这两种情况的结果互相加以比较，就能明确认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朝资本主义方面的变化，首先承受资本主义发展重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感和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而且是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变化。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的成长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国务活动家、经济政治家和人民代表，谁忽视这一事实，他就是失职，他就没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这里详细探讨工商业统计结果所反映的经济变革，就离题太远了。任何了解这种变革的人，都不会否认这种变革。相反，各个身居要位的人总是不愿意看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

党的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一点凡是有头脑有眼力的人都不可能认识不到。

当然，社会民主党的成长不仅仅依赖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然而，之所以说不仅仅，是因为还有其他一系列次要原因在同时起作用，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这种成长，但还是在成长。1893年社会民主党拥有1 787 000张选票，1898年210万张，1903年300万张，1907年326万张，一眼便可以看出，从一个选期到另一个选期，选票的增长情况是极不相同的。1903至1907年增长最少，原因是巨大的压力和威慑使得帝国当局、各邦以及乡镇当局同统治阶级紧密联合起来，一致反对社会民主党，似乎是为了防止即将到来的对社会的颠覆。党当时所进行的斗争是一次最英勇的斗争，尽管敌人联合起来了，党获得的选票仍在增加，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评价党的力量，主要不是看议席的多少——这取决于种种偶然情况，而是看选票的数量——这表明党在人民当中的基础如何，拥护党的力量扩展到了何种程度。

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势不可挡，这使得那些热中于维护资产阶级制度的对手们惊恐不安，这是毫不奇怪的。随着社会的日趋完善，社会内部也孕育着必将成为恰恰是这个社会死敌的种种因素，认识到这一点是令人不愉快的。不过，既然腐朽的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都不愿容忍基督徒，那么，二十世纪资产阶级世界的统治阶级就更不愿意容忍社会民主党了。过去，基督徒为了他们的宗教信条而放弃了他们的社会要求，今天，社会民主党虽然没有什么宗教信条要维护，但却有政治要求和社会要求，如果它不自暴自弃，就不会放弃这些要求。

产生党的那些根源，也使得党不可能被镇压下去，因为取消它存在的根源，就是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消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就是宣告自我消灭，而这是社会做不到的。

因此，反社会党人法必然要失灵，而防止政变法草案，即使在1895年其拥护者对其中表述的基本原则能够取得一致意见，它

也必然要失灵。然而，对可憎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这种迫害本能，是深深扎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质之中的。今天的统治阶级一旦感到处境困难，或者某些事件使它们觉得似乎有利可图，他们便不顾在自己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全部历史经验，一再诉诸暴力措施。在意识到自己失势的情况下，暴力是他们唯一信赖的因素。这种迫害本能是多么根深蒂固，1910年9月底和10月柏林莫阿比特区同盟罢工引起的几次骚乱，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些骚乱必然会给统治阶级的煽动者和懦夫们提供借口，采取更加严厉的立法措施来对付社会民主党，以拯救受到它威胁的社会。自然，那种凭空猜测和想象社会民主党同骚乱的联系，是得不到证明的，甚至法庭也确认，不存在这样的联系。但是，对于关心自己的统治的阶级来说，这种假象也就足以使它能够达到采取暴力措施来对付可恶而又可怕的政党的目的。1894年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当时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卡诺遇刺一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当年曾要求实行防止政变法草案^①来对付它的那些人一样，都是无罪的。1910年莫阿比特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任何事件都必然对拜金主义者有好处。

那些案件的结局暂时抑制了对社会民主党采取非常措施的叫嚣，因为，在那些案件中，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以警察为主要支柱的制度被钉在了耻辱柱上，类似情况在文明国家里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但是，这阻止不了下次再有机会将重新提出强化立法的要求，因为不良的居心使得压迫者一刻也不能冷静。他们看到，一股日益强大的力量正奋起反对他们的巧取豪夺，他们惧怕这股力量的胜利。正如一条古老的历史经验所说：当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正在发生变革、新事物到处都在破土而出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容易头脑发昏，采取一些事与愿违的行动。本想平定局

① 见本书第29页注释〔1〕。——编者注

势，反倒激起怨愤；本想设法压制运动，反倒为之推波助澜；本想阻止运动的胜利，反倒加速它的到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见解有一点是不正确的。党在小资产者和小农当中没有获得发展，而他当时则认为必定要有所发展。他没有看到，地主和那些与德国的经济落后利害相关的阶层，在小农和小资产者中间所进行的积极鼓动。这些小资产者和小农本身就是落后的、不发达的经济状况的产物，他们甘愿受地主和倒行逆施的家伙们所喊的拯救农民和小资产者这一蛊惑人心的口号的欺骗，俯首帖耳地为这些人提供选票。他们肯定要失望，而且现时的种种征兆如果并非假象，那么，这种失望情绪已经开始出现。在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年年都取得巨大的进步，因此，就连最顽固不化的小资产者和小农对于这种现象及其影响也不能视而不见。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这些。这里谈到的那些阶层渐渐思考起来，并且必须首先摆脱许多偏见，毕竟他们在思考。如果说由于这些原因社会民主党虽取得比较迅速的进展，但还没有达到恩格斯等人的期望，那么，过去没有做到的，今后一定能够弥补。

预计，同过去的选举相比，下次帝国国会的选举，我党的选票必将有大幅度的增长。不过，只有超过350万张选票，才可以认为是实在的胜利，因为1907年选举的不利形势起码要使我们损失25万张选票，而在正常的选举中我们本应获得更多的选票。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下次选举之前，小生产者和小农的思想情绪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那时随着工人选票的增加，社会民主党所得的票数将会有大幅度的增加，那时这种情况将会使政府和统治阶级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去冥思苦想，这不是我们的任务。那时有可能的是，不管统治阶级愿意与否，迫使象德国人民这样伟大的、众多的、智慧的人民的发展走上新的道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这种时刻就会到来。

社会民主党有自己的准则，无论如何它决不会让人把自己从

它已占有的地盘上排挤掉，也不会受人诱惑而走上它觉得不保险的道路；它没有理由对自己的敌人盲目地采取轻率行动，甚至采取敌人求之不得的暴力行动。社会民主党深深意识到，整个历史发展将有利于自己，并且由于论据的力量和它的要求的公正合理，它将成为所有关心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的新社会制度的人（这总归是很大的多数）团结的核心，它可以满怀信心地、乐观地展望未来。

从我们伟大的科学先驱者的学说中我们汲取了坚定的信念，相信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物的现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将保证它有一个使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未来。

奥·倍倍尔

1911年2月19日于雪恩贝尔格—柏林

选自《法兰西阶级斗争》，1911年德文版

（王宏道译 籍维立校）

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2月30日)

〔德〕罗莎·卢森堡

.....

你们看到，这些措施^①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务——贯彻和实行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从这些措施被写入纲领到今天，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七十年的发展，历史的辩证法驱使我们今天重新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作为一种谬误而加以抛弃的观点上来。他们当时这样做是有其充分理由的。资本主义在此期间的发展使我们看到，当初的谬误而今变成了真理，实现这个真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直接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所面临的就是这个任务。只是从最初提出那一点到形成我们今天的观点和任务这期间，整个发展的不仅是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作为现代无产阶级先进国家的德国工人运动。这种发展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进行的。在对1848年革命所抱的希望破灭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了无产阶级有可能立即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此之后，各国相继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党，这些党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小规模日常斗争被说成是直接的任务。斗争的目的是为了逐步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的大军，其使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时候，去实

① 这些措施指《共产党宣言》中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提出的十条措施。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1卷，第272—273页。——编者注

现社会主义。这种变化，这种社会主义纲领据以制订的完全不同的基础，特别是在德国具有非常典型的形式。在德国，直到8月4日社会民主党解体时为止^{〔1〕}，爱尔福特纲领对它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纲领中所谓最近的，最低限度要完成的任务列在首要地位，而社会主义仅仅作为远景，作为最终目标提出来。但是，关键问题并不是纲领中写进了什么，而是如何灵活地领会纲领。对于理解纲领起主要作用的是我们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也就是恩格斯1895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那篇导言。同志们，我谈到这个问题并非仅仅出于对历史感兴趣，相反，这纯粹是一个现实问题，是我们面临的历史使命，因为我们的纲领今天的基础就是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立足的基础。在这期间历史的发展带来一些变化，随着这些变化，我们有义务非常明确地，自觉地对8月4日社会民主党解体之前一直在党内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加以修正。这种修正应该在这里公开进行。

同志们，1895年，也就是在马克思已经逝世以后，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那篇著名导言中，对这一问题是怎样阐述的呢？他一开始就追溯到1848年。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爆发的观点陈旧了。接着他继续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①然后他论述了从那时起发生的一切变化，并且谈到在德国各个政党的任务。他指出：“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

① 见本书第6—7页。——编者注

败，目前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的数十亿，简直象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则更加迅猛和持续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①

然后恩格斯列举了一连串数字，说明我们怎样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选举中逐渐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选票，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②

在这里恩格斯还透彻地批判了一种幻想，即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在街巷通过革命达到某种目的。我认为，鉴于我们处在革命之中，处在一场具有各种形式的街巷革命之中，现在是对这个观点进行分析探讨的时候了，这个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直公开流行，而且，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1914年8月4日这一天。（“对极了！”）

我这样并不是说，恩格斯本人由于论述了这一观点就对德国的整个发展过程也负有责任。我只是说，这是对这个观点所作的经典的总结性文献。这个观点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起了作用，或者不如说，它扼杀了这个党。同志们，恩格斯在这里运用了他在军

① 见本书第9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1页。——编者注

事科学领域里所具备的全部知识，向你们指出，工人群众在今天军国主义、大工业和大城市发展了的形势下，可以进行街巷革命并获得胜利，完全是一种幻想。随着这种观点，出现了两种情况：其一，把议会斗争看作无产阶级直接革命行动的对立面，并进而看作阶级斗争的唯一手段。这就是“单纯议会主义”，这是从上述批判中产生出来的。其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恰好把阶级国家的最强有力的组织——军队，即穿上军装的无产阶级群众说成是从一开始就对任何社会主义影响都具有免疫力，不沾边。如果说导言谈到，在今天大部队发展的情况下，认为无产阶级能够对付用机枪和最新技术的作战手段装备起来的士兵，只是一种幻想，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谁是士兵，谁就必须自始至终是统治阶级的支柱。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不清楚上述历史文献是在什么形势下写成的，从现在的经验出发来判断，对于这种错误发生在处于我们运动领导地位的人身上简直就无法理解了。出于对两位大师，尤其是对代表了马克思的荣誉和观点，比他逝世晚得多的恩格斯的崇敬，应该明确指出，恩格斯的这篇导言众所周知是在当时的国会党团的直接压力下写出来的。那时候，在德国，也就是九十年代初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工人运动内部明显地有一股强大的左倾激进主义思潮，它要党内的同志们不要完全陷入单纯议会斗争中去。为了在理论上打击、在实践上压倒激进分子，也为了借助我们伟大导师的权威来消除广大群众对他们的重视，倍倍尔和同志们（当时我们所处的形势的特征是：国会党团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策略上都决定着党的命运和任务）要求恩格斯写了那篇导言（恩格斯居住在国外，他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论断），因为照他们的说法，当时迫在眉睫的是，必须挽救德国工人运动，使之不致误入无政府主义的迷途。从这时起，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控制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言行，一直到1914年8月4日我们发生了糟糕的事件^[1]。这是“单纯议会主义”的宣言。恩格斯没有看到这些结果，这些运用他的导言、他

的理论的实际后果。我相信，假如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懂得他们全部学说和著作中充满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真正的、纯净的精神，就应该坚信，恩格斯会第一个起来反对“单纯议会主义”的过分做法，反对这种瓦解和败坏工人运动的行为，而这种做法8月4日之前在德国已经蔓延一二十年之久。因为8月4日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出人预料的转变，而是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历的事件的必然结果（“对极了！”）。应该坚信，恩格斯和马克思（如果他还健在）会第一个起来全力反对这种做法力挽危局，使之不致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但是，恩格斯就在他写下导言的那年逝世了。1895年我们失去了他，可惜从那时起，理论上的领导权从恩格斯手里转移到考茨基手里。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每次党代会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同志挺身而出从左面反对“单纯议会主义”，这些同志对瓦解工人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斗争，他们要大家都认识到这种行为的严重后果；而每次反对“单纯议会主义”的斗争都被打上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至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印记。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应该看做是掩盖每一种居心叵测的行为、每一种偏离真正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行为、每一种动摇不定的行为的外衣。所有这些行为，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把整个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圈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牢笼里苟延残喘，而没有做出任何认真的努力促使这个社会动摇和瓦解。

同志们，今天我们所处的时刻，可以说，我们又和马克思在一起了，又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纲领中宣布：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不是别的，简单说来，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并将资本主义铲除干净，那么我们所站立的基础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所立足的，而且是他们原则上从没有偏离的基础。现在已经清楚，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作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长期扩散的假马克思主义了（“好极了”！）。你们从它的代表人物身上可以看出，这种马克思主义今

天堕落到何等地步，它已成了艾伯特，大卫及其一伙的附庸。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把伪学说作为真正的，未被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向我们兜售了一二十年之久的官方代表。不，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和谢德曼之流一起去推行反革命政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反对那些企图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犹如一只鼯鼠挖掘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它已经使得德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今天聚集在我们的旗帜之下，在革命的战旗下迈步前进。哪里还有反革命占据着，我们的队伍就开到哪里，去赢得我们的支持者和未来的战友。

同志们，我前面已说过，由于历史辩证法的引导，经历了七十年的资本主义整个发展，我们今天又回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第一次举起国际社会主义大旗时所处的地位。当时，当人们修正1848年的错误和幻想时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还要走一段遥远的路程。当然，严肃的理论家们从来没有为资本主义的崩溃规定过准确的时间；但是，大致上这段路程被设想得还很长，恩格斯1895年所写的导言的每一段话都道出了这个意思。现在，我们可以总起来算一算。与过去阶级斗争的发展相比较，这难道不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吗？七十年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已经足以使我们今天能够扫除资本主义了。不止如此，我们今天不仅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这不仅仅是我们对无产阶级应尽的义务，而且在今天，唯有完成这项任务才能拯救人类社会。（听众热烈赞同。）

.....

摘自《罗·卢森堡选集》，1951年柏林版，第2卷，
第658—665页

（王栋华译 李成毅校）

注 释

- 〔1〕 1914年8月4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对党团内部的少数派用党团纪律进行约束的情况下，在帝国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法案。赞成这项法案就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从而使隐藏党内多年的矛盾公开爆发。右倾机会主义在战争的条件下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中派主义以社会和平主义的面目出现，支持德国防御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谎言。中派关于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联合的理论成为贯彻革命的反战政策的重要障碍。8月4日的背叛使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它使革命力量必然要同机会主义实行彻底决裂，其他大多数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也都公开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第二国际因此破产。——编者注

恩格斯的遗嘱

〔德〕麦克斯·比尔

从1891到1894这几年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广大党员革命精神衰落的开始和改良主义的兴起。导致这种发展的人主要是恩格斯和伯恩施坦。马克思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仍然同他写《共产党宣言》时一样，是一个热烈的革命者，恩格斯则不同，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中变得相当温和，他利用他对德国人的权威，引导他们退到合法性和议会策略。1894年^①，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他以导言的形式写了他的充满了改良主义的遗嘱。这是为马克思的一篇十分革命的政论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最初发表于1850年，是从无产阶级专政和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阐述1848年二月动乱的。恩格斯在1894年^①予以重新发表，加了一篇完全否定这本书的导言。实际上，这是对他同马克思合作完成的全部著作的翻案。他不赞成革命行动，告诫德国无产阶级必须信赖合法活动和议会选举。恩格斯的这篇导言一直被看作是马克思有权威的继承人的政治遗嘱，而且压制了一切关于革命行动的讨论。普选权被认为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最好的工具之一。这些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作者所表达的最后观点。而在此同时一个温和的英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改良者哥·娄韦·狄金逊先生在他论英国的议会主义发展(1894—1895)的著名文章中，对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通过通常的议会方法取得政权的可能性严肃

^① 这里应该是1895年。 编者注

地提出疑问，他论证说，保守党政府和自由党政府和平地自动地轮流执政，那是因为这两个党都有某种共同的社会原则（或者象后来阿瑟·巴尔福爵士说的“某种社会实际存在”），所不同的，只是在他们运用的实际政策上，而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胜利则意味着宣布一种新的原则和创立一个新的社会基础。

.....

摘自1922年第4期《劳工月刊》，第366—367页

（禾子译 月异校）

原书空白页

第 三 部 分

**《导言》被删节部分全部发表后
引起的新争论**

原书空白页

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导 言（札 记）

（1924年）

〔苏〕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

众所周知，恩格斯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著名导言，引起了何等热烈的争论。爱·伯恩施坦在自己所写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试图把这篇导言变成恩格斯的政治遗嘱，认为“十九世纪中最革命的学说”的奠基人之一，摒弃了自己革命的过去，给自己的学生留下遗嘱，要他们尽一切力量避免自己和马克思所犯的错误。

考茨基立即站出来坚决抗议歪曲恩格斯的话，但在同时，他也承认，出自恩格斯笔下的文本同已经发表的文本多少有些不同。如果说他的革命世界观在导言中表现得不够鲜明和清楚，那么“不能怪恩格斯，而要怪那些说服他删去结尾部分的德国朋友，因为结尾部分过于革命，他们认为，导言本来就写得够明确了。我们现在知道，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于是，考茨基给伯恩施坦提出了下列建议。

“伯恩施坦掌握着恩格斯留下的手稿，如果其中有未删去的结尾部分的导言原稿，那么我建议他把恩格斯只是迫于外部的条件而不是出于自己想法所删去的结尾部分公布出来。那时我们就能看到，伯恩施坦是没有多少权利这样来谈恩格斯的”^①。

^① 考茨基：《伯恩施坦和辩证法》，《新时代》，第17年卷，第2册，第46—47页。

伯恩施坦对这一挑战没有作答，大概是因为没有能找到导言的原文——但他却继续顽固地在自己书的所有的新版本中以及在其它文章中一再说，他只是恩格斯最后遗言的一个忠实的执行者。

必须回过头来看看恩格斯本人的证据。原来，他在生前还来得及尖锐地抗议那些对他导言所作的修正主义的解释。

例如，拉法格发表了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写给他的一封信的片断。

“X^①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②

我们在考茨基后来收入《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的文章中找到了新的证明，说明恩格斯并不十分满意这样运用他导言中的内容。

考茨基请求恩格斯在他的导言出单行本之前，允许把他的导言刊印在《新时代》上。恩格斯“很高兴地”同意了这点，他在信中写道：“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③

新的反社会主义党人法于1894年12月5日提交国会，1895年1月14日国会把它转交给委员会，4月25日前，委员会讨论了草

① 在恩格斯的原信中这里写的是“李卜克内西”。——译者注

② 见本书第51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41页。——编者注

案。

局势非常严重，只有这点说明了为什么恩格斯同意缓和某些措辞。

考茨基写道：“但当《前进报》为了对议会委员会的工作施加良好的影响，就自作主张从导言的行文中砍掉了一些地方，并且发表时的样子的确造成符合后来修正主义者精神的印象，恩格斯极其生气，在他于4月1日给我的信中写道：

‘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 my 《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①”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五年，尽管发生了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仍然没有全文发表，而伯恩斯坦甚至在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前提》的“修订和增补的新版”中继续毫不更改地重复他有关恩格斯在1899年^②改变观点的一切说法。

他仍然没有找到恩格斯的手稿。值得庆幸的是，我在伯恩斯坦转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一手稿。我们现在得以把1895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坚决要求下删去的所有地方恢复起来。

把原文同发表的文本进行比较表明，考茨基认为仅仅是结尾部分受到损害，这是不对的。更准确些说，编辑的大笔在最后五页上作了特别热心的删节。

① 见本书第50页。——编者注

② 此处应为1895年。——译者注

如果我们拿目前最容易得到的带有倍倍尔前言的1911年版本^①——该版本完全回避了恩格斯的导言曾遭到了多大更动这一问题——同原文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原来直到第18页之前，除文字上略有改动以外，我们未发现有任何重大区别。而从这一页开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为了不把整个导言重印一遍，我们现把每一个更改过的段落照原样印出来，只是着重标出一切被删去部分，

(1)^② 德文版的第18页。

“可见，即使在盛行巷战的时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坚持不到，就遭受失败。**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③

可见，谈的并不是要放弃巷战，甚至放弃街垒，而只是更谨慎细致地权衡各种机会。

接着在下面指出，1849年以来巷战的条件，无论在人民方面，还是在军队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在发表的文本中结束这一段时是这样写的（德文版第19页）。

“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象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④ 细心的编辑删去了这一段的结束部分。这就是：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

① 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附弗·恩格斯的导言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前言，1911年柏林版。

② 原文有(1)。——译者注

③ 见本书第13页。——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14页。——编者注

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它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今后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种兵力，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到时候恐怕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①

恩格斯似乎预见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我们提醒一句，早在1854年，恩格斯在为《纽约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1854年西班牙起义时写道：

“第二，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了成功的街垒战。自1848年6月起，无论哪里筑起的街垒都没有发生过作用。街垒战作为大城市居民抵抗军队的形式，似乎根本达不到目的。这种偏见现在已被驳倒了。我们再次看到了获得胜利的、不可攻破的街垒。咒语已被破除。”^②

在第20页只作了一个小小的改动。

“在罗曼语族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③

在第21页，恩格斯亲自在清样上增加了：

“我们在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赢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它一切势力不管

① 见本书第14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00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5页。——编者注

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①

在紧接着这段话后面有我们用着重号标出的、被他们删去的话：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控制能力，不是要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②

在同一页上——就是恩格斯谈到统治阶级有可能进行血腥镇压的地方——的最后一句中删去了一个指示：

“要把一个数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弹仓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危急”一词恩格斯加了着重号），决定性的战斗（发表时印的是“解决”）就会推返、延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牺牲。”^③

如果最后这个更改可能出自恩格斯本人，那么，下面第22页的如下“剪裁”无疑是党的书报检查官干的。

恩格斯一面要求普鲁士反动分子“采取行动”，一面接着说：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同一切小国家，也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是一种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整个契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示范过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④

甚至这种伊索寓言式的说法，中央委员会都觉得太强烈了。

① 见本书第16—17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18页。——编者注

我们看到，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作了最鲜明论证的著作写的导言，被人当作根据试图把恩格斯变成“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①，对此，恩格斯完全有理由感到气愤。当他的朋友们明明知道自己在玩偷天换日的把戏，却还照着做时，就更有理由生气了。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卷，第257—261页

（闻文 译）

^① 见本书第50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对 梁赞诺夫文章的题注

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阴险策略，甚至一些共产党人也产生了这种看法：恩格斯的《导言》所谈的内容至少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策略上的倒退。因此，原原本本地、全文发表恩格斯的《导言》便具有了更大的意义。

借此机会，我们提醒读者，就连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12月31日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纲领演说中也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她在谈到恩格斯这篇著名的导言时说：“我这样并不是说，恩格斯本人由于论述了这一观点就对德国的整个发展过程也负有责任；我只是说，这是对这个观点所作的经典的总结性的文献。这个观点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起了作用，或者不如说，它扼杀了这个党。”^①为开脱恩格斯的责任，罗莎·卢森堡举出了下面的情况：“出于对两位大师，尤其是对代表了马克思的荣誉和观点，比他逝世晚得多的恩格斯的崇敬，应该明确指出，恩格斯的这篇导言众所周知是在当时的国会党团的直接压力下写出来的”

（参看《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的报道》）。尽管罗莎·卢森堡在她继续演说时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则上从未背离”他们1848年所持的立场，这也丝毫改变不了下述事实，即罗莎·卢森堡觉得恩格斯有些失言了，可见就连她也始终不知道《导言》的篇幅真正有多大。

相反，使人惊奇不解的倒是，一家共产党的出版社不久前出

^① 见本书第95页。——编者注

版的一本书中竟然又出现了伯恩施坦的鬼话,说恩格斯曾极力“修正马克思的策略,也就是说取消马克思的策略”。我们指的是麦·比尔的书《战争与第二国际》(文学和政治出版社 版,第48—50页)。即使不知道梁赞诺夫这里第一次引用的曾被删掉的那些地方,也完全可以了解,恩格斯的导言是经过伯恩施坦的歪曲篡改后发表的。即使不从语言文字方面去揭露伪造之处,也十分清楚,恩格斯的导言绝无“取消马克思的策略”这种意图,因为,正如罗莎·卢森堡所写的那样,导言所论述的“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框框内它的态度问题”,这从导言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到。(参看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919年莱比锡火山出版社版,第46页)①

(王宏道 译)

① 见本书第61页。——编者注

《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

〔德〕理查·费舍

大约在一年以前，布尔什维克著作家梁赞诺夫在一家俄文杂志上发表了在后面的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删略的许多段落。不久前，《莱比锡人民报》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民主共和国》一文中谈到了这点，而且宣称，恩格斯的那篇导言在柏林由于各种顾虑而被“篡改”，“恩格斯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

这两者的说法都不符合事实。

马克思的小册子是在1895年3月出版的，于是恩格斯为此写了一篇历史评论性的导言。这正是向国会提出对付德国工人阶级的新的特别法，即当时的普鲁士大臣冯·克勒尔，这个众所周知的反动容克的典型人物的所谓反政变法草案的时候。当时的政治形势是这样摆着：如果我们的党不采取政治上的愚蠢行动，在国会里就不可能通过这个提案。恩格斯的导言手稿中有许多段落，心怀恶意的敌人由此不难对我党提出以下两方面的指责：1.“我们今日所以没有发动革命，仅仅因为我们还没有十分强大，而且军队还没有完全被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所熏染”，2.“在发生战争或其他某种麻烦事件（象当时的巴黎公社）的情况下，我们会在外国敌人的跟前举起起义的旗帜”。

这样的材料对克勒尔来说，当然是正中下怀。我作为当时《前进报》出版社的领导人，将此意见写信告诉恩格斯，并且附上写有我认为必须删改的校样。之后，我的建议又得到倍倍尔

和奥艾尔的同意，使我更有了把握。从恩格斯1895年3月8日的信可以看出，他完全承认我们的困难处境，而且同意这些建议，虽然对个别段落，他个人的理解同我们的理解显然不相一致。

本来在这里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在印这本书时，不是恩格斯明确同意删改的地方，出版社当然不作改动。这对第一版本和以后的版本都是适用的。

因此，梁赞诺夫断言，删改是由《前进报》出版社，更确切地说是出版社当时的领导人理查·费舍，没有通知恩格斯，也没有征得他同意，背着他干的，这纯粹是虚构。

鲍尔·曼斯在这一年8月5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断言说：“恩格斯对此删改表示强烈抗议。”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谁认识恩格斯，谁就知道，恩格斯也不会容忍这些删改违背他的意愿的。

不过(顺便说说)，梁赞诺夫根据他自己的经历也知道，在一个政治上没有自由的国家，为了能够传播这样一本著作，有时甚至作者本人不知道，而且也许违背作者的意愿作出一些删改。作为莫斯科马克思档案馆的领导人的梁赞诺夫将会在这档案馆里找到一些这方面的证据。

1925年8月底于柏林

选自《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925
年德文版

(禾子 译)

恩格斯的政治遗嘱

(1925年)

〔德〕卡尔·考茨基

一

我在8月一期的《斗争》^①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恩格斯的文章中谈到了我们这位大师逝世前不久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新版撰写的导言，这是他在1895年所写的最后一篇著作。他在《导言》里强调指出，他和马克思在1848年还认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少数人的起义掌握政权。这个少数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走在没有觉悟的群众前面的“先锋队”。后来的经验改变了他和马克思的看法。他们认识到，群众在能够卓有成效地着手改变社会关系之前，自己必须了解问题在哪里。

《导言》出版后没过几年，人们对它进行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围绕着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导言》最近再次发表，重新引起了人们的讨论，而且是从另一个不同于过去的角度对它进行讨论。

刚才提到的《导言》中的那个论断，在当时撰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说出了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一论断说明了长期以来普遍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即“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的必要性。这个论断是同对1793年的雅各宾主义的赞赏相对

① 卡·考茨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于《斗争》1929年维也纳版，第8期，第377—386页。——原编者注

立的，这种赞赏在184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中，以及在1848年以后的一段时期都还继续起作用。

恩格斯逝世后不久，我们党内开始出现所谓的修正主义运动。而恩格斯的这篇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政治遗嘱的《导言》，也因此变成了大有争议的对象。因为修正主义者们引证说，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为他们奏响了序曲。他在《导言》里不仅发誓放弃了1849年的斗争方式，而且完全放弃了革命。

我坚决反对这种观点。我至今还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过这里不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的地方。促使我们现在对恩格斯的这篇《导言》再一次进行较深入研究的是另一个问题。

我在1899年就已指出，后来又多次有机会指出，恩格斯在1895年3月25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过他的《导言》，他写道：

“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①

当然，了解一下恩格斯这篇文章在由于我们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损害之前原来是个什么样子，是非常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似乎认为原稿已经遗失，幸好并非如此。

最近，肯钻研而又嗅觉灵敏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找到了这份遗稿。在用德文出版的共产主义者的科学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一期（1925年3月）上，他发表了一篇谈《导言》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披露了被删掉的句子。这些句子从现在起将被加进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任何新版本中相应的地方。

因此，梁赞诺夫在为传播我们导师的著作的丰功伟绩中的确增添了一个新的功绩，可惜，令人担心的是，他的文章不会结束

① 见本书第41页。——编者注

围绕对《导言》的解释展开的争论。看来，发表梁赞诺夫的文章的杂志编辑部认为这样做还不够，因为他对社会民主党的责骂显然太少，从编辑部在新杂志开头刊登的《序言》来看，人们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就只能按海涅的“争论”原则来交锋了，这个原则就是“每一句话都是一把夜壶，而且决不是空夜壶。”^①高尚的掌旗骑士们忠实地恪守了这个值得称赞的原则。众所周知，在封建时代人们曾用这个词形容那些只提出原则，打起旗帜，走在群众前头的大人先生们。要求把这一点当作自己独有的特权的先生们，高举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告诉天真的读者说，社会民主党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掉进“混浊的潮水中去了。”在那里除了其它下流话之外，他们甚至还发现“精心撰写的淫秽文字”以及“性的放纵。”他们一再“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在理论上的无耻和思想上的堕落”表示惊讶，这些理论家们以“阉人歌手的假嗓音歌颂一切，并用唯心主义的胡言乱语来代替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掌旗骑士们投入了战斗，“反对”沉湎于性放纵的阉人歌手们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无耻行径”，反对这种“表现卑鄙的理论”^②。

编辑部在序言中用这种方式非常科学地对我们进行了“揭露”之后显然感到梁赞诺夫的论述还不够严厉。因此，它为梁赞诺夫的论述加了脚注，它在脚注中提到“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阴险手法”，引用了罗莎·卢森堡1918年的一句评语，即“众所周知，这个导言是恩格斯当时在国会党团的压力下写的”，它还补充了一句，“相当清楚，恩格斯的导言是经过伯恩施坦的歪曲篡改后发表

① 亨·海涅：《海涅全集》，1975年慕尼黑版第6卷，第1分册，第196页。——原编者注

② 参看《序言》，载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维也纳1925年1月，第1—2页。——原编者注

的”。^①

在同一期上M·J·隆斯基在评论梁赞诺夫的阐述时说：“我们现在通过文件看到，由伯恩斯坦发表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是违反作者的意志被人作了重大删节和粗暴歪曲的”。^②

遗憾的是，生活在莫斯科的人不是按照文件原来的样子来读它，而是按照需要来读它。这一次情况也是这样，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更严密地注意马克思主义掌旗骑士们了。

《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只有通过混淆各种不同的文件，并在这种混淆中再加进一些胡言乱语的办法才能形成它的“文献”科学。它把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恩格斯3月25日的那封信，同另一封4月1日的也是由我在先前发表的信搅在一起了。在4月1日的那封信中，恩格斯对我谈到了有关他的《导言》的问题：“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③

可见，《前进报》编辑部为了促使人们注意恩格斯的《导言》而发表的这篇《导言》的摘录是使恩格斯感到非常恼火的东西，从中他看到了已造成可耻印象的歪曲和篡改。这个摘录是在主编

① 见本书第112—113页。——编者注

② M·J·隆斯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文库》，载于《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96页。——原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50页，——编者注

威廉·李卜克内西手下工作的某个编辑搞的。“党的领导”，“国会党团”或者甚至当时还在伦敦的爱德华·伯恩斯坦都丝毫没有参与此事。

不能把放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版本中前面的《导言》的文本同在《前进报》上发表的这个摘录混为一谈。在《导言》中有几处被删掉了，但不是背着恩格斯删的，而是征得他的同意后删的。是恩格斯自己而不是伯恩斯坦发表这种经过压缩的文本。恩格斯在这些删改中根本没有看到他的观点遭到歪曲，于是请求我把经过这样编审的《导言》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① 以便消除他所担心的由于《前进报》发表了摘录而造成的可耻印象。

当共产主义编辑部在脚注中指出，恩格斯的文​​章由于删节而被篡改和歪曲时，却没有提《前进报》上的这个摘录，编辑部把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摘录和由恩格斯发表的文本混为一谈了，并把恩格斯对前者的评论栽到后者头上，还把一些同整个事情毫不相干的人也扯进来了，以使用这种高明的手法来揭露这全部的无耻行为，而这当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干的，绝不是它的共产主义控诉人干的。

这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掌旗骑士们完全没有觉察到，当他们认为，恩格斯会在某个什么——不管是国会党团，还是“党的领导”——的压力下，被说服写出不同于他自己认为正确和恰当的东西时，他们把恩格斯贬低到了什么地步，或者随便什么人擅自删改他的某篇文章，并在没有得到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经过这样压缩的文本时，他对此竟能无动于衷地容忍。

遗憾的是，梁赞诺夫本人似乎也持这种观点，因为他在援引了在手稿中被删掉的几个地方之后说：“如果最后指出的几处改动

① 《新时代》斯图加特版，1894—1895年卷第2册，第27期，第5—10页，第28期，第36—43页。——原编者注

可能是出自恩格斯之手的话，那么在第22页（我手头的版本是第18页）上出现的下面一些删节，毫无疑问是党内检查机关干的”。^①

我要坚决抗议这种说法，以此纪念我的伟大导师是不当的。恩格斯的手稿从未屈从过任何党内检查机关。在《导言》的全文中没有作过任何未经恩格斯同意的删节。他给我的信可以作证，他在信中明确表示，他本人“考虑”到了他的朋友们。^②恩格斯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同意一个软弱者的可鄙的怨言，这种人在朋友们的请求下作出了让步，而后又在别人那里抱怨这些朋友。

我也从不认为，对恩格斯的导言的删节等于篡改，而且是在他不知道和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干的。

我在我的《取得政权的道路》（1920年第3版，第54—55页）一文中，已说明了这件事的经过。当恩格斯撰写《导言》时，我们党正受到新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威胁。1894年12月6日提出了一个“防止政变法”草案^③，并在1895年1月14日由国会转交给一个委员会，一直讨论至4月25日。草案终于在5月11日的全体会议上遭到否决。

在草案还未遭到否决的时候，党的领导认为，要尽可能避免一切可能被利用来反对我们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柏林的朋友们请恩格斯把他当时要发表的《导言》中的一些容易被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拥护者们利用而又无损文章思想的句子删去。

就是我们当中的激进主义者也完全理解这一点。甚至卢森堡同志对我在下面所说的这段话也没有提出异议。1909年我在《新时代》上同叙德库姆就“意志不坚定的恩格斯”展开论战时写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未写过一句向任何机会主义让步的话。

① 参看本书第110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书第41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29页注释〔1〕。——编者注

但是他身居英国，面对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威胁，他认为自己无权坚持发表那些令德国朋友们担心的话，这些话可能给党带来困难，其后果要由党来负责，而不是由他来承担。这当然是一种完全正派的做法。”（《新时代》第27年卷，第2册，第416页）^①

这一做法不仅仅是正派的，而且在遭受迫害的年代也不是不正常的。因为每个具有责任感的党员同志（这种同志为数颇多）在发表他的任何意见时都应注意，不仅意见要正确，而且还要采取不会伤害党的方式发表，如果这是可以避免的话。谁要是不这样做，那他决不会被看成是一位英雄，而会被看成是一个轻率的空谈家。并且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愿意考虑经验丰富的同志们的忠告。没有人会把这看作是党的检查。

同时这始终只涉及表述思想时用多一点或少一点的适当措辞的问题，而不涉及它们的内容。据我所知，在任何社会民主党里都没有出现过党的领导给自己的党员规定哪些意见可以讲，哪些不可以讲这种事。同样我也从未见过哪位同志可耻到竟去服从这种无理要求的。

我只知道有一个社会主义党在干这种事情，而且是以最放肆的方式屡见不鲜地干这种事情的。这就是那个假装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战斗的党。它敢于在托洛茨基事件之后立即在其他人的面前咒骂党的检查机关。

二

我们只要看一下经“柏林的朋友们”建议和恩格斯同意而删去的那些句子的原文，就会认识到，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不让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拥护者们抓住把柄，而不是要改变恩格斯的《导言》的性质。

^① 考茨基：《意志不坚定的恩格斯》，载于《新时代》，1909年第39期，第416页。

——原编者注

恩格斯指出，由于武器技术的发展和新城区的开辟，无产阶级将巷战胜利地进行到底的希望大大减少了。往下，恩格斯在《导言》中写道：“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它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今后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种兵力，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到时候恐怕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①

这一段话在1895年没有发表。展望未来巷战的前景的论述，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时候发表，是不合时宜的。这一点人们是能够理解的，然而却绝不能因此就说我们党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禁止讨论这一问题。

我个人的体会不是这么回事。我在1902年撰写的谈“社会革命”的书中探讨了即将到来的革命可能具有的性质，并得出结论说：“我几乎想说，与其说下一次革命将是反对官厅的突然暴动，不如说将同旷日持久的内战相似，如果不把内战这一词同真正的战争和屠杀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话。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街垒战的武装起义以及类似的军事事件现在还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第48页）。

在1906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问世的第二个版本中，我对这句话作了修改，并在前言里说明了如下的修改理由：“今天我不再能象当初(1902年)那样明确宣布，采取街垒战的武装起义在未来的革命中不再起决定性作用。莫斯科的巷战等等的经验已足以说明

^① 见本书第14页。——编者注

问题”^①。

我在新版的正文里写道：“俄国的经验证明，对一支松松垮垮的军队来说，街垒战总还是能作为一种使部队自己意识到军队的瓦解，从而使它的纪律彻底崩溃的手段”^②。

在这里我无须解释这句话是否正确。这里要加以考虑的只有一点：没有哪一个党的领导机关曾试图阻止我发表这番话，或者在事后为此指责我。这就清楚地证明，不是恩格斯的那段话本身，而只是在1895年头几个月的形势下，这段话使人们产生了顾虑。

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的这段话是被删掉的话中最重要的一段。其它的话都不太重要。恩格斯在第16页上写道：“在罗曼语族国家，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③。

加上着重号的那句话被删掉了。人们也许担心。狡黠的诡辩者可能从中推论出只有无准备的攻击才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这句话的含义并没有因为这个删节而改变。

恩格斯在第17页上指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却拥护他们的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一个最广大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④。他们的人数在迅速而不断地增长。

他继续写道：“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是要让这支日益增长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① 考茨基：《社会革命》，1907年柏林版，第5页。——原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54页。——原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5页。——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16页。——编者注

(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象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假以时日这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弹仓枪都做不到。但是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使得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在出版的文本中此处是：解决)就会推返、迟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牺牲”^①。

在这一段话里有两处被删掉了，这两处就是我们在上面加着重号的地方。删掉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也许是“突击队”这个词使人想起暴力——尽管这只是表明步兵的一种战术上的编队——，或者是关于未来的“决战的那一天”、“决定性的搏斗”引起了顾虑。总之，这里被删掉的地方并不重要，整个思想并没有因为删节而改变。或许我们今天对删掉了这两个地方也会感到遗憾，但首先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强调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恰恰是现在，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

我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掌旗骑士们是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呢，还是他们认为他们的追随者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头脑简单，以致觉察不到这一点？当然，刚刚提到的那两个被删去的地方的使他们感到忧虑的性质，在他们的版本中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上面那段复述的完整的话《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并没有完整地刊登出来，而是被分成了两部分，它们都是各个单独地被引用的。这两部分在原文中是用上面括弧内的那段话连接起来的，但这段话没有转载，而是为一条注所代替：“恩格斯谈到统治阶级有可能进行血腥镇压”^②。

请原谅，恩格斯在删去的那段话中还谈了更多的东西。他反

①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10页。——编者注

对那些挑起同军队的冲突并因此导致血腥镇压和造成更坏的后果的革命者。恩格斯称这种“革命的”策略是适宜于用来阻止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

如果有人全部接受这里引用的这段话，包括被共产主义者方面删掉的句子在内，那么他就是以此来最强烈地反对第三国际及其土耳其斯坦人^{〔1〕}的策略。

恩格斯于1895年删去的那些话，要是保留下来的话，它们不会削弱这一倾向，而是加强这一倾向。如果各国共产主义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无条件坚信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的未经删节的《导言》，那么他们就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何等天真无邪的天使。如果列宁在他的对手那里能发现或认定有这种事的话，那他也会说他们是白痴的。

根据梁赞诺夫提供的情况，恩格斯的手稿中还有一个地方被删掉了。这个地方是以下面的字句开头的：“恩格斯一面要求普鲁士反动分子采取‘行动’，一面接着说……。”^{〔2〕}

由于这个要求对读者来说显得有点奇特，所以我们必须对此做点解释。恩格斯阐明：敌人对付不了社会民主党人，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让人诱入巷战，而是在这种形势下坚持合法行动，使自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敌人为了加害于我们就得破坏法律。“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给他们指明了也许能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诱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君主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那就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第18页）^①

我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上引用恩格斯的这段话是办不到的，因为在这里恩格斯谈到了坚持合法行动的好处，并警告不要让人诱入巷战。于是，在整个这段话中留下的只是可笑地请

① 见本书第18页。——编者注

采取“行动”。

在恩格斯向我们的敌人发出了这个要求之后，他继续写道：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同一切小国家，也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是一种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整个契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示范过^[3]。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①。

上面强调的那几句话被删掉了，大概是因为这几句话说得不明确，人们从中可能推想出极其严重的威胁。但是在删去的这些话中没有包含任何新思想。它只是应用了先前已阐明的思想，这在后来也是不言而喻的。他也没有说出什么对我们党来说是新的东西。我们党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中宣称：“德国工人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等等”^②。

当1878年出现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③时，社会民主党于1880年在维登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它能够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此作了回答，在这个回答中我们一致决定把合法二字从上面引用的那句话中删掉^④。社会民主党有权以非法手段来回报非法行为。因此，在恩格斯尚未在那段话里说出这个意思的时候，这个思想已经被公开宣布并付诸实践了。

梁赞诺夫指出的被删掉的地方一共就这么多。他把这些东西公诸于世，确实是很值得感谢的，因为，首先，对删改情况的疑问已经消除。我们现在可以看清楚，什么东西被删掉了。但是我

① 见本书第18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6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29页注释[3]。——编者注

④ 参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宫举行的代表大会记录》，1880年苏黎世版，第28页。——原编者注

必须坦率承认，我感到失望。我曾希望看到完全不同的情况，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意见：恩格斯的柏林朋友们当时过于谨慎了。然而人们必须原谅他们，因为再次实行反社会党人的前景提醒他们要谨慎。当时我们绝不会隐瞒一个重要的观点，或者冲淡《导言》的性质。在《导言》中有一句明确宣布“革命权”^①的话，这句话比所有被删掉的地方加在一起都危险得多，但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而不歪曲他的思路，这句话当然就不可能去掉，这句话作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政治遗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同他的思路有机地紧密结合一起的。

即使在这个政治遗嘱恢复原貌之后，它仍然保持着1895年我们还不知道那些删去的地方时它在我们看来所具有的性质：它现在和今后都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强有力的论据和辩护，是对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坚决批判。

即使在1895年的《导言》中恢复被删掉的地方，也改变不了任何情况。

选自彼得·吕贝：《考茨基反对列宁》，1981年柏林一波恩版，第119—133页

（陈方全 李金福 范斌译 李俊聪校）

注 释

〔1〕 保尔·列维（1883—1930），从1919年春至1921年2月任德国共产党中央主席。他在他的反对暴动主义的著作中，把那些在1921年三月行动中想表明在德国人们是怎样把事情弄糟的共产国际的代表称为“土耳其斯坦人”。参看保·列维：《我们的道路》，1921年柏林版，第54页。——原编者注

〔2〕 同上，第165页。——原编者注

〔3〕 在普鲁士退出德意志联邦七天之后，于1866年6月21日发动了对奥战争，普鲁士军队于1866年7月3日在凯尼格列茨获胜。——原编者注

① 见本书第16页。——编者注

谁是歪曲者？

〔美〕亨利·库恩

这是个愚蠢的尝试——一部分是出于恶意，部分是由于工人运动中最近出现的赘瘤，抢先派，为了继续进行半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想利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卓越的名字，恩格斯的名字——试图诽谤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行的一个出版物，即载有弗·恩格斯的《导言》的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恩格斯的《导言》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攻击的对象，这里对此加以说明。

这是一些文件的情况，开头部分可以省略。文件情况如下：

1. 1924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表了上面提到的马克思著作的英译本，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导言》。译文是根据1895年柏林《前进报》发行的小册子翻译的，小册子里恩格斯的《导言》注明的日期是“1895年3月6日于伦敦”。小册子本身也同样印有1895年的字样。

2. 在1925年11月号的抢先派的《工人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亚历山大·特拉赫坦伯格写的起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文章，文章谈到俄国共产党建立马克思博物馆，其宗旨是将所有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加以收集和分类，并相继出版，此项工作由达·梁赞诺夫主管。在这篇文章里特拉赫坦伯格先生以《德国社会主义者歪曲恩格斯》为小标题，说了件相当荒谬的事，说梁赞诺夫是怎样发现了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的原件，并且发现在《导言》发表以前，

已被爱·伯恩施坦故意作了某些删节。接着特拉赫坦伯格在两个比较专栏里首先按照“1924年社会主义工人在英国发表的译文”刊登英译文，并且在文中插进了用黑体字印的所谓被删节的部分，然后采用柏林《前进报》发行1929年版本的德文小册子，德文本中同样插进用黑体字印的他声称是被可恶的伯恩施坦删节的字句。

从这里可以看到，所谓的删节的大部分对抢先派根本无济于事，因为这些删节之处仅仅是重复恩格斯一般的看法，认为街垒战在现代条件下已不再是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可称颂的手段，只有在一两个例子中偏离这种观点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这都无关紧要，而且与下面所说的情况毫无关系。

3. 卡尔·考茨基在他《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1910年柏林第二版，第49页)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注明写于1895年3月6日。这本书在几个星期以后才问世。我曾请求恩格斯允许我在该书出版以前把这篇《导言》在《新时代》上加以刊载。

“对此他在3月25日答复我说：‘对你的来电我立即答复：“同意”。校样我按印刷品给你寄去，标题是：弗·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导言》。内容是《新莱茵报评论》上的老文章的重印，这一点在正文中已有说明。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①

考茨基也说到恩格斯1895年4月1日的信，信中说：“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 my 《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成了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

^① 见本书第41页。——编者注

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①

4. 以上所说的证实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恩格斯亲自监督了在《前进报》的小册子里刊载1895年他给《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另一点，恩格斯应考茨基将《导言》发表在《新时代》上的请求，亲自把《导言》校样寄给了他，当恩格斯写4月1日的信的时候，3月27日发表的第一部分他显然已经拿到手(邮递大约需要一天)。还请注意，恩格斯是说全文刊登在《新时代》上，从这里看显然如果在《新时代》上没有刊登过被发现的手稿里有什么的话，那这是在某个时候被恩格斯自己删节的。现在要确定的只有一点：由恩格斯监督在《前进报》小册子上发表的《导言》同考茨基刊登在《新时代》的文本是一致的，还是有所不同。如果这两个文本相一致，那么，秘密打开的后门就被闭上了。必须记住，当《导言》发表在《前进报》小册子和《新时代》上的时候，恩格斯还在世，智力十分健全，有足够的照料他自己和他的著作，以免他人损害。如果真有这样的损害，那就会发生十分尖锐的争论，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事。但是没有任何这种情况的记录。

5. 在我跟前就有《新时代》第13年卷(1894—1895)第2册，在第27期和28期里我找到了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再版写的《导言》。把1895年《前进报》小册子的文本同《新时代》的文本作了仔细的比较，结果表明，这两个文本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完全一致，只有一个非本质的问题是例外：《新时代》说梅克伦堡宪法的通过年代是1775年，这是刊误，而《前进报》小册子中的这个年代是1755年，是正确的，符

^① 见本书第50页。——编者注

合历史事实。^①

6. 就在这同一《新时代》第13年卷的第46期里刊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8月5日逝世的讣告，这是在他的《导言》在《前进报》小册子中发表以后整整五个月。

根据这里提出的事实，如果认为这位做出这个惊人把戏的先生自己被欺骗了；认为当他听到梁赞诺夫发现了他称之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里的《导言》原手稿”的时候，他十分轻率，而没有想一想，这个“发现”可能终归只是一个没有采用的《导言》最初的草稿，由后来为出版写的文稿替代了；或者认为他没有先研究而后下结论，而是因为猛一看这似乎是一个不容放过的绝好机会，所以就先下了结论，断言说“歪曲”，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太宽容了。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是不能这样宽容的。欺骗人的企图非常明显。特拉赫坦伯格先生写明了恩格斯逝世的年份1895年，但是他精心地把日期（8月5日）略去；他不提这个事实：《法兰西阶级斗争》最先是在1895年由《前进报》出版社发表的，其中恩格斯的《导言》注明写于1895年3月6日，而是采用1920年的再版本，并且不直接了当，而是狡猾地表达这样一个意思：社会主义工人党是根据那个版本翻译的；关于恩格斯亲自监督1895年的出版工作，他一点没有谈到；因为如果他这么说，就成了恩格斯“歪曲”自己，从而使整个骗局就在特拉赫坦伯格跟前垮了台。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前进报》1920年版的小册子在哪一点上不同于1895年的原版；无疑，它们是一致的，后者很可能是用同一印板翻印的，只是日期不同，但我们没有见过1920年的再版本。我们掌握的和翻译的是1895年的原版本，也就是恩格斯亲自关注的并且为了刊登在《新时代》上而寄给考茨基的他的《导言》校样的那个版本。

^① 参看本书第16页。——编者注

这里所提出的事实对特拉赫坦伯格先生和我们都一样可以接受；在他写“为了确切地说明文章执笔者对这篇《导言》如何有意歪曲和掺假，我将从1920年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最新德文版本引证”这句话的时候，他也许就已掌握了这些事实。而后来他却编起了他的致命的比较专栏，一个这样致命的比较，以致在大家看来，这该使他完蛋，因为对大家来说，文章的体面和完整并不是空洞无内容的。

（亨利·库恩，《人民周刊》，1926年8月7日）

摘自1933年9月9日《人民周刊》

（禾子译 月异校）

既是笨蛋又是歪曲者

(1926年8月6日《人民周刊》社论)

.....

十五年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看到在美国社会党的活动中酝酿着运动的悲剧。它体现了无政府思想。它在原则上和策略上是机会主义的，自然就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科学的准则作指导。它的州的组织和地方组织可以以社会主义的名义随心所欲地鼓吹任何观点——冒充的改革，无政府的暴力，单纯政治观点，基督教“社会主义”，无神论“社会主义”等等。其结果只能是思想混乱，弄成大杂烩。那些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从德国来的“老同志”，因为他们来这个国家没有多大影响，很快就不起作用了，他们怎么样呢？对于出没于社会党的数以百计的廉价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们，象希尔奎特、伯杰、斯帕戈、罗素之流，没人感到有一点难过。如果他们离开革命运动，那只能是可喜的摆脱。我们既不为德布兹和布卢尔“妈妈”那样的老感伤主义者哀痛，也不为象海伍德那样的老于世故的老无政府主义者悲叹；而社会党收罗了这些畸形人物，一般说来，这对不再受他们干扰的运动来说倒是件好事。不过社会主义工人党始终担心地注意着一件事，那就是社会党使这个国家的大批精力充沛、热情而真诚的青年男女眼睛失明，头脑不清。我们看到了前面的祸患，由于社会党内的分裂，年轻的成员，他们是热烈而又不稳定的革命者，不能再忍受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和冒充的改革政纲，而发出他们自己的“革命”呼声，……俄国革命完全使他们消除了社会党可能留

下的一点观念。革命这个词用他们的革命词句表达是即将来临的大流血。作为对社会党机会主义并不完全合乎情理的反动，这些“共产党人”被俄国所“鼓舞”而飞向另一个单纯暴力主义的极端；而且当社会党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好象刚长了翅膀的小鸟，没有受过社会主义和革命历史的训练和教育，却以为暴力是他们自己的不可思议的新发现，是一种新的“革命”策略和战略。他们最先叫喊起来，象小孩一样地喧闹——他们谈论“群众性行动”和巷战的时候，他们召集无产阶级去战斗的时候，自认为很勇敢，“先进”和“革命”。

社会主义工人党翻译了卡·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并附有恩格斯论述街垒和老式的暴力手段无效的《导言》，而且除了出版附有恩格斯《导言》的马克思的小册子外，还出版了恩格斯《导言》的单行本，题名《革命条例》。结果首先出现的就是一张拉长的愁苦面孔。设想一下，听到说单纯的暴力是运动在婴孩时期的行为，而且很久以前就已经对此作过正确而科学的衡量，发现这是不行的，这必然是多么刺痛这些妄自尊大的“革命者”。后来，不知怎么他们发现了，最初为柏林《前进报》（出版社）的出版物写的《导言》写成以后，等于是歪曲意思的《导言》摘录刊登在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上，恩格斯为此对《前进报》的一帮人大加谴责。这里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说社会主义工人党从《前进报》小册子的版本翻译的《导言》是“修正主义者”和“政客们”的“歪曲”。我们可以付之一笑，因为我们通过当时恩格斯亲密的朋友卡尔·考茨基可以证明，恩格斯亲自监督了《导言》的出版。

后来突然——瞧，一个发现！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声称发现了恩格斯最初的手稿，上面有经过用蓝笔校订的一些段落。我们不知道梁赞诺夫把这个发现看得多么重要；关于这件事莫斯科确实没有人通知过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是高贵的“聪明的”亚历山大·特拉赫坦伯格马上得知这件事，拿

着五页纸奔向《工人月刊》。社会主义工人党就被轻易地打上了恩格斯的歪曲者的印记。用蓝笔校订的段落发表了，因为它们无助于改变对事情的看法，而只不过重复已经充分说过的话，这就立即使人怀疑，这些段落是恩格斯为了出版在重读和校订手稿时自己删节的。但是这些工人党党员知道，我们神秘地猜想，删改是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搞的。这种观点是怎样由文件彻底揭示的，这在前面的一篇由《导言》译者亨利·库恩写的文章中已谈过。这件事就不必重复了。文件是十分明确清楚的，除非特拉赫坦伯格先生和《工人月刊》认错，否则人们就不能消除对他们的怀疑，认为他们曾试图歪曲伟大的恩格斯的最完善、最正确和最精心准备的策略观点之一，使之成为不可信。

说马克思主义大话的这帮人一心要使恩格斯的这篇著作受到怀疑，这一点由于以下事实而显得更加突出：还在特拉赫坦伯格拿出梁赞诺夫的“发现”之前，他们就已经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了。1925年10月号的《工人月刊》刊登了一个叫赫尔曼·邓克尔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三十周年纪念》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他以他的充满了活力的乐观主义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挺身而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倾思潮。然而，在这方面他寄希望于德国工人的健康的革命意识和象倍倍尔这些人那样的领导者的有力示范。但是，由于恩格斯只能在远方观察德国的事态，所以他往往让自己听从大陆的‘真正的政治家’，如果那里的强有力的反对派的处境会好一些的话。当1895年居社会民主党首位的受惊的兔子们以无耻的删节手段，把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歪曲为无条件传播合法性的时候，他的过分乐观主义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恩格斯在他的私人信件里，曾对此事大为生气。

但是不久以后恩格斯的逝世帮了德国的出版人的忙，而且从那以后，从经过不可靠的‘校订过的’恩格斯导言中搞出的摘录装饰了修正主义著作的每一片纸……”

象这样一篇不顾考茨基早就发表的通信（如果没有别的材料

在手头)的陈述绝对不能说是正派的,而且人们一定按其本来面目把这看作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可恶的计谋:想抹去一个人自己的坚定的、健全的、合理的说法而试图使它符合一个目的,即支持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以前还处在婴孩时期的运动所抛弃的愚蠢幼稚的策略和空洞的词句。比这更蛮横无耻地企图剥夺一个人的著作和表达思想的权利的恶劣行径在整个文献史上恐怕还没有过。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那帮人比起挤满撒谎者的工人党来说还是白衣天使。他们至少只是想损害一点在世的恩格斯的看法,而特拉赫坦伯格一伙却是玷污已去世的恩格斯。去他们的!没有比这更卑劣的人了。

但是他们是够愚蠢的了,竟想拿大家知道的,只需作少许研究就可证实的现有文件耍花招。这说明他们不仅是撒谎者,而且也是笨蛋。如果恩格斯把他们愚蠢的单纯暴力的宣传钉在十字架上,工人党一定会满意。

*

*

*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话要说。当社会主义工人党收集所争论的文件时,工人党的谎言和谩骂广为流传。在多半由1920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变节者组成的工人党的瑞典支部的《五一节》杂志上,一个以埃利斯·彼得逊的笔名伪装的众所周知的笨蛋在《以改良主义的歪曲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标题下,传播同一个“梁赞诺夫的发现”的故事。这在《工人报》上已经提到过,而且无疑库恩的纪实性的文章也将发表。但是,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那些对事情的是非曲直一无所知,不关心或不愿意作调查和取得极易查明实情的人们的卑劣。

我们的党员必须预料到在许多地方,在很长时期内还会遇到这样反恩格斯的宣传,因此就该作好准备以发表在库恩同志的文章中的事实予以揭发。

摘自1933年9月9日《人民周刊》

(禾子译 月异校)

既是歪曲者又是伪善者

〔美〕奥利夫·M·约翰逊

本周《人民周刊》对那个传说又提供了另一章：谁是歪曲者？我们用文件作证据，证明那两个英国共产党人，埃登·保尔和瑟达·保尔，大不列颠共产党人中的两位著名成员，“文人”和大学教职员全体会议的发言人，特拉赫坦伯格先生、邓克尔先生和其他美国搞滑稽表演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曾经企图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出版物与恶劣的文字剽窃联系起来）的“同志”和国际共产主义者伙伴，于1921年曾为《平民》杂志（伦敦）翻译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的导言，几乎把说到街垒战已经无用和过时的全部重要段落都删掉了。有谁听说过特拉赫坦伯格先生和邓克尔先生，这些使“我们的马克思和我们的恩格斯”免遭“如此污辱”的自封的保卫者，曾经起来反对那两位保尔和他们的译文（在他们的译文中，整段整段被肆无忌惮地抽掉了）？是否在莫斯科有哪个热心的和正直的梁赞诺夫起来把亚拿尼亚^①的印记印在他们的前额上？没人知道有这种事，而那两个快乐的篡改者至今仍是国际共产主义兄弟组织的成员。

社会主义工人党敢于翻译和出版《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革命条例》）的全文，是另一种情况。它触及了这些共产党人的痛处，因为它借助恩格斯的权威，把这些共产党人的愚蠢的无政府主义

① 亚拿尼亚是圣经上记载的一个信士，他把应该献给使徒的钱私藏了一部分。

（见《圣经》，使徒行传，第5章）——编者注

的暴力策略放进了古物陈列馆。怀疑这个工作，那真是天地倒转了。我们这样说，有充分的根据，因为从英国曾派出一个密使到大陆，他在那里呆了好几个月，试图收集一些证据来使人怀疑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译文，但却毫无结果。他失败了，又回到英国，承认他已经失败。但是他没干完的事由梁赞诺夫完成了——只是被证实遭到了更可悲的失败。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即社会主义工人党据以进行翻译的《前进报》版本，乃是恩格斯亲自监督出版的版本，这在今天仍是毫无疑问的。

....

我们同美国工人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就此结束，没有别的，只有特拉赫坦伯格先生和《工人月刊》承认错误，或者由工人党的常务委员会代表他们二者承认错误，并抛弃保尔的译文（或者由第三国际代表他们所有的人承认错误或表示抛弃那个译文）才能消除对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加以怀疑的不光采的尝试，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会支持他的。

*

*

*

这实在不能不让人相信，“莫斯科”是这些歪曲的唆使者，不管它有多少应负的责任可以被推卸。无论如何，企图怀疑我们的译文及其所依据的版本（是恩格斯所认可的）已具有如此广泛的国际范围，以至成了运动中的一件丑闻，这总是事实。由于梁赞诺夫在共产党内和苏维埃共和国内是有委任职务称号的人，他的名字与企图怀疑这个译文有关联，不管合理还是不合理，这就把整个不光采的做法同俄国共产党或者第三国际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刊印出的这些文件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一部分，对其他的调查研究者来说象我们一样都是易于理解的。

因为事态已扩展到国际范围，而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名字已经介入其中，成了完全被证实了的歪曲的控告所依

仗的权威，所以看俄国的同志是否要结束这件事，这将确是引人关注的。

《人民周刊》编 辑

奥利夫·M·约翰逊

1926年8月14日

摘自1933年9月23日《人民周刊》

(禾子译 月异校)

第 四 部 分

三十年代对《导言》的争论和评论

原书空白页

五十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英〕R. 帕姆·杜德

.....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最初几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正是晚年时期，他们已经同社会民主党不断增长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且甚至已经直接号召将来必需同机会主义决裂。如果恩格斯的忠告被及时采纳，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未来将是难以估计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就会锻炼得很坚强，并且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准备好应付帝国主义时期的到来；1914年就会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但是恩格斯的忠告没有被采纳，只有俄国一个国家是例外，那里及时实现了同机会主义的决裂，结果，当革命危机来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党作好了充分准备。在作为世界社会民主派先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直到三十四年以后，当它的工作已经十分糟糕，世界危机已经开始，革命斗争也已开始以后，才实现恩格斯所要求的决裂。这样，就给现在这个时期带来了一切艰难困苦，也给工人运动带来了一切艰难困苦，工人运动必须从落后的起点开始奋斗，并且面对强大的机会主义核心人物的阻碍，必须赶上险峻的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崩溃的进程。

社会民主党不可避免地作出了唯一的选择，压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路线，以替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路线。这是不光采的事实，在恩格斯逝世前的最后几个月已经暴露出来。1895年恩格斯写了他最后的一篇著作，即著名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这篇导言标明的日期是1895年3月6日。恩格斯于1895年8月5日逝世。在他这篇为国际工人阶级写的最后著作中，他以大师之笔勾划出了革命斗争的未来，在合法的掩护下逐渐积聚工人的队伍，引向最后的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面对这一篇导言，仔细地把其中的每一个革命的细节和涉及未来武装斗争的每个句子和每个段落都删去了，然后把它作为合法活动是未来唯一的方式的证明发表出来。《导言》的意思被颠倒，与恩格斯所写的原意完全相反（见《劳工月刊》1933年1月号第49页，在T·H·温特林格汉《现代武器和革命》一文中引用的两个主要的被删节的段落^①；俄文版《导言》全文刊登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这个残缺不全的导言被社会民主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最终放弃已经过时的暴力革命概念的“证明”在各国传播。在这种谎言流传了三十年之后，到了1924年，导言的真实文本才终于被发现，并由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公诸于世。

这种归根到底由社会民主党所搞的地道的应急伪造品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直到1924年它仍然被当作是恩格斯对布尔什维克方法的“批判”广为流传，在英国和美国也如此）。《导言》以被歪曲的形式作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到处传播，而且在帝国主义发展时代的关键时刻，它为机会主义者的合法主义大开闸门。伯恩斯坦把恩格斯这篇被歪曲的《导言》作为他修正主义运动的整个基础和出发点（见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英文译本标题为《进化的社会主义》，这篇著作反复谈到《导言》，为他自己辩护）。左派的反对是软弱无力的。恩格斯的整个的革命权威和军事上的权威非常之高，是无法对抗的。这种影响可以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的言论和路线看出，在国家问题上和对夺取政权的意义上都缺乏明确性，只限于在群众罢工等问题上试图掀起革命性的争论。甚至象罗莎·卢森堡这样的人在与伯恩施

^① 即指本书第14、17页中的两段话。——编者注

坦和机会主义者的尖锐争论中也宣称（在1898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

“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唯一暴力手段是在日常斗争中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启蒙教育”。

而且甚至到了1918年，在德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上，卢森堡在谈到恩格斯的《导言》时，还没有意识到它被歪曲，她仍然声称：

“我并不是说，恩格斯本人由于这篇《导言》就对德国的整个发展过程也负有责任；我只是说：这是对这个观点所作的经典性文献，而这个观点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起了作用，或者不如说，它扼杀了这个党。”^①

在面临如此“有权威性”的歪曲的情况下，在维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武装革命的路线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无畏、明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显得更有威力，这在今天是难以设想的，而今天，由于他们的工作，所有这些问题在原则上都已经完全清楚了。

恩格斯对这种歪曲气愤到了极点。虽然他已病重，但他立即写信给考茨基（1895年4月1日）：

“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不加删节地^②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③（黑体字是原有的。）

① 参看本书第95页。——编者注

② “不加删节”，这是本文作者的译法，后面《人民周刊》的文章就这一点进行驳斥。——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50页。——编者注

4月3日他给拉法格写信说：

“X^① 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②（黑体字是原有的。）

这就是恩格斯对这种歪曲的意见，这种歪曲三十年来成了修正主义和《进化的社会主义》^③的圣经。但是恩格斯的抗议无济于事。他的逝世使机会主义者得救。恩格斯没有能够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他的基本观点的“可耻的”“歪曲”加以更正，而于8月5日与世长辞；这就需要由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去最先发表真实情况。

随着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这种具有代表性的直接歪曲，新时期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已去世。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来到了。马克思的最后一部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据我们所知，保留了十六年没有发表，后来只是在恩格斯的坚决要求下才发表的。恩格斯的最后一篇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被直接歪曲了，编造出一个完全相反的和反对革命的意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音被压制了。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后继领导人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甚至帮助去隐瞒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最初是半自觉地，是出自“真诚的”机会主义（恩格斯的

① 指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51页。——编者注

③ 即伯恩斯坦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编者注

话)①干的,后来越来越自觉,到了1914年干脆公开背叛;从这以后,社会民主党整个公开的作用就是以粗暴的、不诚实的、故意颠倒是非的手法去诽谤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第二国际中的革命左派还在起作用。帝国主义能够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找到为它打开的途径,能够分裂工人,收买让步妥协的党派,贿赂和腐蚀其领导人。修正主义、费边主义、渐进主义、自由劳工主义、进化社会主义都在这种社会腐化的基础上浮现出来,并把这种腐化在政治制度中表现出来,享有他们短暂的时光。“所有的渣滓都开始手舞足蹈。”

.....

摘自1933年3月号《劳工月刊》社论单行本,
第13—16页

(禾予译 闻文校)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74页。——编者注

更大的歪曲

〔美〕L·科坦

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革命条例)仍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苦恼

[1924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表了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英译本，其中包括弗·恩格斯的导言。导言是一篇关于革命策略的专论，由于它的重要性，后来就以《革命条例》为标题印成单行本出版。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立即开始一场抹杀恩格斯这一著作的谎言运动——随着年代的逝去，这场运动真正成了荒谬绝伦的了。这场运动的最后部分现在（1933年）由英国伦敦的L·科坦同志来写。

显然，这里和欧洲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都感到，他们的“街巷革命”的起义政策同恩格斯的导言休戚相关；既然是那样，那他们的政策就一定失败，这在后面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鉴于问题是由英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释者”（应说是歪曲者）重新提出的，在1926年曾以《谁是歪曲者？》为题发表过的原文件将重新予以发表^①，以供马克思主义和愈益重要的革命策略问题的研究者之用。如果对国际的滑稽表演者来说，把恩格斯变为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是如此重要的话，那么对社会

① 见本书第129—133页。——编者注

主义工人党来说，证明恩格斯绝对不是这种人这一点就更是极端重要了。——《人民周刊》编者]

大约十一年前，社会主义工人党以《革命条例》为标题翻译了恩格斯著名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从而使这篇著作能为英语的读者所阅读。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论述革命的策略；并论述内战和作为阶级斗争方法的起义问题。因为他曾研究过军事科学，在军事问题上他是一位知名的权威，他的意见是不容忽视的。他根据正确的推理和技术资料得出的结论，明确反对工人阶级在现代条件下采取起义的方式。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他看来已是过时的，而且注定要惨遭失败。他谴责这纯粹是发疯。

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表这篇《导言》对共产主义的滑稽表演者来说是一大震动。然后，直到现在，这些家伙还大喊大叫要工人们采取恩格斯强烈谴责过的这种起义策略。他们吹嘘自己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而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他们所得意的政策是发疯。他们已多次试图把这种揭露解释过去。最近，伦敦的一位共产党领导人R·帕姆·杜德先生又作了一次努力(《劳工月刊》3月号中题名《五十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从生编硬造，玩弄词句来说，他的表演达到了我们对这些滑稽表演者所预期的标准。

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涉及史实、时期和文献，我们打算简要地回顾一下这篇《导言》的历史。

文件的历史

1895年恩格斯收集了马克思论“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文章，并通过《前进报》出版社以书的形式出版。他亲自写了《导言》。他亲自校订清样。他亲自监督整个出版过程。书出版以后，在他完全具有一切能力的情况下，看到并读了这本书。即使这些共产党人是象他们自己所证实的那样厚颜无耻，他们中也从没有人敢

说恩格斯写过一个字表示对《导言》出版的不满。考茨基请求恩格斯同意在《导言》印成单行本之前把它刊登在《新时代》上，恩格斯同意了，并且为此寄去了他自己改正过的校样。六天以后，即1895年4月1日，恩格斯又写信告诉考茨基说，他看到了《前进报》上的《导言》的一个摘要，搞得好象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赞成守法。接着，他又写道：

“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①

这里让我们着重说明，恩格斯并不是对《导言》被删节不满，而是对某个未署名的人所做的《导言》摘录，脱离了《导言》的内容，歪曲了他的本意不满。在我们同杜德先生辩论时，也应该指出的而且是重要的一点是：恩格斯在这里非常肯定和明确地说，他寄给考茨基为《新时代》所利用的那份稿件是《导言》全文。杜德先生自己刊印了这封信的译文，其中用“不加删节”这几个字，来替代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译文中的“全文”字样。所以，杜德先生十分清楚，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本，事实上正如恩格斯信中写到的和他希望的那样，是真实的全部的文本。因此，刊载在书里的和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本，都是根据恩格斯自己校订过的校样印出的，而且象他所说的那样，是《导言》全文。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译文

1924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用英文发表了这篇《导言》，这是由亨利·库恩翻译的，他的翻译才能是无疑问的。他根据上述两个文本翻译。他那里有刊登《导言》的《新时代》，也有根据恩格斯亲自校订的校样刊印的原版书。书和《新时代》都是由《人民周刊》转交给他的，因此，这些事实是可以查证的。

^① 见本书第50页。——编者注

诽谤开始

滑稽的共产党人对刊出这篇译文最先的反应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巴拉奇先生的作品，他声称，恩格斯在逝世前已经否认了这篇《导言》。巴拉奇先生差不多就在那时去了德国。一年多以后，在他回来的时候，遇见了本作者，他很老实地承认他搞错了，而且说明他借助于埃登·保尔和瑟达·保尔译的一本书的脚注说明了他的意见。他还说，他在德国的时候，他进行了一切可能的调查，结果使他不得不说不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译文（《革命的条例》）是最正确而完整的英文版本。当时，他以前的观点已经传到美国，而且在那里有人重述他的观点来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巧得很，这个人的名字叫帕罗特^①。对此《人民周刊》作了十分全面的答复，以致这些滑稽的表演者过了两三年才喘过气来。

梁赞诺夫的“发现”

其次，谈谈梁赞诺夫先生的所谓发现。这位先生在柏林作了调查。梁赞诺夫是个相当自负的人，有一副易于招人开玩笑的面孔，他被社会民主党人大大愚弄了一番，他们给他看几片纸，据说是恩格斯写的。就象匹克威克^②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当他们发现一个带有刮痕的门前石阶时，就认为它是考古学上的罕见珍品，梁赞诺夫深为感动，他严肃地把这些纸片拍了照片，带回莫斯科，珍藏在马克思博物馆里。他对他自己的行为和他的发现十分认真，以致他不顾所有相反的证据，把这些纸片说成是恩格斯导言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曾被社会民主党可恶的领导人从恩格斯的手稿中删掉了。有几个轻信的美国的滑稽表演者怀着破坏社

① 人名Parrott同英文的鸚鵡（Parrot）的读音相似。——编者注

② 匹克威克是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是个善良而诙谐的人物。——编者注

会主义工人党的希望，立即仓促发表这个无聊的故事。他们这种骗人的东西很快就在《人民周刊》上被揭发了，《人民周刊》充分揭露了这种说法的虚假。这个揭露后来就发表在《谁是歪曲者？》的小册子里。这是对那些共产党人提出的每一个指责的全面回答。

法 文 译 本

随后的攻击来自法国。一位法国共产党人上阵作战。他鄙视他以前的同事们走过的道路，而采取一条新路线。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笔记》里他发表了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说恩格斯尊重他朋友们即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胆怯，自己歪曲了《导言》。甚至那些滑稽表演者也不能接受这种解释，尽管这在他们所提出来的见解中还是最合乎逻辑的。

说谎者愈来愈胆大

自从《谁是歪曲者？》发表以来，英语国家的共产党人已思考了六年。现在，帕姆·杜德先生带着改头换面的梁赞诺夫的神话登台。现在我们必须提出他的文章，说明他象他的前辈一样无耻和撒谎。

杜德先生对《导言》的介绍是这样开始的：

“在他这篇为国际工人阶级写的最后著作中，他以大师之笔勾划出了革命斗争的未来，在合法的掩护下逐渐积聚工人的队伍，引向最后的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

这种看法是绝对荒谬的，只要用心读这篇《导言》，谁都能看出。正象德莱昂极力主张的那样政治行动要尽可能采用文明方法，恩格斯在他的《导言》里就是这样的主张，而且是出自同一个道理。在这第一个谎言之后，杜德先生解释道：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面对这一篇《导言》，仔细地把其中的每一个革命的细节，涉及未来武装斗争的每个句子和每个段落都删去了，然后把它作为合法活动是未来唯一的方式的证明发表出

来。”^①

含糊不清和含沙射影

必须指出的是，杜德先生象他所有的撒谎的共产主义同事一样，把他的指责精心编造得含糊不清，使之成为使人困惑、也是有意让人困惑的含糊笼统的指控，因为这样在以后就能使写作者回避和推诿责任。到底“社会民主党领导”是谁？是什么？它是李卜克内西？是辛格尔？还是倍倍尔或是梅林？杜德先生对“删节”过分肯定。那么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谁是罪人？这是不是因为以前的一个共产党人因指责一个在当时已不在德国的人而出了洋相？对一个集体进行这样重大的指控，对一切都加以怀疑，而所有的人都不能定罪，这既没有一般的诚实，也不正派。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作法是多么不同。在《人民周刊》指控这些共产党人损害恩格斯这篇真正的《导言》的时候，公布了删改的结果，这不仅使指控明确，而且指出了删改者的名字、日期、发行人的名字、发行日期、甚至删节所在的页码和被删节的部分。那是坦率的和正当的。为什么杜德先生不这么做呢？因为他的指控是不真实的，他不能证实它。从他的文章来判断，他很可能根本没有把《导言》通读过。他谴责“社会民主党领导”这个捉摸不住的实体发表了经过他们删节的文本。它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什么人发表的？我们要求他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这个被歪曲的文本“在各国”广为流传，而且特别补充说“在英国和美国也如此”。但是他小心回避说明详细情况。其他国家且不说，我们现在要求他谈谈英国和美国对这篇《导言》的出版。这是谁翻译的？谁发表的？在哪里和什么时候发表的？它的价格是多少？哪里能买到？用不着害羞，杜德先生！无疑的，没有什么比看一看这个被罪恶地删节了的版本（《每一个革命的细节》都从中“删去”了）

^① 见本书第144页。——编者注

更会使我们相信你的指责的真实性。我们向你提出挑战，并鼓励你接受这个挑战，拿出曾被“社会民主党领导”删节的恩格斯这篇著作的任何一个版本。这篇著作的英文版本已经被删节，而这个案件的犯罪者是你们自己的亲爱的埃·保尔和瑟·保尔同志。

更大的歪曲

篇幅有限，不允许我们随着杜德先生把他所有的谎言都说一遍，但是还有一个他歪曲手法的例子必须指出。如前所述，恩格斯在4月1日曾给考茨基写过信，这封信后来发表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杜德先生发表了这封信的一部分，我们将他的译文刊登如下：

“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不加删节地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①

杜德先生对此作了以下的评论：

“这就是恩格斯对这种歪曲的意见，这种歪曲三十年来成了修正主义和《进化社会主义》的圣经。”^②

杜德先生在这里企图欺骗他的读者。他暗示恩格斯是对一个被歪曲了的《导言》不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滥用《导言》的摘录不满。让我们向杜德先生指出，当恩格斯写那封信的时候，《导言》还没有发表。的确，那是恩格斯的一部分烦恼。在《导言》发表之前，报纸经理由于失信，让某个未经授权的人得到稿件校样，给报

① 参看本书第50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46页。——编者注

纸的文章作摘录。这个摘录曾被用来歪曲恩格斯的观点。《前进报》的编辑李卜克内西允许这篇文章刊登在报上。从信的本身看，这一点杜德先生应该是很清楚的。恩格斯不可能对《导言》的被歪曲而不满，因为它是在将近一个月以后才发表的，它最先刊载在《新时代》上。但是那些诋毁《导言》的共产党人，不顾事实，而这位杜德先生却冒冒失失，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歪曲”。

杜德先生，这个摘录和它的滥用并没有成为三十年来修正主义的圣经。后来也从未发表过，而且被遗忘了。

智 穷 力 继

我们可以不对杜德先生那些次要的曲解进行追究。不管怎样，我们很高兴，他发表了那封信。实际上，现在所有这些对《导言》的攻击都是以梁赞诺夫在柏林见到的那几张被老鼠啃过的纸片为依据的。但是杜德先生发表了恩格斯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也就证明了梁赞诺夫的文件毫无价值。在那封信里恩格斯写道：

“我特别希望，《导言》不加删节地在《新时代》上发表”。
这同样的一段话亨利·库恩译为：

“我特别希望，现在《导言》**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应该记住，恩格斯把稿件校样寄给《新时代》发表。因此，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本就是这篇《导言》，是《导言》全文（杜德先生译“不加删节”），而且只能是这篇《导言》。发表在书里的文本与《新时代》上发表的是完全一致的，而社会主义工人党是根据这两者翻译的。所以，如果梁赞诺夫先生在柏林发现了任何纸片，即使有恩格斯的手笔，那么这些纸片不是，而且从来也不会是那篇《导言》的一部分。《革命条例》是恩格斯寄给考茨基的**《导言》全文**。

选自1933年9月9日《人民周刊》

（禾子译 月异校）

对歪曲恩格斯的《马克思〈法兰西 阶级斗争〉导言》的评论

〔英〕R·帕姆·杜德

1933年9月9日出版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的一篇引人注目的稿子送到了《劳工月刊》社，文章共八栏，标题为《更大的歪曲》，批评《劳工月刊》1933年3月号关于对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的歪曲问题的社论《五十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既然这个问题对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重要的，而且在3月号的《劳工月刊》中的引证不够详细（这只是因为这些事实人们认为是众所周知的），那么为了不再有误解的托辞，现在显然需要作比较详细的说明。

在3月号的《劳工月刊》的社论（后来又印成小册子）中谈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对恩格斯《导言》的众所周知的歪曲；谈到了这种歪曲被用来当作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分子以及所有的改良主义者和腐化堕落分子的圣经，以便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路线，并把恩格斯说成他晚年时在暴力革命和武装起义问题上已经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路线，采取了通过选举取得政权的合法路线；谈到了恩格斯对《前进报》的摘要的意见中，已经因对他的观点的这种歪曲而感到气愤；最后，还谈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恩格斯的观点的这种歪曲，“直到1924年仍然被当作是恩格斯对布尔什维克方法的‘批判’广为流传，在英国和美国也如此。”只是在1924年，一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所掌握，并为他们所了解的，能充分说明恩格斯的革命路线、特别是武装斗争的那些被

删掉的段落，才由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最终发表出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年莫斯科版）。自此以后，这种争论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就了结。

然而，从这批评家的评论来看，显然，这种争论的余波在运动的某些角落仍然继续存在，而且被保留“到1924年”的那部分还没有为所有国家所运用。实际上，在有些事实真相还没有传到的地区，仍然有人试图把这种歪曲作为有利可图的事传播着。

从这些评论看来，仍然自称为是以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目前只不过是残留下來的德里昂主义，而英国和美国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力早已渡过了早期思想混乱的阶段，达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为基础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他们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直到1933年仍竭力以被歪曲了的恩格斯的导言为根据，重复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分子们的反革命老观点；不仅如此，而且甚至目前在真相已经大白以后，仍然试图否认歪曲的事实，并对被删节的段落的可靠性提出疑问，而了解实情的伯恩施坦倒是比较聪明，并没有试图这样做。这种图谋将是枉费心机。

对此，需要在几个要点上给予答复，因为所有的读者可能并不掌握实情。

批评家的主要论点可以尽可能公正而客观地概括为（省略“欺骗的”、“无耻的”等等虚饰之词）以下几点：

（1）恩格斯“明确反对工人阶级在现代条件下采取起义的方式。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他看来是过时的，而且注定要惨遭失败。他谴责这纯粹是发疯”；

（2）所谓的被删节的段落的可靠性是可怀疑的——“几片纸据说是恩格斯写的”，梁赞诺夫被人“大大地愚弄了一番”，“梁赞诺夫把这些纸片说成是恩格斯导言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曾被社会民主党可恶的领导人从恩格斯的手稿中删掉了，”这样的评论是“无聊的故事”，是“骗人的东西”；

（3）社会民主党领导并没有删节或砍去任何段落。“发表在

《新时代》上的文本就是这篇《导言》，是《导言》全文，而且只能是这篇《导言》”“我们要求你们拿出曾被社会民主党领导删节的恩格斯这篇著作的任何一个版本。”这种关于有些段落被删节和后来这些段落又被发现的故事是一种“奇谈”，是“无聊的故事”，是“骗人的东西”；

(4) 恩格斯同意并且写了“现在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他的生气仅仅是直接针对《前进报》的摘要的，所以对目前的争论问题已不再有什么关系；

(5) 所谓的被删节的段落，如果是确有此事，那也可能“仅仅是《导言》最初的草稿，后来恩格斯自己作了删节”；

(6) 不管怎样，这些所谓的被删节的段落对修正马克思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路线的假定的恩格斯路线并没有什么影响。“所谓的删节的大部分……仅仅是重复恩格斯一般的看法，认为街垒战在现代的条件下已不再是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可称颂的手段；只有一两个例子中偏离这种观点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这都无关紧要，同这个问题也毫无关系。”

从批评家的这类论点来看，显然他对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或者对梁赞诺夫发表这些被删节的段落的意义并不了解。在恩格斯的《导言》中有这些被删节的段落，这事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早已经知道了的。据考茨基自己说，自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争论开始以后，当考茨基直接谈到这些被删节的段落是存在的时候，他曾解释过，这些段落被删掉，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压力而不是出于恩格斯的意愿，这些被删节段落的主旨完全驳倒伯恩施坦的论点，而且考茨基要求伯恩施坦（导言原稿为他所掌握）发表全文。对这个挑战伯恩施坦没有理会。1924年梁赞诺夫的新功绩不在于他证实了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知道的这些被删节的段落的存在，而是在于他成功地首次掌握了这些资料，拍下了照片，并且公诸于世。

考茨基的声明是发表在《新时代》第17年卷第2册（1899）他

的《伯恩斯坦和辩证法》一文中。伯恩斯坦试图把恩格斯的《导言》作为他的修正主义论据的基础，对此考茨基回击说，如果说恩格斯的真正的革命路线在这篇《导言》里不完全清楚，“**这个责任不在恩格斯，而在那些德国朋友，他们强求删去结尾部分因为它太革命了。**”

接着，考茨基要求伯恩斯坦发表全文，他说：“伯恩斯坦掌握着我们大师遗留下的手稿，如果其中也有保留着被删去的结尾部分的这篇《导言》原稿，那么我要求他发表这个结尾部分，恩格斯仅仅是出于考虑外界的形势才删去的，而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这将清楚地表明，伯恩斯坦要引用恩格斯的话来作证是多么没有理由。”（卡·考茨基《伯恩斯坦和辩证法》，载于《新时代》第17年卷第2册第46—47页）

伯恩斯坦没有理会这次挑战。他把手稿搁置一边。最后，这个手稿同他所掌握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手稿一起由他转交给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就在那里梁赞诺夫于1924年找到了这份手稿，并且第一次发表了正确的文本。这个文本揭示了它不仅仅象考茨基所回忆那样是一个“结尾”的问题，而是结论部分的一系列段落，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压力下，违背恩格斯的“本意”都被删掉。

基本事实是如此清楚。

首先，照恩格斯所写的《导言》的正确文本在1924年以前从未发表过。1895年《新时代》发表的文本以及三十年来所有随后的重印本和译本（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文本）据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自己承认，是残缺不全的，某些段落因审查结果认为“太革命”而被删掉的。

第二，这些段落是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压力下被删掉的，不是出于恩格斯的心愿。照考茨基明确的声明所说的，“这个责任不在恩格斯，而在那些德国朋友”。恩格斯只是在压力下才同意在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所印的版本中作这些删节，而且这也是违背

他的“本意”的。恩格斯认为这些段落是他整个文章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在当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些领导人认为这些段落放在反社会党人法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所印的版本中是太危险了。

第三，1924年由梁赞诺夫第一次发表的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恩格斯原稿中删去的段落，是被党的领导人看作“太革命”而从原来所印的版本中删去的真实的段落。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对此也没有争论过。这却使现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的天才人物灵机一动不顾事实地去“怀疑”这些已经被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可的段落的可靠性。

现在来谈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歪曲”的指责，以及恩格斯在评论《前进报》使人曲解的摘录时对歪曲他观点表示的气愤。

主要要了解对歪曲的指责在哪里。

最初在党领导人压力下违背恩格斯的本意而删去了一些段落的不完整的文本的发表，恩格斯还是同意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并考虑到党的领导人的顾虑，不能不这样作。正象恩格斯自己在他3月25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所说的，他的文章因“我们柏林朋友们”的“害怕”而“受到了损害”：

“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1895年3月25日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文中曾加以引用。）

这事本身还不是“歪曲”，象恩格斯所说的，只不过是“害怕”。在一定条件下，对一个革命党的领导来说，以不完整的形式刊印一个文件，同时还通过口头或非法文件和实际行动等其他办法，把正确完整的指导传达给他们的信从者，这可能是完全需要的。恩格斯对在当时条件下如何刊印才合适的实际问题上没有能当场

同这些领导人的决定作斗争，虽然他们对他们的“害怕”提出了异议。然而，这种暂时不完整的印刷品，由于特殊的临时的政策和政治上的理由，还不能说是“歪曲”，只要这些了解完整文件的领导人（1）在形式上和精神实质上忠诚地维护这个完整的文件的革命路线；（2）反对把他们的信从者错误地引导到根据这个不完整的文件得出荒谬的结论；（3）与想利用这个不完整的文件以便据此提出荒谬的反革命路线的任何企图作积极斗争；（4）只要环境允许，就立即使用完整的文件。从所有这些考查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都没有经受住，因此他们也就从“害怕”走到“歪曲”。

歪曲的出现，起初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前进报》上刊印的使人曲解的《导言》摘录，他们把恩格斯的路线，搞成完全相反的，成了“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按恩格斯4月3日给拉法格的信中的讽刺说法）的路线。这是第一次歪曲。

第二次歪曲，是掌握完整的《导言》文本的伯恩施坦蓄意利用残缺不全的文本，以便在此基础上制造出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修正为持消极态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合法主义，虽然他知道，完整的文本说的是相反的东西；而且当考茨基要求发表这些他断言会证明是相反东西的被删去的段落时，伯恩施坦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以这个公认的残缺不全的文本为依据进行辩论。这是第二次的而且是远为严重的歪曲，其结果大大助长了对全世界社会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的普遍破坏。

第三次歪曲，是原来曾用以证明进行临时的删节有道理，也有必要的那种情况已经过去以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继续发表残缺不全的文本，甚至在1920年的版本里也如此，那时革命已经消除了因警察原因而不发表他们所掌握的《导言》全文的任何可能的藉口，继续进行删节的唯一理由，已完全暴露他们是蓄意歪曲，以便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三次的而且是达到了极点的歪

曲。

恩格斯在世时从《前进报》的文章看到了对他的整个路线歪曲的最初阶段。他没有能活着看到第二和第三阶段更加全面的歪曲。但是他已经对他看到的第一阶段的歪曲表示气愤。从这里就不难推断，他对后来两个阶段远为严重的歪曲会怎样气愤了，因为这种歪曲的无耻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前进报》的文章。恩格斯对《前进报》文章中对他路线的歪曲所表现的气愤是他对这全部歪曲所持态度的真实证据。

恩格斯对《前进报》文章生气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单纯因为撰稿人不得体的做法，事先没有得到他的许可而发表《导言》摘录而生气吗？不是，因为恩格斯的态度很清楚，他气愤的是对他在合法主义和暴力革命的重要问题上的路线的歪曲，他在4月¹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所说的“可耻印象”，说他“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如果说在这封信中他声称对“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表示满意（我在3月的《劳工月刊》上写的是根据第一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62页的不同的译文，而这就同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所写的不一致，考茨基写的应当认为是正确的，因此我接受这样的译文：“我比较满意的是现在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那显然他指的仅仅是预定在《新时代》发表的与《前进报》上的摘录相比相对完整的文本。因此，恩格斯并没有得到完全保证《新时代》的版本文字精确到象他的手稿的正确复制品一样，这从以下两种情况看无疑是很清楚的：（1）恩格斯一星期以前在3月25日的信中直接提到他手头的刊印校样说：“我的文章由于我们……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①；（2）考茨基说过“那些德国的朋友强求删去结尾部分，因为它太革命了”，而且要求伯恩施坦发表被删去的他所掌握的恩格斯原来手稿中有的结尾部分。

^① 见本书第41页。——编者注

恩格斯对《前进报》文章气愤的主要原因在4月3日给拉法格的信中表述得更加清楚。他反对的，很明确是反对企图从特殊的临时的建议中得出关于避免暴力革命的普遍的一般结论，他的建议是为在一定历史时刻德国运动去利用合法方式和避免资产阶级预谋挑起的大屠杀而提出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这个策略在其他国家“就不能整个采用”，而且“就是对德国，明天也可能就不适用了。”

“X^① 刚刚跟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②（黑体字系原文如此——1895年4月3日恩格斯致拉法格信，由拉法格发表于1900年11月24日《社会主义者报》）

《导言》所建议的特别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在其他国家，“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甚至在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恩格斯就是这样非常强调地警告，反对任何企图在暴力革命问题上，从这篇《导言》中的特别的策略上的合法活动，得出适合于其他国家或其他时间的任何一般的结论。但是，恩格斯所气愤和警告的这点，恰恰正是世界各国的修正主义者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后来一直所遵行的，同时却又拿这篇《导言》作为他们的依据。如果不再有扣压这些段落的暂时的策略上的理由时，尤其是当考茨基要求伯恩施坦发表它们时争论刚刚开始，就把“德国朋友”认为“太革命”而违背恩格斯的心愿不予公布的

① 指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51页。——编者注

这些段落无论如何发表出来，那么这种对恩格斯路线的全部歪曲就会被粉碎，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形成。从这点看，这种继续删改的做法，尤其在恩格斯已不在人世不能抵制对他观点的诬蔑的时候，就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文件的罪恶的歪曲。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被删去的段落是不是明确说明了《导言》中在暴力革命和武装起义问题上恩格斯的路线，把伯恩施坦和他所有的后继者竭力在这个被歪曲的《导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神话和传说一下子全部摧毁呢？他们编造的神话，说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晚年已放弃了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路线，因为这已经过时，按伯恩施坦的追随者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话说，恩格斯“明确反对工人阶级在现代条件下采用起义的方式。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他看来是过时的，而且注定要惨败的。他谴责这纯粹是发疯。”

在这里对这个问题无疑也能作出回答。原来的手稿中总共有六个段落被“德国朋友”看作太革命而被删去。所有这些段落提到合法方式之外的将来决定性的斗争，而且合法地集聚力量只不过是为了将来决定性的斗争作准备。有两个段落专门谈到未来的巷战及其成功的条件。引述这些最重要的部分就足够了。这是写在大家知道的关于新建有又宽又直的街道的现代都市及其意义的段落后面。

“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象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①

而恩格斯好象预料到了可能要被失败主义者和合法主义者滥用这个段落似地，而且恰恰这些后面的字句是被“德国朋友”看作“太革命”而被删掉的，他紧接着在这后面继续写道：

^① 见本书第14页。——编者注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样多的兵力，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到时候恐怕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①

在十月革命中表明了这个判断的每个要点的完全正确。显然，这个段落完全粉碎了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的所有的歪曲，而且，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前几个月的这篇最后言论中，再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决定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的路线，这正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所坚持的路线，只有那些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否定这个路线。

在这篇《导言》中有关恩格斯路线的事实，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删改和最后的歪曲，都是十分清楚的，没有一个真诚地正视这些事实的人会再有任何借口说认不清这个事实真相。

选自1933年12月号《劳工月刊》，第771—777页

（禾子译 月异校）

^① 见本书第14页。——编者注

最后的五年

〔德〕古斯塔夫·迈尔

.....

当事实表明“群众并不对眼前的一点点利益感到兴趣”时，这位年轻皇帝的“社会改良主义情绪”就迅速消失，这事决不会使恩格斯感到惊奇。在他看来，显然威廉二世现在走上了俾斯麦在开始执政时企图迫使他走的那条道路。倍倍尔在1891年4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有人急切地期望在某些地方发生一次冲突，以使用武力来阻止运动，他们担心不诉诸武力，运动将无法控制。”

我们记得恩格斯曾多么迫切地希望，在组成“政权核心”的多数还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之前，不要与武装力量发生冲突。恩格斯在1890年4月12日致左尔格的信中就已说过：“小威廉除了对工人的友爱之外，还实行军事专政（你看，今天所有戴王冠的坏蛋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在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我们应当注意不给他以这样做的任何借口”。^①当时恩格斯希望并认为，还保持着专制残余的君主制、土地贵族和官僚同在形式上还没有控制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尚未解决的旧冲突暂时还将提上日程。然而，他也考虑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那种被人称作不期而至或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将会导致军队与社会民主党之间过早地发生公开的冲突，或者至少是有产社会阶层与统治阶层将会联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77页。——编者注

起来对付无产阶级。因此，他充满疑虑地注视着重工业部门对威廉二世越来越大的影响。不过他相信，即使是急剧向右转的政府政策，也不能阻挡住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步伐。他在1892年2月19日致倍倍尔的信中曾这样说过：党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一个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禁止出版、结社和集会及限制普选权的某种反动措施将遭到中央党的反对，发动政变将遭到君主们的反对，他们将会直接威胁帝国的生存。因此几乎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路，这就是在行政、警察和审判方面采取更严厉的做法。这样党就可以免遭重大损失。“总之，假如普鲁士先生们没有什么崭新的天才发明，比如智力的和精神的多种管炮和马克西姆机枪之类，他们就只能用刁难的办法来找我们的麻烦，但不管怎样，对我们来说总是利多于弊。有一点真正容克地主的统治是根本不能造成危害的。不过，我担心这些先生们要做到这一点，力量还嫌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力不从心。”^①帝国议会1893年的选举没有完全符合恩格斯不久前在同《费加罗报》和《每日纪事报》的记者谈话中所表示的过分的期望。不过，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和当选议员的人数还是都增加了。

当时流传有人策划用暴力取消普选权的种种传闻并不是没有现实背景的。今天我们知道：德国皇帝在卡诺总统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谋杀后曾要求进行反颠覆的斗争，而这场斗争差一点导致公开的政变。1895年秋，卡普里维的继任人老霍亨洛埃公爵决定：“如果皇帝陛下要那样干”，他就当即辞职。由于社会民主党随时都可能发现必须做出一种无法预测的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所以恩格斯便利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撰写导言的机会，根据自己无与伦比的切身经验向党建议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时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在这里他公开承认，在马克思描述的各种冲突斗争中，曾起过决定作用的街垒战，现在已经过时，因为现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83页。——编者注

代的军队装备和训练较好，并且有着较统一的指挥和纪律。即使在巷战的盛行时代，街垒在道义上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坚持不到，就遭受失败。^① 恩格斯非常详尽地阐述了1849年以来巷战的前景变得完全有利于军队的原因。他指出：铁路的改善使得政府有可能比以前更快地聚集起可靠的军队，小口径后装连发枪的射程比过去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远三倍，射速高九倍。今天仅爆炸式的榴弹和炸药筒就足以很快炸毁最好的街垒，现代的笔直而宽敞的街道好象是为新式枪炮发挥其效力而建造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的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②

但是，恩格斯希望人们从上面的论述中不要得出结论，认为他根本不重视巷战在未来革命中的作用。设在柏林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国会讨论新的反政变法的时候认为谨慎是必要的，因此删去了《导言》手稿中的一些字句，恩格斯这位党的老战略家在手稿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巷战即使在大规模革命初期不会立即发生，在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总是会发生的，不过，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而以较大的武装力量采取公开进攻，则更为可取。恩格斯接着还谈到，反动派很清楚，为什么他们在目前这种时刻非常愿意将无产阶级引向公开斗争，为什么要指责无产阶级怯懦，因为无产阶级不愿意使自己遭受那种注定的失败。所以“这些先生们完全是徒然地在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这么笨。他们也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同样要求敌人，把军队排列成老弗里茨式的横队，或是排列成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中那样，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持燧发枪。”^③ 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国家之间进

① 参看本书第13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书第14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5页。——编者注

行战争的条件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便在其它国家，无准备的攻击也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并且到处都有人在模仿德国的榜样，决定利用选举权夺取党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然而人们是绝对不会放弃革命权利这一唯一真正的“历史权利”的，因为它是所有现代国家得以产生的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构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因此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它的增长过程同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是自发地、经常不断地、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平稳地发生的。政府做出任何努力都无法阻止这种力量的增长，而党就是要不屈不挠地保证这种力量的增长，直至它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因此在决战那一天到来之前，党不应该在前哨战中消耗自己。只有象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只有与军队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才能暂时阻止党的力量的这种发展。因为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在一次失败后，长时期地从地球上消灭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总是会阻碍正常的发展，也许在决定性时刻没有可供调遣的武装力量，决定性的搏斗就会推迟、延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牺牲。^①

因此，恩格斯在这里明确宣告：在德国目前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采用合法手段比进行暴力颠覆更好。因为他很了解，与此相反，那些将军们一定会期待在最近的将来用武力解决问题，同时他还注意到可能出现：“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这样一种情况。关于社会民主党在皇帝破坏了帝国宪法的情况下的立场，恩格斯作了简略的评论，而谨慎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当时把这段评论的话删去了。由于恩格斯意识到，他不能直言不讳地讲出自己对于未来发展的设想，所以他在这篇给德国工人阶级的遗嘱的结尾部分以历史的隐喻谈这种设想，他说：古罗马帝国的那个“危险的颠覆派”，“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

^① 参看本书第17页。——编者注

他们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法律，他们没有祖国，是国际性的；他们散布在全帝国，从高卢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①它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军团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迫害手段不能奏效，甚至戴克里先皇帝的特别法令也一样无效，在公元303年大规模迫害基督徒后的第十七年，罗马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的专制君主就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了。

被倍倍尔在当时称为“党的领袖”的恩格斯在逝世前的五个月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后表明了他的不可动摇的胜利信心。但他同时也十分严肃地告诫党不要被敌人诱骗到战场上去，在那里它注定要遭到失败，从而使党的前途受到损害。由于考虑到防止政变法的情况，恩格斯同意对他的导言作一些删改。但是当他看到印好的导言无论在他自己或他人看来他都象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时，他极其气愤。这位老人当时在给拉法格、考茨基和理查·费舍的信中对此大发了脾气。他认为特别应该让法国人懂得，他所建议的这种和平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他在1895年4月3日写给拉法格的信中请他相信：“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②

关于恩格斯在他晚年时似乎曾劝告欧洲社会民主党不要采取任何武力的说法，纯属谣传。这位老战士直到弥留之际仍然认为，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不经过激烈的战斗而夺得政权。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总是热情地乐意把自己的经验和军事知识贡献给那些随时都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尽管他主张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都应避免普鲁士警察找碴，

① 见本书第18—19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51页。——编者注

但是在他的最后时期还象当时巴登起义时那样把“枪炮的呼啸声”，看作是“一种完全微不足道的小事”。

.....

摘自古·迈尔《恩格斯传》1934年海牙版，
第495页—499页

（刘丽明译 赖升禄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一版第十六卷第二册说明

〔苏〕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阿多拉茨基

第十六卷的后半部分收集了恩格斯九十年代的著作，直到他最后的一篇论文——还在他逝世前就已发表了的为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以及在他逝世后才发表的著作《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短评《交易所》。

关于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这里有必要扼要地谈谈机会主义者对这篇导言的歪曲。正是恩格斯的这篇文章被机会主义分子们说成是他的政治遗嘱。在这里恩格斯似乎背弃了自己的革命的过去，似乎他建议工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能采取和平的方法（借助于选票），议会主义的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合法性的基础。恩格斯本人曾坚决抗议对他的思想的这种歪曲。

恩格斯的《导言》发表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决定对恩格斯的这篇文章进行书报检查，删节一些地方，在这些人看来，恩格斯在这些地方过于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工人运动的革命性和从议会方法向高级的革命的斗争形式（武装起义和内战）过渡的不可避免性。

作为《前进报》出版社的负责人的费舍曾写信给恩格斯，请求他同意删去和修改某些提法。他借口说，在九十年代中期，德国又制定了新的反对革命工人政党的非常法（防止政变法），在这种时候，恩格斯的过于激烈的言词可能被人利用而有利于社会民

主党的敌人。

费舍在1895年3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写道：“怀有敌意的对手不难从你的论述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承认我们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进行革命，只是因为我们力量还不够强大，因为军队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感染，——而对于反革命党人法来说这正是需要证明的；二、如果发生战争或其他任何困难的情况，我们就会象公社那样，在祖国的敌人面前，举起起义的旗帜。这类‘材料’简直是一种‘美食’，而我们方面的所有解释都只会被当作是试图辩解或抵赖。”^①

恩格斯对这封信的复信被社会民主党人隐藏起来了。但仅仅根据费舍于1895年3月14日的复信就可以判断，恩格斯同意删去某些地方，但绝不允许对他的提法作任何修改，而且显然在答复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来信时，说出了不少令人痛心的真情。

费舍写道：“你的意见是根据完全错误的前提作出的。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要‘立誓忠于绝对守法’（这是恩格斯信中的话，费舍把它放在引号中），……在另一点上你也没有正确看待我们，你以为，似乎我们向敌人投降，并承认合法性是道义上的义务。”

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可耻的演变（这种演变完成于1914年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证明，恩格斯是多么正确。

然而，《导言》不仅仅受到书报检查。就刊印出来的整个文章看，它即使是经过了这种书报检查之后，如果没有对恩格斯思想直接的牵强附会和曲解，也不能说成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并不满足于扮演恩格斯的书报检查官的角色，他们进一步试图伪造他的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李卜克内西发表了《导言》的摘要，把它搞成这么一种样子，致使恩格斯看起来成了奉公守法的合法性的拥护者。对此，恩格斯十分不满。他于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写道：“使我惊讶的

^① 这段引文同费舍原信的用词有些不同，这里是按俄译文译的。——编者注

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

1895年4月3日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该信于1900年在《社会主义者报》发表）。恩格斯写道：“李卜克内西（在发表的文本中没有指名）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

恩格斯的《导言》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九十年代在德国形成的环境，而且说明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政党有必要不破坏合法性，以便使自己成为政权的代表。在德国的“和平”宪政发展时代，造成了最广泛地宣传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的条件。这种条件应当充分利用。列宁于1914年12月在谈到恩格斯在九十年代取消非常法之后所采取的立场时写道：“恩格斯1891年在捍卫（十分正确地）我们革命家利用所谓和平宪政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的合法性时写道：‘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第一枪吧！’恩格斯的意思十分明显：我们觉悟的工人将开第二枪；现在，利用资产阶级自己破坏自己所建立的合法基础的时机从选举过渡到‘开火’（即国内战争），对我们更为有利。”（列宁《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①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79页。——编者注

利用合法性最广泛地宣传革命学说，训练群众进行未来的战斗——这就是恩格斯的观点。难道还不清楚吗？这种观点与费舍和奥艾尔的立场毫无共同之处。关于他们的立场，伯恩斯坦曾于1926年费舍逝世时所写的悼文中写道：“对政治力量的清醒估计使他们成了任何以为社会主义已接近实现的极端幻想的反对者”

（《社会主义月刊》1926年第63卷）。恩格斯建议利用合法性进行组织的准备和开展群众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他如同马克思一样，认为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无产阶级斗争和胜利的条件在不断成熟。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

社会民主党人掌握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档案，他们从来没有完整地发表过恩格斯的《导言》全文。恩格斯的《导言》第一次没有删节地全文刊印，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

.....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1936年第1版，
第16卷，第2册

（禾子译 月异校）

原书空白页

第 五 部 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外
有关《导言》的评论

原书空白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1954年 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 导言》题注

恩格斯写的这篇《导言》曾经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方面粗暴地歪曲过。1895年3月，威·李卜克内西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了从《导言》中任意摘出的若干片段，采取了一切“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1895年4月3日恩格斯写给拉法格的信）。1895年4月1日，恩格斯关于这事写信给考茨基说：“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

但是无论在《新时代》杂志上，或是在1895年的单行小册子中《导言》始终没有全部发表出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方面曾写信给恩格斯，说有新的非常法律威胁着德国社会主义者，由于领导方面坚持的结果，恩格斯不得不同意删去《导言》中谈到未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的若干在政治上最尖锐的地方。

掌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文库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始终没有把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全部发表过，却企图利用这篇论文残缺不全的部分来辩护自己的社会主义政策。

恩格斯写的这篇《导言》全文，只是在苏联才第一次发表出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
莫斯科版中文本，第95页

论理论和实践的一致

——爱德华·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

〔联邦德国〕克里斯蒂安·格诺伊斯

.....

伯恩施坦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内在发展，可以说是在恩格斯的眼皮底下进行的。直至恩格斯于1895年逝世之前，看不出他们两人之间有任何对立，即使恩格斯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伯恩施坦同费边社分子的来往的。恩格斯指定伯恩施坦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并把自己的文字遗产托付给他和倍倍尔。伯恩施坦同正统马克思主义决裂的第一批文章是在恩格斯去世后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①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从1896年起开始发表的。因此，猜想恩格斯对这些文章会有什么反应是毫无益处的；相反，如果问一问在恩格斯晚年的言论中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看成是修正主义理论的萌芽，这倒是很有意义的。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是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所写的导言。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在1848年法国革命之后不久写的，1850年在《新莱茵报评论》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1895年才第一次由恩格斯汇编成书出版。该书的出版与德

① 《新时代》，第15年卷第1册(1896—97)，第164—171、204—213、303—311、772—783页；第15年卷第2册(1896—97)，第100—107页；第16年卷第2册(1897—98)，第225—232、388—395页。1901年这些文章汇成一本书(爱德华·伯恩施坦：《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1901年柏林版)重新发表。

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不无关联。在此期间，帝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即“关于修改、补充刑法法典、军法法典和出版法的法律草案”。根据这条法律，号召举行暴动和武装政变将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首先必须努力证明，它已经选择了通向政权的合法道路。特别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中的灵活的策略，上述法律草案在帝国国会上被多数人否决了。对于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必须联系这个背景来看。^①共产党人谴责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说它篡改了恩格斯的《导言》并以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为由扣压了恩格斯的《导言》中某些极端重要的地方而未予发表。把恩格斯原来的文本^②拿来和实际发表的《导言》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导言》中确实有几个地方被删掉了，这几个地方可能会削弱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辩论“防止政变法草案”时的立场。然而，正象1926年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的理查·费舍致恩格斯的一封信所表明的那样^③，删掉这几个地方是完全得到恩格斯的同意的。

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标明的日期是1895年3月6日，恩格斯是在同年8月5日去世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恩格斯在逝世前五个月写下来的思想理解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他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问题。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恰恰在新旧世纪交替的那些年月，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仅对于修正主义来说，而且例如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也都成了中心问题。马克思没有留下说得清清楚楚的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理论。因此，当恩格斯在

① 参看《政变和社会民主党》I，载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第2期，1947年奥芬巴赫版。

② 这个文本在1924年由梁赞诺夫第一次发表。

③ 参看《政变和社会民主党》I，第3页。

1895年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并不是想修正一下马克思，而是想根据和1848年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势用一些具体的提示来充实马克思就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一个别领域所勾划出的一般轮廓。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言论是多么含糊不清，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作为证明，即列宁自认为他的革命理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思想的。

恩格斯的《导言》是从十九世纪中叶的形势谈起的，他承认，他当时对社会主义获胜的机会估计错了：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为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的作用，而现在又是它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传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

.....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藉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方面都已经过时了。”^①

恩格斯的这段话明确地拒绝了把法国革命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同后来的列宁的对立在这里已显而易见。恩格斯认为，以往的一切革命的特征是，革命的承担者是少数人；反之，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是，这个革命必须由多数人来承担。1848年时还不是这种情况。那时无产阶级还是一个少数。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②

① 见本书第4、5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6、7页。——编者注

现在无产阶级壮大的过程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一方面可以从向前发展的工业化中看出来，而另一方面——就这方面而言，恩格斯已经离修正主义很近了——可以从选票的数字中看出来；恩格斯简直陶醉在数字中了：

“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 1871 年为 102 000 张，1874 年为 352 000 张，1877 年为 493 000 张。接着就是当局以实际反社会党人法来高度赞扬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 1881 年降到了 312 000。但是这种状况就很快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 年为 550 000 张，1887 年为 763 000 张，1890 年为 1 427 000 张。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没有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 1 787 000 张，即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①

鉴于恩格斯对九十年代相对不大的选举成果都已感到欣喜若狂，那么试想一下，他若经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1912 年的选举胜利更会如何呢。他继续写道：

“但是，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②

从这一点来看，恩格斯显然给了拉萨尔以肯定的评价。接着他说道：

^① 见本书第 9、10 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 10 页。——编者注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就是说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①

这里也表现出恩格斯对军事战略考虑的偏爱。他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军事技术证明，依靠街垒无产阶级几乎再没有获得成功的希望了。

“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他们自己就会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了。”^②

照恩格斯看来，“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首先必须在议会内进行；这一教导不仅适用于德国，而且适用于一切国家——也适

① 见本书第11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5页。——编者注

用于俄国：

“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即小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①

这一新任务的先锋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不可遏止的，并且是平稳的，就象自然界中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对此进行的一切干预，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赢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并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是要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②

恩格斯完全估计到了反动派有朝一日会企图用政变强行阻止这种发展的可能性：

“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象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③

然而恩格斯绝不认为这种可能的发展是什么值得追求的东西，他警告人们不要挑起这样的事端，因为：

“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就会推迟、延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牺牲。”^④

恩格斯从这些分析中得出了结论：社会主义发展为群众性政

① 见本书第16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6—17页。——编者注

③④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党的不可阻挡的过程就象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的胜利传播一样，这后一过程最后以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而告终。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①

这些思想和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论点——这一修正主义理论中的有争议的核心问题已非常接近了，尽管恩格斯在这里还没有象后来的修正主义者那样否认最终发生革命的武装起义的可能性。但是，既然恩格斯已把决战的这一天推迟到遥远的将来，并告诫人们在此期间要谨慎行事，那么他这样做非常有助于修正主义政治的战略和策略在当前在理论上已获得越来越大的地盘。例如，伯恩施坦在他致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中就明确地援引恩格斯的这篇导言来替自己洗刷，反对说他离经叛道的指责。他认为，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已把灾变论束之高阁了：

“恩格斯深信，以灾变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因此他认为，即使在罗曼语国家（那里的传统对执行这一策略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也有必要对这种策略作出修正。他写道，‘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难道大家已经忘记这一点了吗？”^②

伯恩施坦在他以后写的著作中也一再引用这篇导言。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1957年第2期第201—206页

（李俊聪译 李成毅校）

①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②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21年（1）斯图加特—柏林第2版，第8—9页。

几个发展阶段

〔南〕普勒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必须特别说明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因为后来的修正主义者把它作为真正代表恩格斯对革命问题的观点的重要文件和论据。这就是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这篇导言因为是恩格斯在1895年3月，即逝世前几个月写的，所以被称为他在理论上的遗嘱。

正是这个伯恩斯坦断言：恩格斯否认革命是取得政权的手段，并宣布议会道路是比较适宜的道路。尽管恩格斯写这篇导言时考虑了李卜克内西要他“缓和些”的请求，但恩格斯在实质上丝毫也没有放弃他和马克思的观点。他只是强调了某些历史经验，首先是说明了现代街垒战斗是十足幻想的东西（因为它们是防守性的、消极的），并指出了在那些年代里取得重大成就的议会斗争的意义。但是归根到底，他从来没有否定过革命。

当时必须赶快澄清被修正主义者掩盖的基本问题：街垒战斗并不是革命。革命是攻击、掌握政权、改变社会关系，而街垒战实质上却是防守性的。因此恩格斯完全正确地作出结论说：“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就是说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对起义者来说，关键是要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士气，而这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会有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这一点做到了，军队

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者就会胜利。……

可见，即使在巷战的盛行时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坚持不到，就遭受失败。”^①

恩格斯正确地指出，由于军队、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巨大进步，工人阶级正面临着新的情况。他实际上是重申了他和马克思一直强调的观点：革命不是由少数优秀的人们进行的，我们必须牢记，“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他们自己就会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应该拥护什么。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了。”^②

恩格斯对上述这项工作和议会斗争的好处和效果不抱任何幻想。他特别强调，必须经常使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保持这样的增长程度，“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是要让它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③由此可见，恩格斯根本没有把这个“决战的日子”设想成一个友好联谊的节日，而是把它看作一场决定性的阶级搏斗，为此必须发动一切未经发动的力量。“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④，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中就以这些话再次论证了对上述

① 见本书第11—13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5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16页。——编者注

问题的基本观点。

恩格斯直到晚年，在他逝世之前，在分析和评价人及其历史性的行动方面，始终保持着革命的明确性。

摘自普·弗兰茨基《马克思主义史》1961年萨格勒布版，第55—5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 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二卷恩格斯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题注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写的。

从1895年3月6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是政府在1894年12月间向帝国国会提出的，1895年1月至4月间进行了讨论；同年5月该草案被否决）。

恩格斯在给费舍的复信中（复信尚未找到，但根据1895年3月14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断出它的内容），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结果，在他看来，导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在本版中，这些删改都在脚注中注出。由于做过这些修改的条样以及导言手稿保存了下来，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

那时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企图根据这一著作把恩格斯说成是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拥护

者。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目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捍卫者。感到非常愤懑的恩格斯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反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强调了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的重要性。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把《前进报》在发表导言上的这种不光彩做法告诉了他。

在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坚持，¹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专门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作者在上述单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删节。在德国不再存在颁布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危险之后，导言的全文也还是没有被发表。

可是，即使经删节后发表的导言，还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质。要用改良主义精神来解释这个文件，就必须粗暴地伪造恩格斯的观点，就象爱·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以及其他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在恩格斯逝世后所做的那样。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虽然掌握着导言的手稿，但不让读者看到导言的全文，他们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校样上作某些删节的客观情况并对导言公开发表的文本进行歪曲，他们通过这一切办法做出诽谤性的断言，说什么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他们把导言说成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中重新审查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几乎站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修正主义者力图以虚假地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掩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和对革命原则的攻击。

恩格斯的导言曾经根据《新时代》杂志的文本以删节的形式登载在1895年《社会评论》杂志第9期和1895年保加利亚《事业》（《Дело》）杂志第1册上。

1930年，恩格斯导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发表。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
第766—768页

九十年代恩格斯捍卫科学社会主义 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 和修正主义倾向的斗争

〔苏〕B. A. 查钦

.....

主张与机会主义调和的人并没有停止试图歪曲恩格斯在革命问题上的观点。1895年，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新版所写的导言，但导言被特意删节得残缺不全，从中抽去了所有关于暴力革命和武装起义策略的论点。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恩格斯在晚年似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立场的虚假神话。这个神话的创造者和散布者正是机会主义者和对他们采取调和态度的人。目前，这种歪曲已成为当代改良主义者手中的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工具。例如，尤·勃朗塔利在《国际史》一书中竭力把晚年的恩格斯说成是改良主义的拥护者，他的根据只是从恩格斯的某些著作（其中有为马克思著作而写的导言）^①中离开上下文随意摘引出来的个别段落。

恩格斯反对对自己的革命和武装起义策略的真实观点的歪曲，他在1892年^②4月3日给拉法格写信时谈到李卜克内西的不体面行动时说：“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

①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编者注

② 这里应为1895年。——编者注

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是有重大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①

恩格斯非常坚决地排除了机会主义者对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解决革命问题进行歪曲的企图。他强调指出，他不能允许为适应现实社会条件而对马克思观点进行任何一点歪曲。反对资本主义的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他不仅没有排除，而且认为有极大的可能。恩格斯反对卓万尼·博维奥在《论坛报》上的文章中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问题上对他的观点进行歪曲，他在1892年2月6日给菲·屠拉梯写的信中说“首先，我根本没有讲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②

同时，恩格斯也反对那些促进社会党人过早出动的左倾无政府主义分子，还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之前，他就批评转到无政府主义立场上去的“青年派”坚持生硬的宗派主义，反对党参加议会活动。

恩格斯指出必须争取群众来支持社会民主党，指出为了使群众准备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要利用一切合法条件。他请倍倍尔和其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注意无政府主义常常是以机会主义的另一面出现的。而实际上，后来以弥勒、康普夫麦尔等人为

① 见本书第51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27页。——编者注

代表的“青年派”成了极端的机会主义者。

摘自B.A.查钦《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1964年俄文版，第143—145页

（晓林译 禾子校）

最后的几年

〔苏〕Б.Γ. 塔尔塔科夫斯基

.....

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还有最后一篇著作，即他在1895年3月初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这里，恩格斯阐述了他关于在社会主义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大大增长，因而在他们面前展开了较有成效地利用合法斗争方式的前景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和手段问题的观点。这篇著作的主要思想如下：在现代条件下，武装起义不是使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中的唯一手段。无产阶级以合法的手段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可能取得政权，其中在选举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应该起着重大作用。但是和平取得政权不是唯一的途径，而且可能甚至不是主要的途径。如果资产阶级在对待无产阶级的关系上破坏了他们自己所创建的法制，“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放开手脚，而能随意对待你们（资产阶级——作者）了。”^①简而言之，在必要的时候，无产阶级将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暴力行动。但是，这首先需要长期准备：“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他们自己就会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②其次，革命本身不

① 见本书第18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5页。——编者注

管是以什么方式进行，只有在客观必要的先决条件成熟的时候并相应的有利环境已经形成的时候，革命才能进行。应该避免轻率的无准备的发动，也不要上反动政府的挑衅的当。因为这样的发动只能给无产阶级的革命先头部队严重的打击，并且妨碍它在群众中进一步地扩大影响。恩格斯在这里不用“革命形势”这个说法，但是他说的“决战的那一天”，“决定性的战斗”，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知道，恩格斯因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请求，不得不在导言中删去了一些最尖锐的词句，因为当时德意志帝国政府正在准备防止政变法草案，^①即新的特别法草案，德国党领导人不愿给当局再增添口实。但是恩格斯完全保留了他的著作的革命本质。

摘自B.Γ.塔尔塔科夫斯基《国际无产阶级的顾问和导师——恩格斯》，1966年莫斯科版
(禾子译 闻文校)

① 见本书第29页注释(1)。——编者注

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权问题

[法]米歇尔·佩罗特

(2) 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一瞥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据着优势。它以自己高超的理论，强大的组织和选举的成就获得了西方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马克思，继而恩格斯都把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德国看作是很可能发生未来革命的地方。而第二帝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证实了这一预言，那时人们认为社会革命似乎只有在发达国家中才会发生。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的成功使恩格斯发展了关于政治斗争新策略的思想。我们在他的许多文章、时政谈话、书信、论文，特别是在他写的著名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恩格斯的这篇导言于1895年发表在《前进报》上，后来又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刊登时都作了删节。作者对此提出了抗议。^①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表明了德国机会主义的发展。后来，恩格斯的这篇导言又被所谓的修正主义流派引用，当作对自己的支持。当国家机器中布满敌人的时候，恩格斯指出，起义的方式已经过时。革命不再是少数积极分子的事情了。巷战虽然有时是必要的，但也只能是最后的，归根结底是次要的手段。而利用普选，利用市政和议会活动却是卓

① 这点与事实不符，恩格斯只是对《前进报》提出抗议。参看本书第51页。

——编者注

有成效的。在国家机构内部进行的这种长期的、合法的、和平的争取工作应成为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任务。在德国“我们在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赢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并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①在同十九世纪中叶提出的革命策略进行比较的时候，他写道：“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合法性害死我们，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身强力壮，面带红光，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②从恩格斯逝世前几年某几次的记者访问中，也可以看到他对通过选票的大量增长而取得社会主义政权寄予希望：“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真的！请您看一看从我们开始议会斗争以来我们的拥护者的人数吧。它随着每一次选举不断增长……我们可以确定大部分居民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时间，我们的思想既在工人当中，也在教师、医生、法学家和其他人当中到处传播。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我坚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再过五年或者十年，这样的人才在我们这里将会超过我们所能使用的数量。”^③社会民主党在1893年议会选举中取得的胜利加深了他的信念。《每日纪事报》记者见到“喜气洋洋”的恩格斯，问道：“那末，您希望

① 见本书第16、17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29、630页。——编者注

很快看到您那么想看见的执政的社会党政府吗?”“为什么不想呢?如果我们的党今后也以正常的速度发展,我们在1900年和1910年之间将拥有多数。到那时,你就用不着怀疑,我们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能实现这些思想的人才方面,都不会有所欠缺。”^①从灾变性革命到人们不无时代错误地提出的有步骤的革命,恩格斯优先考虑到技术人材(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等)。然而从街垒战的狭窄街道到合法斗争的宽阔大道,路程还十分遥远。^[1]

这些论述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表现为一种正在探索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它们证明了恩格斯对他那个时代的变化具有强烈的意识。不过恩格斯没有来得及把这些预感变成严密的理论。在同拉法格的密切通信中,他表现得更为谨慎。他虽然主张合法行动,但又反对妥协。^[2]对于那种为了寻求支持者而进行的机会主义冒险,他是从不放过的。无论在盖得派^[3]还是在社会民主党那里,他都能识别出这种病症。

然而,从那个时期,特别是1895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来越转向议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它同威廉王朝的德国日益结为一体。这时,德国正处于上升时期,这种上升既是胜利也是倒退,它对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强大的民族往往具有征服的意识。雅各宾派处于法国扩张时期,因此,它把本国的意志同普遍的利益等同起来并企图领导各国人民的解放,同样,社会民主党也把强大的德国看作是进步力量的中流砥柱。^[4]它以西方社会主义的领袖自居,在第二国际内部强制推行自己的路线,即政治活动、选举和议会活动居绝对的主导地位,工会活动则是次要的,公开谴责无政府主义,反对总罢工,甚至反对在战争时期的罢工。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对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重新加以考虑。^[5]这里几乎建立了德国的霸权,接连不断的斗争,首先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极左派的斗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36页——编者注

争(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6], 1897年伦敦代表大会^[7], 等等), 然后是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右派的斗争。不过对后者斗争的激烈程度不象对前者那样, 作法也比较微妙, 未免流于形式。所以, 伯恩施坦最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产生了巨大影响^[8], 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 某些批判具有虚假的性质, 似乎人们企图在改良主义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革命的理论。类似的情况还明显地反映在社会民主党对法国问题即对内阁主义以及更为广泛的饶勒斯主义的态度上。从许多方面来看, 内阁主义和饶勒斯主义是一种新的观念, 这种观念奋力反抗德国的指挥棒。在社会民主党眼中, 饶勒斯是一种令人不安的, 不可理解的现象。在饶勒斯刚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时候, 恩格斯对他就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最后他却承认了饶勒斯的“善良愿望”。^①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保存的盖得的档案中, 有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写的关于饶勒斯的信件, 这些信件说明他们对饶勒斯持很大的保留态度。考茨基在1904年8月30日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同饶勒斯无法实现统一。但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孤立他, 或者使他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承认, 他是法国社会主义分裂的真正原因。”^[9]然而统一仍然实现了, 因为饶勒斯认为这是他的主要目标, 为此他完全作了让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最高裁决者不断进行干预, 它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 它也通过内部来起作用, 因为它的发展和矛盾在它的忠实信徒盖得派的政党里也得到了反映。而这种从属关系并非总是有益的。

摘自米歇尔·佩罗特和昂妮·克里热尔《法国社会主义和政权》1966年巴黎版, 第43—49页

(李其庆 译)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39卷, 第371页。——编者注

注 释

- 〔1〕 恩格斯指出，在德国，舆论迅速转向社会主义，这是经济原因：工业迅速集中，英国和法国用了半个世纪，而德国仅仅几年就实现了；连续发生的尖锐的社会冲突以及远比其他地方影响更为强烈的商业危机。
- 〔2〕 恩格斯强烈谴责与布朗热派联合选举的活动，他认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策略。他在1889年1月2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如果有一种想法，要把我们的人放在布朗热派的名单上送进众议院去，那比根本不去还糟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121页）
- 〔3〕 参看克洛德·维拉尔《从〈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通信集〉第3卷）看恩格斯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1891—1895）》，载于《1960年费里特奈利研究院年鉴》，第752页。
- 〔4〕 因此，他们对外国的军事进攻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必须把全体战士动员起来，因为德国的失败也就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的失败。
- 〔5〕 参看G·霍普特的主要著作：《第二国际（1889—1914）（资料的批判性研究，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和会议以及社会党国际局正式印发的文件目录）》，高等研究学校丛书，穆东出版社1965年巴黎版。
- 〔6〕 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荷兰社会主义者发生了分裂，因为多梅拉·纽文胡斯关于战时总罢工的提案遭到了否决。法国代表团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组成的；代表团的成员雅克拉尔在1893年9月出版的《社会主义评论》（第294—312页）上，谈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件趣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德国社会主义霸权的保留态度。雅克拉尔反对关于社会主义行动仅限于议会活动的狭隘定义（倍倍尔的修正案）：“这个关于政治行动的狭隘定义是一种倒退，接受这个定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否定革命的传统……这个首次重要的表决说明了一个民族，即德国对其他民族的勿庸置疑的影响，一个人即倍倍尔对德国的勿庸置疑的影响……这次苏黎世代表大会是对德国霸权的确认。如果社会主义思想由于这个至关重要的决议而得到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服从它。但是情况是这样吗？很多人对此都另有看法。”
- 〔7〕 两个法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一个是政治社会主义者代表团，另一个是工团主义者代表团。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力支持前者。
- 〔8〕 饶勒斯完全有理由说：“……考茨基的思想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伯恩施坦

的影响。因此在考茨基那里有一些伯恩施坦的思想，如果说我完全赞成考茨基，这也就意味着我部分地赞成伯恩施坦”。见饶勒斯在1900年2月16日所做的报告《伯恩施坦与社会主义方法的发展》（第7页），该报告于同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

- 〔9〕 米歇尔·劳艾引用的是《饶勒斯和盖得（根据未发表过的文件）》，见《饶勒斯研究协会简报》1962年1—2月号第13页。

恩格斯和社会民主党

(1970年11月27日在乌培河谷恩格斯
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联邦德国〕维利·勃兰特

.....

马克思认为，在俾斯麦的德国同在拿破仑第三的法国一样，没有可能以民主方式取得政权。他在论巴黎公社的著作^①里还非常强调有必要以革命手段打碎现行的国家政权。可是他在其著名的1872年海牙讲话——这时第一国际因同巴枯宁的斗争而分裂了——中曾明确地指出，象英美这样的国家有可能以民主方式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②马克思在关于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合并纲领的通信^③里，对纲领的表述作了各种理论性的批判，但却没有否定为德国争取民主的斗争。

这篇后来引起人们非常重视的批判在当时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它之所以没有发生作用，是因为收信人威廉·李卜克内西自己把信扣压下了，连倍倍尔也没有给看。他想建立一个“战斗的而不是理论的党”。他知道已故的拉萨尔要比健在的伦敦朋友们对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更有影响。而这时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的个人之间的和精神上的联系越来越

① 指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79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3卷，第3—25页。——编者注

密切时，他对民主的道路也进一步作出肯定的评价。恩格斯和马克思一向确信，他们以他们的科学分析的方法虽然能预见到社会发展的总的方向，但实现目标的具体形式则必须由战斗的政治运动在实践中加以探求。首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前后所获得的成就就是这样，正是这种成就给恩格斯以深刻印象，并使他对建立一个合法的民主的群众性政党的可能性给以肯定的评价。

1895年恩格斯在逝世前五个月出版了马克思于1850年发表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组文章。恩格斯在其导言里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①。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方面都已经陈旧了。

恩格斯接着表扬了成功地运用一种新的斗争武器（即投票选举）的德国工人，并着重指出：“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②。

晚年的恩格斯还致力于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做新的解释。当马克思和他（于1850年）创造这个词时，他们把它理解为劳动者和迄今受剥削的大多数人为消除剥削而进行的统治。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政党的专政和独裁。大家毕竟还应记住，在上个世纪对“大多数人的专政”的含意的理解和根据我们的沉痛经验所得出的理解是不同的。恩格斯甚至还说，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

① 见本书第5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1、17页。——编者注

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①。换言之，这是劳动者赖以实现其解放的一种特殊形式。

1872年当《共产党宣言》在德国第一次出单行本时，恩格斯和马克思就已在序言里写道，其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还是正确的，但是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现在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②。恩格斯后来更明确地指出：“党的发展有这样一条规律：当党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党在少年时期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本身就显得不适宜了”^③。

所以恩格斯十分清楚，要整理和利用活生生的运动的经验和成就。恩格斯与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友谊，相互学习的范例在这里得到了真实反映。倍倍尔熟悉使他对自己事业更有信心的各种联系。而恩格斯从倍倍尔那里了解到在德国的实际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并了解到一个老的手工业师傅的健全理智是起不小作用的。

摘自维·勃兰特《历史的使命——关于工人运动史的演说》，1981年柏林一波恩版，第52—54页。

（韩文臣译 籍维立校）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209页。——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547页。——编者注

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恩 格斯的革命战略

〔联邦德国〕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格

“因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①，这是恩格斯在反社会党人法正式失效前几天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上所写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句话。一个与情况相适应的革命战略（这个战略虽然考虑到整个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但由于将要谈到的一些原因而主要是针对德国党的），以及按基本设想所产生的策略，这两方面的问题是恩格斯逝世前经常反复思考的问题，并且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他的书信和文章之中。除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外，他把制止错误的（从他所设想的革命战略这一角度来看）策略，竭力宣传正确的策略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恩格斯战略的本来出发点是这样一个事实：即1870—1871年普法战争以来，大陆工人运动的重心已从法国移到了德国^②。早在1884年，恩格斯鉴于德国党在帝国国会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曾经把它的兴旺比作基督教势不可挡和有信心的发展，他写道：“它是那样地有信心，以致现在就可以精确地算出它的加速方程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8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4页。——编者注

从而推算出它最终胜利的时刻。”^①在反社会党人法^②时期他曾坚持这样一个论点，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和平而不受干扰的发展会取得肯定的胜利^③。在1890年2月20日的选举获得大胜以后，上述论点便成为一切战略和策略考虑的出发点了。恩格斯曾估计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得到120万张选票，并为此而被认为“过分乐观”^④，现在由于获得140多万张选票，从而按选民数量来衡量，社会民主党成了德国最强的党，所以他便把大选的日子评价为“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⑤，这里说的革命当然就是社会革命。因为，恩格斯坚信，他一向认为革命这整个欧洲的事件的成败的决战只能在德国进行^⑥。

从恩格斯把2月20日确定为德国革命开始之日的上述致保·拉法格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恰恰是这一认识要求采取一种策略，其要旨是，宣布合法活动和避开来自统治阶级方面的挑衅。虽然革命的开始使得革命胜利本身和革命胜利所期待的结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230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29页注释〔3〕。——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10、163页；另见1888年1月4日恩格斯致若·纳杰日杰的信，关于欧洲大战有一段话：“这种战争是可怕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归根结底，都会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都会使工人阶级早日执掌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62页。——编者注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56页。——编者注

⑥ 1893年6月27日恩格斯致保·拉法格的信：“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末，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87页）；1893年10月12日致倍倍尔的信：“我们距离危机的到来也许还有五六年，但我看比利时特别是奥地利这次将起准备作用，而最后收场还是在德国。”（同上，第140页）另见1893年10月18日和21日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同上，第153—154页）以及1894年6月2日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的信（同上，第246页）。

在德国由社会民主党接管政权——指日可待，但也带来因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匆忙出击的危险。此外，欧洲大战的可能性在恩格斯看来越来越成为一个威胁，因为战争会使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功败垂成。

在此指出九十年代上半叶恩格斯战略的基本要素似乎是相宜的。

1. 在形势不受干扰地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德国取胜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民主党取得统治的时间“几乎能象数学那样准确的确定”^①。

2. 鉴于武器技术发展的水平，只有当军队的多数走到革命者方面来，武装斗争才卓有成效。“街垒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军队作战，进行抵抗就是发疯。”^②

3. 现代无产阶级最有效的斗争手段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模范地运用的普选权。正确地加以利用，普选权必然导致革命。

4. 在设想的历史情况下，唯一具有实际重要性的，是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允许遭受任何失败。与此相比，其它一切均属次要。

下面试就上述几点作出解释，并指出它们在具体情况下引出什么样的策略结论。

恩格斯认为，德国社会主义的肯定胜利是不可遏止的，甚至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也必然是一个自然过程。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反社会党人法的结束说明德意志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起程”^③，自那时起，有许多证据可以说明恩格斯这一观点。推算期限当然是难于做到的，特别是在1890年和1893年两次大选之间的这几年。恩格斯使自己同时也使他的读者产生这样一个印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0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505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0页。——编者注

即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正势不可挡地持续增长，例如1891年他就列出了下述表格：

1871年	101,927
1874年	351,670
1877年	493,447
1884年	549,990
1887年	763,128
1890年	1,427,298 ^①

在这个统计表中没有列入1878年和1881年的选举情况，党在这两次选举中遭到了完全可以解释的失败（诺比林暗杀事件，反社会党人法）^②。在这样一个数列的鼓舞下，恩格斯可以计算出以后选举中的选票；他估计1895年，将获得250万张选票，到1900年则将增加到350万至400万张选票^③。1890年选举之后，他认为三四年之内，普鲁士东部各省的农业无产阶级就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了，这意味着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完结。1891年9月初，恩格斯预见到德国将发生一场严重的国内政治斗争，一方面是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资产阶级和主张贸易自由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使得他设想社会民主党可能在1898年左右取得政权，“如果事态会这样发展的话”^④。尽管预言中的日期变来变去，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胜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1页。——编者注

② 1878年社会民主党获得437158张选票，比1877年少56289张；1881年只获得311961张选票。

③ 1893年选举前夕，恩格斯预期获得225万到250万张选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1、628页；第39卷，第55、77页）。社会民主党实际获得1786738张选票。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48页。）1894年鉴于“防止政变法案”的威胁，倍倍尔给恩格斯写信道：“说不定你对1898年的预言不象你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正确了。若是对1898年一说打赌，我分文都输不掉。”（《恩格斯与倍倍尔通信集》中文版，第921页）

“指日可待”^① 这一点对恩格斯来说是肯定无疑的。他甚至还本着这种精神援引宗教改革的例子来说明德国的革命传统。在1892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写道：“四百年前，德国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同样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②

当然恩格斯看到有两种情况会威胁德国社会主义胜利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即因为受到挑衅或者不是因为受到挑衅而匆忙出击以及欧洲大战。

至于后一种情况，恩格斯的策略设想是出于“联盟的恶梦”，也就是说，同沙皇制度结盟的法国可能对德国发动一场复仇战争。还在1885年至1887年欧洲危机的时代，恩格斯就对德国还有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极为担忧。他断然认为，法国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缺乏一定的抵抗力，因而他觉得有必要向他们指出，当前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只有一点值得追求，那就是维持欧洲现状。而全面战争会把运动“抛进一个无法预料、无法估计的事件的领域”^③。如果战争爆发，不论提出什么理由，都只会导致一个目的：阻止革命。1888年，恩格斯认为可以肯定，法国社会党人的领袖保·拉法格可能同布朗热主义有某种眉来眼去的表现，这促使他采取有力的干预。当时布朗热在法国身居政治要职，在恩格斯看来这个人就意味着战争，而根据列强的情况来看，在这场战争过程中或者作为战争的结果，革命都将成为不可能，并且将导致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6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553页。）该信就是1886年10月25日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经过加工以后的文稿发表在1886年11月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63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

面的衰竭，在这种状况下反动派将庆祝自己的胜利。“这使我感到可怕。对我们德国的运动来说尤其可怕，这个运动会被暴力破坏、镇压、扼杀，而和平却能使我们取得几乎是肯定的胜利”^①，这是恩格斯在1889年3月间写给保·拉法格的话。

八十年代末和1890年法兰西共和国同沙皇帝国结成矛头指向德国的联盟还只是具有可能性，到了1891年和1892年，在恩格斯的眼里就成为具有威胁性的现实了，主要考虑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不断的稳定的发展是欧洲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鉴于这一联盟，恩格斯一方面在同倍倍尔取得一致的情况下规定了德国党的立场，另一方面又极其恳切地设法劝阻法国社会党人不要支持这个旨在发动一场复仇战争的法俄联盟。这里应该指出，恩格斯(马克思也同样)似乎一向把沙皇俄国看作是欧洲政治的凶恶基础。在他看来，推翻沙皇制度，消除这个威胁着欧洲的“祸害”，是解放中欧和东欧各民族以及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先决条件^②。而沙俄帝国的“消极存在”对于西欧工人政党是一种危险，并且给了欧洲各反动政府以镇静和自信心^③。欧洲外交的紧张局势和沙皇俄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促使恩格斯于1889年和1890年积极研究了俄国对外政策的传统目标和方法，其研究成果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作了总结，文中他把沙皇帝国的职能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163页。）特别重要的是1888年12月4日恩格斯致保·拉法格信中的这段话：“布朗热就是战争，这几乎是绝对准确的。什么战争呢？法国和俄国结成同盟，从而丧失进行革命的机会；一旦巴黎出现最微小的动乱，沙皇就会勾结俾斯麦，以便一举彻底摧毁这个革命策源地；更坏的是，如果战争开始，沙皇将完全成为法国的主人而赏给你们一个他合意的政府。所以，由于仇恨激进派而投入布朗热的怀抱，就等于由于仇恨俾斯麦而投入沙皇的怀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115页，另见该卷第69页和第10—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5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5页和第56页。——编者注

之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①。法国的沙文主义者在1871年以后就决定了：“在收复亚尔萨斯以前，历史应当停止”^②。1890年4月，恩格斯看到，沙皇政府同法国的联合不仅针对着德国，而且也针对着俄国的工人和革命者，因此，他最严厉地谴责法国社会党人没有能够鼓起勇气来反对本国的沙文主义。他认为法国这种普遍的“爱国狂热”的后果是，法国工人成为沙皇的同盟军^③。他在正式贺信中提到的法德两国无产阶级之间海誓山盟的兄弟般的团结^④从来没有模糊他的视线，他看到法国任何一个联盟都不会放弃收复亚尔萨斯-洛林的政策^⑤。在引人注目地显示俄法亲善的法国一支分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1891年7月）和俄法军事协定于1893年12月底获得批准这段时间，恩格斯一直努力宣传正确的策略，以便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存在和稳定地发展。下面这些话对法国社会主义者不加掩饰的威吓之词，已经说到了顶点：“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末，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长裤汉，1893年能够同

① 同上书，第15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83页。——编者注

③ 同上书，第384页。——编者注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1页。——编者注

⑤ 见1891年11月9—10日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信中写道：“当李卜克内西在《前进报》上兴高采烈地谈论法国没有沙文主义时，巴黎报刊……使我确信，‘共和派’的反布朗热主义的联盟（机会主义派、激进派、可能派）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基础，即政府在爱国主义方面要胜过这个布朗热，同俄国结盟，向全世界显示军队的战斗力，挥舞刀枪，如果这样做引起复仇战争，就振奋地、愉快地进行之，换句话说，就有可能更直截了当地挑起复仇战争，这是所有法国资产者的宿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08—209页）

1793年媲美。”^①与此相对照的是他在同倍倍尔的通信中给这位德国党的领袖分析说，一场由法国人和俄国人进行的战争“首先是反对欧洲最强大、最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战争，我们只好全力迎击一切进攻我们和将要援助俄国的人，别无其他出路。因为，要么我们被打败，那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要停滞二十年，要么我们自己上台执政”^②。

虽然倍倍尔在恩格斯来信(这些信件已经遗失)的鼓舞下，于1891年9月27日在《前进报》上发表题为《俄国公债》一文接受了恩格斯的论点，但是也把这些论点粗略了。倍倍尔认为，参预刚刚发行的俄国公债是“道义上的卑鄙行为”^③。他说“反对以至消灭那个残忍的、野蛮的和敌视文化的官方俄国”是社会民主党“最神圣的使命”。倍倍尔完全可以用展示广阔的革命前景来说明为了防御外来侵略同国内政治上的敌人暂时联合是正确的^④。在1891年10月5日帝国国会柏林第四选区选举协会的一次集会上，倍倍尔引用了恩格斯关于俄国对外政策传统目标的研究，同时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7页)同德国的立宪制度相比，法兰西共和国代表着政治的进步，这一论断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大并未能给恩格斯留下丝毫印象。象任何政体一样，共和国取决于它的内容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和任何君主国一样是敌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209页)，如果说这在他看来已经十分普通，那么，在他眼中为沙皇效劳的共和国就是反动的化身。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57页。——编者注

③ 原文即为黑体字。

④ “而如果我们同今天是我们的敌人的那些人并肩战斗的话，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而是为了拯救整个德国，就是说拯救我们自己，并且为了从一个野蛮人手里解放一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准备将来有朝一日实现我们自己的社会理想。”(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

次指出用革命手段^① 进行一场反对官方俄国的“歼灭战”所可能开辟的前景：把俄国赶回东方，建立民主的新波兰，成立一个将永远结束战争的“国际联盟”^②。而只要这样的前景还没有十足把握，恩格斯便一直使用各种办法进行斗争，以防止“这一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因某种危机而中断，诚然，这种危机可以使它缩短两三年，但也同样可以使它延长十至二十年”^③。因此，当1891年8月初丹尼尔逊写信告知恩格斯说，俄国正处于饥荒的前夜^④，这个消息使恩格斯如同得到了解救一般。他认为这是使和平延续到1892年下半年的保证；^⑤ 1892年年初，他认为同俄国的战争被推迟了三四年^⑥；在他逝世前不久的几个月当中，他对欧洲和平持续下去的前景的判断是格外乐观的^⑦ 这些并没有阻止恩格斯继续批判地密切注视俄法两国的对外政策。这方面有趣的是，1893年年初，他把猜测中的俄国间谍在东普鲁士湖泊之间封锁着的边防要塞一带的活动详情写给倍倍尔，并鼓动倍倍尔把这些情报告知德国当局。倍倍尔后来亲自把这些情报转告给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⑧

① 恩格斯和倍倍尔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即如果打起来，在德国就应提出全民武装的要求。（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57页）

② 1891年10月8日《前进报》附刊第235号。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60页。——编者注

④ 同上书，第136、139页和第142页。——编者注

⑤ 同上书，第140页。——编者注

⑥ 1892年1月6日恩格斯致阿·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只要没有人在什么地方干出蠢事，对俄战争就可望推迟三至四年。德国的稳步的发展向我们预示，胜利将在最顺利的情况下到来，尽管会稍晚一些，然而一定会到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45页）

⑦ 1895年1月22日恩格斯致保·拉法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370—372页）。

⑧ 1893年2月9日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28—29页）。另见1893年2月11日和25日倍倍尔致恩格斯的信。

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论点：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8月4日的态度可以同1891年恩格斯所奉行的策略相比较，或者说，可以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第一阶段所采取的立场来辩护^①。权威人物列宁在1916年11月和12月以及1917年1月写的信件中，反对把1891年的情况和1914年的情况相比较，认为这是不允许的。“1891年，法国为凯撒制度+俄国的沙皇制度反对非帝国主义的德国——这就是1891年的历史情况”，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是“双方的帝国主义战争”^②。历史情况的差别无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客观的观察家不能不指出，把社会主义革命无条件地归结为德国党的命运（恩格斯战略的一个基本点）导致恩格斯采取一种看来是过高估价德国政策和三国同盟的政策策略。例如，他没有指出，正是1891年5月恢复三国同盟和在意大利议会以及英国下院中就地中海协约所发表的那些言论才使得俄法两国重开谈判，因为在再保险条约失效后这些言论使俄国政策意识到了自己的孤立^③。福尔马尔曾保证，当祖国遭到（来自与沙俄结盟的法国的）进攻时，社会民主党人将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即法国分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前不几天曾给予尖锐的批评^④；而在喀琅施塔得联欢之后，他又认为伯恩施坦驳斥福尔马尔的有关文章“显然是根本不合适的”^⑤。这很说明

① 参看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格《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帝国的建立》（载《1870、1871年帝国的建立。事实一争论一解释。泰奥多·席德尔和恩斯特·多伊厄尔来因编辑出版》1970年斯图加特版，第319—34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255、257页以及第111、115、116、118封信。）另见瓦尔特劳德·欧皮茨《1890、1891年的恩格斯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载《历史杂志》，1969年第17期，第1407、1408页）。

③ 这并不是说，恩格斯似乎如同福尔马尔一样赞成三国同盟，照福尔马尔的意见，三国同盟的倾向“无疑是以和平为宗旨的”（福尔马尔著《社会民主党最近的任务》，1891年慕尼黑版第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21页。——编者注

⑤ 同上书，第159页。——编者注

恩格斯有着一种值得注意的灵活性。只要事关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免遭可能的失败，其他任何观点都是次要的^①。

除了肯定要使社会民主党倒退的欧洲大战这一危险（看来自1891年年底暂时得以避免），恩格斯所思虑的就是德国国内政治斗争有可能导致象1871年在巴黎那样一次“放血”。他认为通过突然袭击而达到社会的和政治的改造这种尝试，会使在不远的将来必定自然而然地获得肯定成功的运动遭到毁灭或者至少要受到极为沉重的损害，这种想法他直到逝世都没有摆脱。在1877年帝国国会选举之后，恩格斯曾简明地谈到过这个想法^②，但是，从1890年1月25日帝国国会就反社会党人法进行表决时起或者说从是年²月选举时起，它才在策略措施和指示方面成了主导的、决定性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到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即1890年9月30日以前这段时间和随后直到恩格斯逝世的那些年月是不同的。在9月30日以前“避免任何喧嚣”^③是恩格斯的愿望，他感觉到，对俾斯麦来说是一种灾难的选举结果（政党联盟获得的席位从220个降到135个）有可能促使这位首相考虑发动一场政变^④。此外，他对局势还有这样一种估计，威廉二世和俾斯麦唯一还能取得一致的一点是“猛烈炮击和不可避免的残酷恐怖”^⑤。在这种形势下，恩格斯认为“平静”首先是对待五一，是德国党的任务^⑥。德国国

① 同上书，第19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08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77页——编者注

④ 见维纳尔·珀尔斯《社会党人问题和由此引起的关于俾斯麦所谓的政变计划的革命恐惧》（1960年卢卑克—汉堡版）。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62页。——编者注

⑥ 1890年4月12日恩格斯给弗·阿·左尔格的信写道：“因此，如果我们党最近时期在德国以及在对待五一方面表面上比较平静，那你就知道其中的原委。我们知道，将军们是乐于利用五一来向我们开枪射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78页）

会党团1890年4月13日的号召，他虽然认为“不行”，但是他还是接受了，因为他说党团有责任“控制各种过激的行动”。恩格斯批评“青年派”（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称它为左倾分裂主义的、半无政府主义的集团，这有些片面）对五一的态度是“空洞的吹牛”，只会使德国有利的形势变坏^①。正因为他把“青年派”看作是那些被选举的胜利冲昏头脑现在认为“用冲击就可以取得一切”^②，而同时显然“不能认清最简单的事物，在观察经济的和政治的情况时不能毫无偏见地衡量现实的相互关系和斗争着的力量的实际影响”^③的集团的典型代表，所以他不断分析了所有力量同时又找到了“表面上保持平静”的^④理由之后，就必然把他们的积极主动视同冒险，视为“极其轻率的策略”^⑤。9月30日没有发生他所担心的“警告性射击”之后，才具备党迅猛发展的条件（至少恩格斯是这样看的），而党的迅猛发展也就会冲淡2月20日的结果。

当然，在“表面上平静”和“表面上保持平静”这两种提法中，就已经表明恩格斯和德国党之间有差别，这种差别最后在1895年讨论他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发表的形式时，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当一切社会条件 and 政治条件都有助于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他们的一切敌人也不得不象得到报酬那样地为社会民主党效劳的时刻”^⑥，不要毁掉自己的事，这一告诫是针对具体的政治形势而言的。还在1890年3月9日的时候，恩格斯就被迫抗议李卜克内西把他的关于不要轻率行事、不要接受挑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92页。——编者注

②④ 1890年4月12月恩格斯给弗·阿·左尔格的信写道：“因此，如果我们党最近时期在德国以及在对待五一方面表面上比较平静，那你就知道其中的原委。我们知道，将军们是乐于利用五一来向我们开枪射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78页）

③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99页。——编者注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1页。——编者注

的警告歪曲为非暴力论的一般信条。恩格斯说的“在当前”，党应该“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实际上包含了他的坚决不同意李卜克内西“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①这一层意思。俾斯麦被解职，特别是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对社会民主党不受干扰地发展，紧迫的危险因而暂时排除以后，恩格斯还偶尔谈到等待和合法性的策略。他说过，政治敌人由于“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袖手旁观”^②而会长期不断地“破坏”这种合法性，最终将被迫开枪。对此，他在他的革命战略中，赋予威廉二世的亲政积极的作用，因为威廉二世的亲政保证了“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相互倾轧”，他们之间的倾轧就阻止了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对付社会民主党，阻止他们形成反动的一帮^③。

正是由于防止政变法草案和皇帝及其周围的人所酝酿的政变计划，1894年年底，防御策略、暂时等待的策略问题才又成为恩格斯考虑的中心。同时可以看出，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态度同恩格斯1893年在德国访问时从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所获得的印象不相符合，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时一味地炫耀社会民主党的合法表现^④。党的领导不希望再来一个非常法，之所以不希望，就是因为这似乎是统治阶级的一剂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而在历史发展的正常过程中它是会灭亡的^⑤。恩格斯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欢迎防止政变法草案或者那些能遏制历史条件决定的党的平静的和不停发展的任何措施，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62—363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2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93—294页。——编者注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129页。——编者注

⑤ 例如，见1894年10月15日倍倍尔致恩格斯（《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中文版，第921页）。

以遵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愿望，考虑到面临着防止政变法草案^①的辩论，同意了对他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引言作几处修改。当然谈不到党领导的策略同恩格斯的使得党“长得身强力壮，面带红光”^②的合法性策略是一致的。首先从1967年本人第一次发表的1895年3月8日恩格斯给理查·费舍的信^③中可以看出这种对立。正如恩格斯于是年2月写给保·拉法格的信中所阐明的那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任何保持平静和任何诉诸合法性的作法的目的仅仅在于，国际工人运动“战斗的基本力量”要为危机时刻的到来作好准备，而不可“参加先头部队的冲突”使自己消耗殆尽^④。这同德国党领导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把恩格斯反复讲的“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⑤的一种策略当成有强制性的东西来接受了。党的领导认为保持平静和等待的策略的目的就是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就连党的杰出的领袖们也宣扬现存社会制度长入社会主义，而恩格斯的策略则是革命的，并且明确排除了“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⑥的可能性。这个策略的出发点是，统治阶级在社会党人有可能取得多数之前采取暴力，这就必然使党“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⑦。

革命无疑是政府和由它所代表的社会面对自己死敌的不可抗拒的兴旺发达而进行垂死挣扎的后果，但是这样一场革命的前景又如何呢？这个问题就涉及处于恩格斯战略的中心地位的一个概念，普鲁士军队的“模范团”。1877年选举之后还是渺茫的可能的东西，在1890年的胜利之后却变成确定无疑的东西，“到1900年，

① 见本书第29页注释〔1〕。——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32—34页。——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28页。——编者注

⑤ 见本书第51页。——编者注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27页。——编者注

⑦ 同上。——编者注

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象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①。军队不久会被社会民主党渗透瓦解的论断一方面证明等待策略的正确性，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阻止统治阶级铤而走险进行恩格斯所不希望的挑衅而发出威胁出发的。所以恩格斯对1890年选举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警告俾斯麦不要尝试少量“放血”：“但是他这时不应当忘记，德国社会党人至少有一半在军队里呆过。他们在那里学会了遵守纪律，这一点至今帮助他们抵制了任何挑起他们暴动的做法。此外，他们在军队里还学到了一点别的什么。”^②

对于1890年二月选举中梅克伦堡和波西米亚的选举结果所进行的分析^③使得他设想，三四年以后，普鲁士东部省份的农村无产阶级和普鲁士军队的模范团就会转到社会主义一边^④。1876年恩格斯所写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就表明，这些地方的农村无产阶级在恩格斯的战略中一向占有稳固的位置；鉴于缺乏普选权方面的经验，这篇文章还把酿酒业由于俄国的竞争而衰落评价为发展的开端，这种发展将会把“军队不交给普鲁士邦，而交给社会民主派”^⑤。

1894年和18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激烈争论的农业问题，迫使恩格斯写了《法德农民问题》一文。这个问题令人信服地证明，

① 同上书，第291—292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页。——编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59、377—378页。——编者注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59、361、365、377页。

——编者注

⑤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9页。——编者注

在恩格斯看来，这不是农民问题而是革命问题。关于保护小农的议论，他一语道破了实质：“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①。农业工人，首先是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工人，他们“实际上的半农奴状况，是普鲁士容克统治的主要基础，因而也就是德国的道地的普鲁士霸权的主要基础”^②，所以在他的革命构想中对于这些人的地位的评价就完全不同了。“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在这些工人当中，只要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那末容克的统治就会完结。这个对于德国来说就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种野蛮劫掠成分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象个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革命的变动。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把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比吸引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吸引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③显然，恩格斯在农民问题上的构想同福尔马尔的、大卫的和甚至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设想有着天渊之别。假如在社会民主党争取到普鲁士德国国家政权的基础——军队以前，能成功地一直保持国内政治现状的话，那时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对社会民主党的急剧增长而惊恐万状^④就会不声不响地准备予以反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人所使用的弹仓式步枪的量无疑就要转化为战无不胜的革命的质。不言而喻，恩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73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586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87页。——编者注

④ 参看《1893年9月14日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在每一次新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总是不可遏止地增长，这使资产阶级战栗，使卡普里维战栗，使所有的执政者战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82页）

斯的这种革命战略肯定是令人神往的，但是它的前提条件历史已充分证明是不存在的。把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人等同于积极的革命者、“当代工人运动的一支战斗队”^①的成员，和认为小资产者和小农必然要站到社会民主党一边的论断^②同样是冒险的。九十年代上半叶反犹太主义者在德国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如同一个不祥之兆，指明了这些阶层可能的基本政治立场。然而，我们假设恩格斯的革命战略考虑到了现实，那么，人们要问，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根据什么来确定何时接受统治阶级的挑战，就是说以武装的暴力去回答挑衅？它自己又何时才能敢于展开革命斗争呢？恩格斯在九十年代对此所准备给予的答案仿佛是这样的：正确运用普选权就能够使人们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③，并同时增加敌人的恐惧，迫使他们随便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只能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最后一战到来之前，在武器技术条件变化了的情况下，普选权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它远比街垒战之类更有成功的希望，尽管过去街垒战也只有在指挥瘫痪或者军队拒绝开枪的情况下才能成功^④。恩格斯说，德国工人运动的功绩就是把普选权由“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手段”^⑤。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历史的必然性，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完全“在社会主义一边起作用”^⑥，所以欧洲革命似乎是作为自然过程的结果必定要到来的事情。而在他看来，有资格决定这场革命胜负的党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便说到了他的革命战略的最后一个组成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518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书第28页。——编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160页，另见第38卷，第513—514页。——编者注

④ 参看本书第11—12页。——编者注

⑤ 见本书第10页。——编者注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20页。——编者注

分。他无情地谴责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任何机会主义变利，并对机会主义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的定义^①。如果事关德国社会民主党平稳的兴旺发达，他就准备在这方面给他们留有大的活动余地^②。

如果我们最后再一次想一想反社会党人法^③废除后恩格斯革命战略的那些基本要点的话，那就是下列几点：德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包含着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在形势发展不被干扰的情况下，这个胜利是不可遏止的，而且时间可以用数学方法加以确定。因为他认为情况如此，所以，必须千方百计防止欧洲大战，特别要防止法国同沙皇帝国联合发动的反对德国的战争。但是，如果战争发生，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应进行卫国战争；或许他们必须“演一次1793年”^④。平静的发展也不要受国内政治事变的影响，首先，只要军队特别是普鲁士的模范团的多数还没有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就应避免为挑衅所动。无产阶级拥有普选权，也就有了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和可能的手段。总之，必须考虑到，决定性的力量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德国政治变革的结果必然是被他描述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74页。——编者注

② 这首先涉及到德国党对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有关五一节的决议的解释方式。恩格斯在1892年11月19日致倍倍尔以及11月22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中都谈到这一点。最说明问题的主要是1891年1月31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他在信中明确驳斥了来自法国人方面对德国党的批评。他写道：“德国社会党人最好的示威，是他们自身的存在和稳步地、持续地、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我们还远远不能经受住一场公开的斗争，我们对整个欧洲和美洲的义务，不是使自己遭受失败，而是时机一到，在首次大战中获得胜利。我要使其他一切都服从这个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9页。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③ 见本书第29页注释〔3〕。——编者注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81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民主共和国”^①。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今天，他视之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政治上的最终目的”的“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②这一点情况如何呢，让每一个人自己去评判吧。

选自《弗·恩格斯。1820—1970》1971年汉诺威版
第115—126页

（王宏道译 杨启清 孙魁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74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490页。——编者注

新时代的预兆

(1972年)

〔民主德国〕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

.....

1895年初,《前进报》出版社建议,把当年已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过的马克思著作《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重新出版。恩格斯本来一直在想通过撰写各方面的文章,来逐步准备材料,以便给亡友写一篇传记。所以,这个建议是正中下怀的。恩格斯认为,马克思1850年的著作,只能由他写了导言才能出版。他打算在导言中解释:“为什么当时我们会满怀希望地预期无产阶级即将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而今天是怎样地由于后来发生的事件而使我们产生了和当时不同的看法的。”^①

自2月中旬至3月初,恩格斯写了这篇导言。其中第一部分,他特别指出了马克思著作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方面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方面;他还概述了在围绕着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展开的争论中,马克思著作所起的作用。接着恩格斯着重指出: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②因

① 参见本书第27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7页。——编者注

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①

在这篇导言的第二部分，恩格斯论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整个革命工人运动，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新情况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使工人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他首先断定，德国的工业革命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②，并且阶级斗争达到了在十九世纪中叶还难以想象的猛烈程度。革命的工人运动已从小规模开始，发展成为一支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团结在马克思的“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③周围。

根据这些改变了的情况，恩格斯对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作出了具体的结论。他反对那些跟无政府主义有关系的工人代表们，因为他们不懂得，党必须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所给予的一切可能，同时并不排斥不合法的斗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这两种方法——同样地合理并且需要——必须受到重视，以便争取新的群众来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他们自己就会明白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他们必须“明白应该做什么”^④。

恩格斯强调说，因此，党对工人群众进行启发、组织、训练和教育的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议会策略也是一个新的有效的斗争方式，因为工人阶级利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⑤，就是为了战胜这个资产阶级国家。

①②③ 见本书第7页。——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15页。——编者注

⑤ 见本书第11页。——编者注

同时，恩格斯向德国党提出了警告：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不断增长的成就，使统治阶级感到了莫大的威胁，以致统治阶级有朝一日会废除他们自己制定的资产阶级法律，并且会以武力镇压和血腥屠杀的手段来对付工人阶级。

虽然恩格斯肯定，社会主义者应当通过一切办法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以加强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样的信念：“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①。不遗余力地利用合法斗争的一切可能性，和由此积聚力量来尽快地进行必要的不合法斗争，是为“决战的那一天”^②——包括进攻性的巷战——作准备的最好方法。恩格斯写道：“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而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颠覆，他们——指统治阶级和他们所谓的秩序党——就只能运用秩序党的颠覆，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颠覆。”^③

为此，恩格斯非常着重地说，由于剥削阶级所施行的政策，我们目前适用的这个策略，也许必须突然改变。他写信给保尔·拉法格，毫不含糊地解释了他在导言中所持的观点：“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④

在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他又一次地证实了自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卓越战略家和策略家。他重新论证了，为什么工人阶级必须善于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而且第一个任务总

① 见本书第16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7、18页。——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51页。——编者注

是必须从属于第二个任务。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为什么策略方法和斗争方式的选择，总是以具体的历史情况为转移，为什么在剥削阶级一旦诉诸武力并进行内战的时候，工人阶级所乐于采取的和平革命方式就必须立刻用非和平的斗争方法来代替或补充。

弗·恩格斯把导言寄到柏林去发表，就因他的观点被歪曲而不得不进行辩护。1895年春季，德国的统治阶级企图在国会中通过一个称之为“防止政变法”的声名狼藉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面临这种形势，恩格斯——虽然心情沉重——同意了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坚决要求，把这篇导言中的某些措词改得婉转一点，使司法机关找不到借口来干涉社会主义运动。然而他以警告的口气写道：“假如你们打算诚心诚意地服从绝对的合法性，在任何情况下的合法性，甚至这个法律已被制定法律的人破坏了，而你们还要服从这个法律的合法性，总之是服从这样的政策，那就是谁打了你的右颊，就把左颊也送上去给他打。我可不能容忍你们这样做。……

我认为，如果你们鼓吹绝对放弃暴力斗争，那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没有人听信这个，没有哪个国家的哪个政党竟会把拿起武器来抵抗非法行为的权利放弃掉。”^①

但是，《前进报》登载了一篇社论，其中有的话摘引自恩格斯的尚未发表的导言，“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②。恩格斯极为愤怒，就接受了考茨基的建议，要马上在《新时代》上公布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③。后来在出版《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时，该书导言的文本，与恩格斯所同意发表的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无限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文件，虽然是经

① 参看本书第32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书第50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50页。——编者注

过了删改。

恩格斯确实没有料到，在他逝世以后，他的文章，很快就被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以爱德华·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们卑鄙地歪曲了。当他们打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向党的革命的科学基础开火的时候，援引了恩格斯的话，出版了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把这篇导言说成是他的“政治遗嘱”。伯恩施坦恰恰就是这次捏造的带头人，这一点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特别可耻的。

在1895年，伯恩施坦是恩格斯家里的常客。他知道得最清楚，恩格斯在撰写这篇导言的时候，根本没有打算把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政治遗嘱”。当时恩格斯所考虑的，全是科学研究和写评论的计划，想不到可恶的疾病一下子弄得他力不从心。此外，没有哪个人能象伯恩施坦那样了解，是什么原因使恩格斯勉勉强强地把导言全文删节以后拿出来发表的，而这个经过删节的文本，在内容方面丝毫也没有减少其革命性质，在措词方面，即使是社会主义者的最狂暴的敌人，也找不出任何把柄来向党挑衅。正是这个伯恩施坦，把恩格斯这篇导言最初的，完全未经删节的原稿保存了几十年之久，却把它藏匿起来不让发表，这就更加严重。然而最重要的是，伯恩施坦耳闻目睹，知道恩格斯直到最后一息，都象在其最后一篇伟大的科学著作即这篇导言中表现的那样，始终忠实于自己和马克思两人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推翻剥削制度，为解放工人阶级及一切劳动者而斗争。而恩格斯这篇导言是关于他自己忠于革命事业的一个雄辩的证明。

.....

摘自海·格姆科夫主编《恩格斯传》1975年中文版，
第548—553页

恩格斯的“政治遗嘱”

〔日〕山本统敏

.....

正是上面我们所谈的情况构成了恩格斯给《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的背景。现仅就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国际展望的最后立场略述如下：

(1) 欧洲世界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对专制主义制度及其国际秩序进行历史性的斗争，这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课题，而这一课题虽然在欧洲半途而废，但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解决了主要问题。由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大规模的和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形成的近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了西欧的直接的历史课题。

沙皇制度是欧洲世界的专制主义旧制度的最大支柱，也是最后的支柱。在其内部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因传统的农业经济危机，其国际势力也大为减弱。在俄国国内正孕育着一场革命。资产阶级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受到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发展的威胁。于是，西欧国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直接阶级对立就成为整个欧洲世界的具有决定性的基础。

这样，十九世纪欧洲世界的全部历史，就毅然进入要以无产阶级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告终的这一时期。

(2) 由于上述情况的结果，直接面临欧洲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革命所威胁的欧洲资产阶级，就成了欧洲世界的反革命的反动势力。因而资产阶级已经不可能成为欧洲各民族自由发展的代表了。唯一能代表欧洲民主主义的真正现实及其发展的是无产阶级，

是社会主义的国际运动。所以，整个欧洲世界现存的各民主主义课题，就只能是在政治上结合直接以西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国际斗争，作为欧洲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胜利中一环来加以解决。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任务基本结束了，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3) 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增长，及由此而可能引起空前破坏性的欧洲战争。这具体地证明了西欧的实际上已经全面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自己不能解决西欧的问题，而且证明了面临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革命威胁的欧洲资产阶级，一般说来必然加深其反动性和反革命性。

于是，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互相对立和军备增强，以及由此而可能引起战争，对此进行的斗争就成了为欧洲无产阶级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斗争的一部分。

(4) 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把政权直接夺取到自己的手里。这种革命在于打倒旧统治阶级的权力及其统治，并在新阶级的领导下树立新的政权。那么，晚年的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将来夺取政权时直接战斗的战术是怎样考虑的呢？他在《导言》中是这样说的：

“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即使在巷战的盛行时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坚持不到，就遭失败。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都对军队有利。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而军队就更多了。……这种人数大量增加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军队则

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今后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种兵力，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到时候恐怕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①

巷战的各种条件及其战术的变化，正是以资本主义产业革命进一步深化这种生产力之发展为物质基础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恩格斯指出的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关于将来巷战中的“这种不利的条件”应当通过何种“因素来抵消”，恩格斯对此没有细谈。这是留给后代革命家的事情。

我们可以确认上述四点是恩格斯给第二国际运动的最后政治遗言。

从上述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恩格斯直到他晚年一直是无条件地忠实于他与马克思自1848年革命以来对十九世纪欧洲世界局势共同作出的论断。同时，恩格斯对进行欧洲无产阶级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二国际深信不疑。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这种以整个世界作为征服对象的帝国主义的发展，由于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欧洲战争的爆发，由于这时的第二国际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堕落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事件，人们对1895年的恩格斯所进行的“批判”似乎也就容易理解了。然而，必须指出，恩格斯直到最后始终坚决捍卫自从《共产党宣言》时代以来的近代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即使说恩格斯的“预测”有误，也不能认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本身不对。恩格斯逝世后，紧接着在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正是围绕上述各点展开的。而自恩格斯逝世后到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这一时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

^① 见本书第11、13、14页。——编者注

一贯坚决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的是罗莎·卢森堡。

摘自山本统敏《第二国际的革命论争》，1975年纪
伊国屋书店版，第2卷，第7—9页

（韩文臣译 刘焱校）

科学社会主义是国家救世主义

〔美〕诺尔曼·莱文

.....

在策略方面，同在哲学和思想意识方面一样，恩格斯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走中间路线。在他的左边是无政府主义者。值得称颂的是，由于恩格斯对政治实际有较深的了解，他坚持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分开。他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极端的唯意志论，对他们轻率地采取恐怖手段，对他们立刻废除国家的幻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在他的右边是费边主义者、可能派和拉萨尔派，以及所有采取社会改良政策的人。恩格斯从革命、从根本改变社会结构和无产阶级起义出发不断发表讲话，反对这些势力，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但是他为考茨基和倍倍尔打下了基础。他的全部政治著作成了一种遗产，支持并鼓励了第二国际的渐进主义和不革命的政策。

恩格斯预测1871年以后的革命形势时，他想到的是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的情景。但是1871年以后恩格斯面临的是一种独特的革命形势。首先，过去的错误必须避免。1848年和1871年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严重的挫折。恩格斯在将近该世纪的末期变得谨慎了。社会主义运动又复兴起来，恩格斯最关心的是避免危害他认为是保证无产阶级运动继续发展的任何行动。特别是，当恩格斯面对1871年以后的世界的现实，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见解。简而言之，他产生了历史特定条件下的见解，而且1871年以后他所

提倡应用的策略他认为是适应当时历史的特定条件的。这里有六点政治见解：(1)武装起义是过去的事；(2)战争应该避免；(3)资产阶级共和国是革命能够不断向左发展的最好政治环境；(4)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必要的；(5)一个民族国家的地方组织对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6)俄国革命的潜力和反动的潜力都必须考虑到。

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方法是通过议会选举。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断言，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街垒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①。恩格斯认识到由政府支配的军事力量的增长。只要军队保持忠于政府，政府就具有优势军事力量压倒任何企图在街巷的起义。此外，恩格斯也反对对外战争。因为西欧资产阶级政府和东欧封建贵族政府掌握着军事力量的决定权，武装起义和革命战争易于被挫败，进步力量易于被摧毁，结果，资本主义的和封建的保守主义得到加强。简而言之，恩格斯认为过去无产阶级运动采取的两种革命手段，城市武装起义和革命战争，都已不再适合十九世纪后期的条件。但是武装起义和战争的有效性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斗争本身的终止。幸而，选举权的普及已开辟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的场地。阶级斗争将会继续，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②

.....

如果就社会主义运动而论，俄国是欧洲最成问题的国家，那么德国在恩格斯的眼中就是最理想的国家。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德国社会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有着同一命运。他在1883年写给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保持其“作为国

① 参看本书第11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书第13、14页。——编者注

际社会主义的代表的这利特殊地位。”^① 这样，德国的社会主义肩负了一种救世主的使命。它的成功就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

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以前，法国一直都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巴黎公社的失败结束了法国的这一革命传统。当社会主义运动再度兴起时，德国就成了革命力量的中心。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1895年版所写的那篇著名的导言中，恩格斯写道：“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目前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② 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心将保留在德国。

德国社会主义能够保有其救世主使命的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劳动群众的迅速无产阶级化。产业革命，这场由遭受蹂躏的产业劳工阶级带来的革命，在德国进行得比在英国和法国都更加彻底和深刻。首先，德国的人口比英国和法国都多。其次，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还保留着小农有产阶级以及手工织工和其他手工业工人。所以，德国严酷而完全的资本主义化，意味着这些小农私有者和手工业工人的消灭。从前的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都会发现，他们的经济作用被摧毁，他们自己不得不加入工业劳动大军。这种经历将使德国新的无产者变得激进。第三，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已经为美国和德国所打破。德国挤入世界市场意味着它在经济上得到了更多的机会，这也促进德国国内的工业化去满足这些新市场^③。

德国能保持其世界社会主义的领导地位的另一原因，是它在俾斯麦推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时期经受了力量的检验和困难的考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443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9页。——编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22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230—231页。——编者注

验。1878至1890年期间，俾斯麦虽然没有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布绝对禁令，但他却企图用立法手段消灭社会民主党。其它国家的党遇到这种情况也许就会垮了，而社会民主党则战胜了这一困难。恩格斯认为这是对德国无产阶级的意志、献身精神、纪律性和战斗性的一次检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比其它的党更强大，就是因为它战胜了反社会党人法的镇压。恩格斯的乐观态度以及他对德国社会主义将最终获胜的信心，表现在他这样一种看法中：他认为俾斯麦正在无意识地帮德国社会主义者做工作，也就是说，恩格斯相信，俾斯麦的政策正在加剧德国的阶级斗争，向工人展现出君主制及资产阶级的镇压本质，并且通过国家社会主义向工人展现出社会主义的一些吸引人的地方，从而促成能够最终导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①。

但是，德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会继续成为欧洲革命的领导者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非常精通理论^②。德国人的理论优势意味着，只有德国人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只有德国人才能制定出体现马克思的思想的社会主义纲领。德国工人极好的理论修养大概也意味着德国工人的策略更忠实于马克思的策略。例如，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德国工人就不会象英国工人那样冷淡或没有激情。德国工人也不会象法国工人落为蒲鲁东主义的牺牲品那样，成为其它声称要解除工人苦难的错误信条的牺牲品^③。恩格斯的意见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领导确实应由德国担任，因为只有德国具备正确行使这一领导权的必要的知识条件。

因此，恩格斯怀着高兴和期望的心情注视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长。普选权的扩大为工人提供了新的武器和战场，恩格斯十分关注社会民主党选票的增加，他认为这就等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到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37页。——编者注

② 参看同上书，第18卷，第565页。——编者注

③ 参看同上书，第566页。——编者注

来。选举胜利取代了实际的革命策略。尽管恩格斯可能会否定这一说法，但他确实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德国社会民主党选票的实际增加始于1884年的那次选举。社会主义者的胜利表明，他们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脱颖而出。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说：“1884年的选举对我们来说，同1866年对德国的庸人来说，是同样的情况。”^①但真正的转折点是1890年的选举。它不仅结束了反社会党人法，而且党在选票数上也赢得了巨大胜利。恩格斯称这次选举为德国革命的开始。

由于恩格斯确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将稳定地不断增加，所以他主要的策略考虑是保留的和保守的策略。他认为只有一场大灾难，能够阻止社会民主党群众性的必然增长，阻止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最后获胜。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就必须以保存党的力量为中心。尤其是，德国必须避免发生战争。恩格斯明确地谈了这样几点：

“但是，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也就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却拥护他们的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经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加，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象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假以时日，这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成员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弹仓枪都是做不到的。”^②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234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6、17页。——编者注

恩格斯后来一直坚信议会政策。他认为要想使党的选票大量增加，就必须保存党。可以毁灭党的办法只有两种，即不成熟的革命和对外战争的失败。要使党保有选举权就必须继续奉行议会政策。恩格斯这样做，便为修正主义敞开了他自己也准备通过的大门。

.....

摘自诺·莱文《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

1975年英文版，第183—184页、193—196页

（禾子 刘丽明译 月异校）

反机会主义斗争中的马克思主义 革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等

.....

随着在国家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以及随着新的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形成，迫切要求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工人运动的规模一年比一年扩大，从而出现了许多情况，对此加以比较和综合，就为作出新的结论，为使早先制定的原理更加精确和得到发展，提供了材料。恩格斯在逝世前几个月，在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以及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对包含在这一时期内写的大量书信、政论演说和科学著作中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总结。

恩格斯回过头来谈到公社经验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过去的按内容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有根本区别这一思想。恩格斯认为，后一种革命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们最终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进行的。公社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因此要取得胜利只能指靠这些群众的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自觉行动。公社的经验也证明，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要准备好这些条件，必须要到一定的历史时期。虽然“在胜利后，统治权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却又象在1848年

那样“这又表明，甚至在那时……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①要使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取得胜利，而且能够利用自己胜利的果实。当历史发展造成有利环境的时候，社会主义政党应该进行最有力的、耐心的、不懈的工作。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唤醒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并且把劳动者中的非无产阶级阶层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因此恩格斯认为用一切方法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和形式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手段和形式就是在工会和劳动者的其他群众组织中做工作，进行宣传和鼓动，创办社会主义报刊，以及工人议员参加选举运动和议会活动。而且，恩格斯强调指出，革命社会主义者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根本特点就在于，机会主义者力图把这种活动形式变成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而社会主义者则应该使这种活动形式服从于工人运动总任务的解决，服从于达到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

恩格斯把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议会活动首先看成是宣传党的基本目的从而是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武器。参加竞选运动和利用议会讲坛，就使我们得到从未有过的机会，不仅在工人中间，而且在非无产阶级的劳动者阶层中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宣传，而选举的结果就会使党得到极大的帮助，因为这可以非常准确地表明党不但在全国，而且在国内各区的影响程度，确定鼓动工作中的薄弱地点。最后，在代议机关——即全国性议会或地方和市镇的选举机关——中出现了一个或多或少比较紧密的社会主义议员团体。这就使得为争取改善劳动者状况的具体要求而进行的斗争有了可能：实现社会立法，扩大政治权利等等。恩格斯坚持社会主义议员要为整个工人和劳动者的利益提出自己的法案，认为这是他们议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场合，社会主义议员是可以出面支持资产阶级在野党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群

^① 见本书第8页。——编者注

众和社会进步要求的建议（例如，在学校进行世俗教育、扩大选举权等等问题）。

在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政党议会活动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议员要对议会或地方政权机关中其他一切党团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恩格斯不否定同其他在野党的代表就某些问题达成个别临时协议的必要性，但强调一定要注意上述条件。在确定自己对这些政党，特别是对政府的某种提案的态度时，社会主义议员永远要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保持阶级路线的正确性，不上任何圈套。

在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恩格斯再次分析了对社会实行革命改造的斗争的和平手段和非和平手段的关系。这里再次强调了他和马克思以前一再表述过的思想：在特别顺利的条件下，如果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在决定关头用暴力行动来对付无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可以通过比较和平的道路来实现，但是形势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要求无产阶级采取最坚决的行动^①。换句话说，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掌握的手段应当非常多样，使它能随便利用其中最适合或唯一适合于某一时刻的手段。

.....

摘自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1976年俄文版，第2卷，第293—295页

（闻文译）

① 在《资本论》英文版第1卷的1886年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认为英国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社会革命；但同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和合法的革命面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7页）

自由和人民主权的旗帜

——马克思、恩格斯和现代革命

〔日〕不破哲三

恩格斯提出的三种革命类型

——书记局长，你是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活跃的时代已经是多数人革命论者，他们认为不能仅由少数骨干分子起事，而要以工人阶级为先进部队团结大多数劳动者，而在现代，他们的这一思想正在日益提上实际的日程？

是的，在恩格斯逝世前不久写作的最后一篇论文《〈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里，对多数人革命的问题作了非常有趣的论述。

——大约是逝世前半年左右写的吧

那是五个月以前。那篇导言上写有1895年3月5日的日期^①和恩格斯的签名。而恩格斯逝世正好是在五个月后的8月5日。

意味深长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提出多数人革命还是少数人革命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把革命分为三种类型加以论述的。

第一种类型可以说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少数人革命”。恩格斯认为“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也就是说，以前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属于这种类型。以前，把一个统治社会的少数人（例如封建势力）打倒，由另一批少数人（例如

^① 应是3月6日。——编者注

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建立新的阶级统治,这就是革命。诚然,法国大革命是巴黎市民以主妇为先锋通过攻占巴士底狱而取得胜利的。象这样有多数居民参加革命的情况是很多的。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也只是起了“为少数人效劳”的作用,在“代表全体人民”的假象下掌握了政权,抢走了革命胜利果实的,是所谓“赋有统治使命的少数集团”。所以人民的多数即使在革命当中暂时实现了自己的要求,最后也将被迫从属于背叛了革命的新的阶级统治之下。

——《文化评论》杂志1976年7月号上刊登了推理小说作家邦光史郎和中世史专家永原庆二关于“唯物史观与楠木正成、足利尊氏”的历史对话。不论楠木正成还是足利尊氏,他们在打倒镰仓幕府的旧制度,建立新政权方面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名副其实都是少数人的事业。并未能成为解放当时以农民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真正革命。而以足利尊氏为首的新剥削者的统治制度则以室町幕府的形式建立起来。

这是日本封建革命的一个时代,仍然是“为少数人的利益的少数人革命”。即使在这里,人民群众的参加对革命局势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说到楠木正成,我想起了学生时代开始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时,从《历史评论》杂志上读到松本新八郎的论文《南北朝内乱的若干前提》时的情况。这篇论文从畿内地方农村居民的动向说明了楠木正成为什么在千早城取胜而在湊川失败的问题。读到这篇文章,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给我留下了非常鲜明的印象。但是,不管这个多数居民的角色起过多么重大的作用,却仍然没有超出恩格斯所说的“为少数人效劳”的范围。

为了多数人利益的“少数人革命”论

恩格斯所说的第二种类型,可以说是“为多数人利益的少数人革命”。革命的目的在于实现多数人的利益,但群众本身在旧制

度下不可能具有这种觉悟，所以少数有觉悟的人领导了在自发的斗争中行动起来的大多数人进行革命，而在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通过少数人掌握政权在实际上实现多数人的要求，革命转变为多数人的自觉的运动即多数人革命这一点，将成为革命发展的可以预见的图式。

恩格斯曾经回忆说，在1848年革命当时，因为囿于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许多社会主义者或多或少都曾预想革命将按这种类型发展。

但是，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恩格斯从革命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批判了这个图式，系统地阐发了多数人革命论。相反地，布朗基始终坚持这种类型的图式，进一步把少数人革命论推向极端化。布朗基在1848年革命的二十年后，即1869—1870年写的笔记《共产主义——未来社会》中，反对在革命后实行全国性的普选制和一般的自由，而倡导由革命的巴黎掌握全部政权统治整个法国的“巴黎的执政”^①他所持的最大的理由是说在七十年间，多数人民接受了片面的反动教育，为了消除无知，使人们具有正确的觉悟，必须有很长的启蒙和教育的时间。在这里，他公开主张下列图式：不但是“把少数人的革命转变为多数人的革命”（恩格斯语），而且经过“少数人革命”，发展为“由少数人掌握的革命政权的统治”。

——这个笔记是不是所谓布朗基的“执政”理论的根据呢？

仅从《布朗基革命论集》（现代思潮社版）等书来看，布朗基用“执政”这个词来表示他自己争取的革命政权的特点，最早是在1869—1870年的这个笔记中提出的“巴黎的执政”。只要不能把时间倒转过来，那末根据这个笔记把布朗基放在马克思的执政理论的源泉的地位，就根本是不能成立的。从内容上看，让革命的

^① 我国通常译为专政。——编者注

巴黎取代人民掌握全部政权统治国家这种含意，也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执政的概念毫无共同之处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法国工人发出的号召，正是要他们克服布朗基之流认为革命可以通过“巴黎对法国的胜利”来完成这种妄想（例如恩格斯的《1877年的欧洲工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4页）。

科学社会主义的多数人革命论

最后，第三种类型是恩格斯根据他对半个世纪来他自己所参加的革命运动的科学总结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形式——“为多数人的利益的多数人革命”。

恩格斯特别在1848年以来阶级斗争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断言“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极力强调说，为了改造社会组织，建立新社会，就要参加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斗争，但如果群众不理解斗争的目标，就不会起来投身这种革命，所谓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为了预先让大多数居民集结到革命目标下进行长期而坚持不懈的工作，没有预先获得多数人民的支持，便不可能有革命的持续的胜利。

——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一直是一篇争论很多的文章啊。

是的。收到恩格斯的这篇《导言》的德国党的领导，害怕政府的镇压，发表了断章取义的摘录。大家知道，由于这给人们以恩格斯在德国专制制度下一味地提倡在合法范围内的革命这种“可耻的印象”，恩格斯曾提出过抗议。因为有这种经过，所以这篇《导言》往往从和平革命还是暴力革命这个角度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我认为这篇《导言》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恩格斯不管革命的形式如何，把通过多数人民的自觉的集结而进行的多数人革命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规律提到了首位。

恩格斯阐述说，在赢得多数的情况下，如果人民主权的民主制度通过议会表现出来，便有了推进和平发展的远景。在象德国那样实行专制统治的地方，这个多数人会同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发生冲突，所以和平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赢得多数也具有决定的重要性。革命的道路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任何场合，预先把多数人有意识地团结到革命一边，在多数人支持下掌握政权，这种从一开始就提出的多数人革命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成果。

在《文化评论》杂志上遭到驳斥的立花隆等人曾经发表过少数人革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这种谬论。这是十分可笑的，是他缺乏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富有“特高警察的教养”的表现。

“自然的”、“顺利的”政权继承

再说一点，这在我发表在《赤旗报》上的论文里也作过介绍，恩格斯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的批判，就它同多数人革命论的联系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他以前就尖锐地批评过，“恐怖统治”现象并不是革命的必然产物，在法国革命的时候，陷于过度恐怖的政府，为了自我镇静犯下了“无益的残暴行为”。他在1891年10月写给德国党的一位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联系到德国革命的远景，论述了这个问题。当时恩格斯很重视赢得多数这个方针，他甚至说从德国近二十年来选举时所得选票有了飞跃发展这一事实，用数学计算就可以确定“人口的大多数来到我们一边的时期”。在这封信中，他写道：如果“我们那象自然过程一样不可抗拒和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壮观的、坚定的发展，沿着它自然形成的轨道继续前进”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德国革命沿着这个轨道前进到把人口的多数团结到自己一边的话，那末从资产阶级的“政权继承”就可以在没有“恐怖统治”等等情况下“自然地”、“顺利地”解决。可以说，这种解决就好象熟柿子从树上掉下来一样。

当然，因为这是在既无民主共和制又无真正的议会政治的德国，所以恩格斯在“顺利解决”这个说法之后，没有忘记再加上“相对的”这个限制词。

总之，恩格斯认为“恐怖统治”是革命离开了多数人革命的自然轨道，被迫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掌握政权，在政府陷于过度恐怖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最不得人心的“偏向”。

摘自不破哲三《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82年中文版（根据日本新日本出版社1976年版译出）

（张碧清、陈应年等译）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苏〕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伊利切夫等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总结的讨论由于德国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而中断。1894年12月初，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防止政变法草案，即新的非常法草案。这不仅对社会民主党、而且对所有资产阶级在野党都是一个严重威胁。草案经第一次讨论之后，于1895年1月14日提交给委员会，然后就应在国会中再行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收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狄茨出版社编辑理·费舍的来信，信中要求恩格斯同意把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没有再版过）出版单行本，并请恩格斯为该书写一篇导言。

费舍的这一建议正符合恩格斯的心愿，恩格斯认为出版马克思和他本人在1842—1852年这一时期的著作是必要的。按他的话说，马克思的这些文章“具有巨大价值”。因此费舍的提议他很乐意接受，并立刻着手工作。恩格斯校正了第一次发表时文本中的刊误，写了注释，对著作的三章标题作了些修改，把《国际评论（三）》中的一部分作为第四章。恩格斯把这本小册子定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2月中旬恩格斯开始写《导言》。恩格斯给拉法格写信谈到《导言》的性质时说：“……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该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

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由于德国要实行危及我们的新法律，这点很重要。”^① 恩格斯担心实行这些法律会激起社会民主党人过早起义。他还考虑到，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发表马克思热情洋溢地评价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文章这件事本身，可能会给反动派以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借口。因此，力求使《导言》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但是，这些不仅在费舍看来，而且在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倍倍尔、辛格尔和奥艾尔看来还是不够的。费舍告知恩格斯，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原稿进行一定的修改，并请求恩格斯予以同意。他们的理由是那些有争议的地方会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并会使政府易于通过国会实行新的反动法律。

恩格斯在3月8日的回信中告诉费舍，他尽可能考虑他所说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多半还不同意。“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

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动，是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的这一权利”^②。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压力下，恩格斯同意对手稿的原文做某些修改，但坚决拒绝可能为用改良主义精神曲解他的立场提供根据的一切做法。他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坦率地表示自己坚决谴责把合法斗争形式绝对化和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暴力革命行动。恩格斯提醒自己的朋友们记住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他写道：“因此，当事情发展到在帝国国会开展大辩论时，你们要考虑一下，你们现在对抵制权的维护，……听你们讲话的还有老一代的革命者，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匈牙利人和英国人；‘合法的’一词很久以前在维登被删掉一事，必须严肃对待的时刻还

① 见本书第27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32页。——编者注

会到来（谁知道多快到来）。……守法——目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还是适用的，但绝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即使是口头上也罢！”^①

在这封信里，最清楚地反映了恩格斯始终一贯的革命立场，由于他考虑到当时德国的局势，甚至在自己的《导言》原稿中已未能这样明确地、充分地表述出来。

在倍倍尔和费舍的回信中，他们向恩格斯保证，他们中谁都没有想承担在任何条件下都守法的义务和宣传绝对放弃暴力行动，而他们提出修改只是因为当时德国的局势紧张。

恩格斯在1895年3月25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对他不得不对《导言》进行修改谈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②

如果恩格斯认为他的《导言》的原文由于柏林朋友的过于谨慎而“受到了一些损害”，那么，当他看到3月30日《前进报》刊登的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中，他是多么气愤。这篇社论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任意摘录，加以编辑，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恩格斯是主张采取绝对合法斗争手段的。为此，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说“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

① 见本书第34页 ——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41页。——编者注

可能就不适用了。”^①

《导言》不仅被印成小册子，而且在《新时代》上发表，恩格斯认为《导言》在被《前进报》歪曲地发表之后这样做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导言》的开头部分恩格斯对《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著作和它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强调指出，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对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力图实行的经济改造加以简要概述的公式。“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关系。”正是因为这样，“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②

在评价自己和马克思在1848—1849年确定的、并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反映的立场时，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使他们期望已经开始的伟大斗争将提高到更高阶段，并将以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告终。恩格斯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③

恩格斯确认在1848—1849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工业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不仅革命的客观前提，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时有的是许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克思的理论，这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那时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

① 见本书第51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3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6—7页。——编者注

区别的群众，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和绝望之间，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纪律、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①

恩格斯强调指出，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大多数人的革命。“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会明白这为的是，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②而为了让群众明白这点，需要长期而坚忍的工作。因此，恩格斯认为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普选权具有重大意义。他认为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③。这大大地扩大了社会主义政党进行合法运动的可能性，为它们把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和其他的劳动者阶层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创造了有利条件。恩格斯指出，虽然社会主义者在有这种可能性的地方成功地利用合法斗争手段，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权。

恩格斯告诫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益广泛，国际社会主义者的队伍迅速增长，并且他们的合法活动取得成就，但是要赢得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却并不容易，因为除了有利因素之外，还有阻碍取得胜利的因素。

恩格斯认为，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普法战争后在军事上发生的变革。他写道，现在，“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④

恩格斯分析了过去起义的经验，得出结论说，即使在巷战的

① 见本书第7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5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0页。——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11页。——编者注

典型时代，街垒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

恩格斯强调指出，自1848—1849年以来发生的变化都对军队有利。军队的数量增加了，借助铁路军队可以迅速调动，有了新的威力无比的有效力的武器。相反，对起义者来说，一切条件都恶化了。中等阶层未必会毫无例外地都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他们中的某一部分将支持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起义者方面有较多的服过役的兵士，那末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要困难得多。此外，起义者得到的武器也不能同正规军的武器相比。最后，1848年以后建成的大城市街道又长又直又宽，使新式枪炮再好不过地发挥其效力。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恩格斯提出问题并回答说，“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今后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种兵力，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到时候恐怕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①

从《导言》发表时被删去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恩格斯根本没有否定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巷战的作用，他只是强调指出，从军事技术的观点看是不利的力量对比应用其他因素来抵消：需要在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做大量准备工作，正确选择起义的时间，起义者方面要有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投入战斗，采取进攻战术。

^① 见本书第14页。——编者注

说明了在新的条件下起义的全部困难以后，恩格斯告诫德国工人要防止可能的挑战和过早出动的企图。他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取得的成功，使我们能指望它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国内一支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因此，任何没有准备的、过早发动的起义只能是对统治阶级有利。党的任务在于：“不是要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①但是恩格斯也预见到统治阶级有可能自己走上破坏宪法的道路。他说，那时社会民主党对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也就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②

《导言》的末尾稍稍透露了这个秘密。恩格斯把大约一千六百年以前在罗马帝国发生的斗争与现代德意志帝国的情况做了类比，在罗马帝国也曾有过一个“颠覆派”，“这一派人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他们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法律。他们没有祖国，是国际性的……这个叫作基督徒的颠覆派，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③。戴克里先皇帝因他军队中的秩序和纪律的败坏而惶惶不安，“他颁布了一道反社会党人法请原谅，我是想说反基督徒法”^④，这项法律没有奏效。后来对基督徒进行大规模的迫害，但其结果却是，过了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了基督徒。

恩格斯就这样用比喻的方式表述了在军队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重要性和军队革命化的必要性的思想。把尽可能多的士兵争取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从统治阶级的主要支柱军队的内部进行瓦解。这就是未来革命搏斗中极为重要的“起抵消作用的因素”。

①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8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8—19页。——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19页。——编者注

而当时在德国复杂的政治局势下，对此，恩格斯不能直接公开讲明。

可见，恩格斯反对两种同样错误和危险的极端。他警告要防止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和过早起义的企图，强调要把人民和军队中的大多数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高度评价了普选权，社会主义者的议会活动以及他们利用合法活动训练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意义。但恩格斯决没有把这些斗争形式绝对化。他强调必须利用一切形式——和平的和非和平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必须善于在适当的时候把阶级斗争从议会转到广泛革命斗争的场所。

恩格斯用很大的篇幅谈到武装起义的问题，他堪称典范，他具体地历史地看待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清醒地考虑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起义机会，无论是政治的和道义的因素，还是军事技术方面。

众所周知，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而写的导言首先遭到伯恩施坦的曲解，恩格斯逝世后，他宣称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随后《导言》又遭到第二国际其他机会主义分子的曲解。曾出现这样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导言》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在《导言》中恩格斯似乎背弃了自己和马克思的革命观点，放弃了借助革命变革夺取政权的思想，承认和平的、合法的和议会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道路。即使是当时发表的被修改过的《导言》本身，都没有给这种谰言提供什么依据。要消除这种谰言，只要把恩格斯的《导言》的原稿完整地刊登出来就足够了，更不用说上面所援引的那些信件了。但是拥有这些必要文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没有这样做。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坚决要求下对手稿所做的最重要的修改和删节于1924年第一次发表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文库》第一卷中。《导言》的全文于1930年在苏联首次发表。尽管这些文件证据确凿地驳倒了对恩格斯观点的粗暴歪曲，但是当年机会主义者所制造出来的

奇谈怪论至今仍被社会民主党的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所传播，只是不久前发表的恩格斯1895年3月8日的信件，以及费舍和倍倍尔的信才最后结束了这种诽谤性的奇谈怪论。

摘自列·伊利切夫主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77
年莫斯科版，第562—569页

（晓林译 禾子校）

政治方面

〔英〕戴维·麦克莱兰

.....

恩格斯非常警惕地反对一种倾向的干扰，这种倾向“想将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取消”，并且“公开声明，工人们受教育太少，他们不能解放自己，而必须由慈善的大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从上面来给他们自由”。尽管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迫使党在整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处于半秘密状态，但恩格斯还是源源不断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被查禁的刊物写了许多文章。结果，这个迫害时期使党更加激进，并且促进了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正式政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随之促进了选票的稳步增长。1877年为493,000票，在国民议会中占12个席位，到1893年选票几乎达200万票，占44个席位。在事态这样进展的鼓舞下，恩格斯在1891年断言，德国党将在1898年取得政权。这个胜利是指日可待的，他甚至画了张图表来说明。特别引起恩格斯重视的是军队中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他在1892年写道：“今天，五名士兵中有一名是社会主义者，要不了几年将是三名中有一名了。到了本世纪末，在这个曾是德国大普鲁士主义的堡垒的军队行列里将充满了社会主义者。什么事情也阻挡不住这命中注定了的事变的进程。”^①

这种对事变进程的信念和党内广泛传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已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1—292页，行文与原著略有不同。——编者注

表明无产阶级的力量必将增长和取得胜利的看法，使人们更强调和平的观点，而不是过去恩格斯大加鼓励的革命的观点。革命的概念同资本主义崩溃的概念相混淆，这意味着一个社会不是被推翻，而是被继承。但是，尽管对德国党的领导人说来，放弃使用暴力几乎成为绝对的了，从而使他们或是寄希望于取得议会多数（伯恩施坦），或是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自行崩溃（倍倍尔），但是对恩格斯来说，这种节制使用暴力勿宁说仍是一种策略。这种不同的态度，在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阶级斗争》再版写的导言中有了很好的说明。由于恩格斯于这篇文章发表后几个月就逝世了，所以许多人把它看作是他的政治遗嘱。特别是伯恩施坦非常强调这篇文章，作为对他自己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支持。的确，恩格斯在他这篇文章中宣称：“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方面都已经过时了”^① 恩格斯在评论他和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所持的观点时，承认“历史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藉以进行斗争的条件。”^② 选举权已经“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③ 其必然的结果是：

在罗曼语族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④

恩格斯十分强调在合法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大量增加党员，并且“长得身强力壮，满面红光”，他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

① 见本书第5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5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0页。——编者注

④ 见本书第15页。——编者注

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是要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① 伯恩施坦（以及同意他的那帮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多数人）则宣称，恩格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颂扬普选权和议会活动，把这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并且放弃了通过革命动乱夺取政权的主张”。

只是最近才清楚，恩格斯文章中比较革命的段落被谨小慎微的柏林的领导人删掉了，而恩格斯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以这种形式发表的。恩格斯写道：“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②

然而，尽管恩格斯没有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从根本上修正他关于合法性和革命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态度在几个问题上是有严重错误的。首先，虽然他对党的革命目的在思想上比他德国的同事们更为明确，但他的确在现行政策和革命目的之间设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例如，他把他直接参加制订的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截然分割为两个独立的部分（理论的和实践的）。其次，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看法过于公式化。在他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是加强本身的组织，以致能够迫使资产阶级继续忠于他们自己的自由原则，因为这样取得的政治自由只能有助于无产阶级的发展。但是，他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对改革的热情，而很少考虑到它还有愿意同统治势力妥协的一面。恩格斯也没有密切注意他自己党内的广大党员的态度，这个党的党员中小资产阶级占有很高的比例，至少他们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他没有看到，党的组织、工会的机构以及实

①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32页。——编者注

际上许多普通的党员在将来任何革命动乱中将会遭受巨大损失。产业工人，即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是极少数。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了解只限于该党的领导人，这就使他忽视了经济斗争的重要性；他对英国工会不予重视，对总罢工的主张不予考虑，这就使他刻板地在合法活动和街垒战二者之间进行选择，而对分散的、基层组织的活动不感兴趣。

但是恩格斯的注意力决不是仅仅限于德国，他同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的通信表明，他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是多么灵活机动，多么见多识广。……

摘自戴·麦克莱兰《恩格斯传》，1977年哈佛出版
有限公司版，第49—52页

（禾子译 闻文校）

对普选估价方面的修正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

有关民主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上和现实中也涉及对普选的具体估价这一方面。列宁在关于国家的著作里，依据恩格斯的观点断言，普选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①

这是共产党人和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对普选价值的观点，这种观点排除了革命力量通过普选取得政权的一切可能性。许多共产党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榜样的鼓舞下诞生的。在十月革命中武装起来的群众摧毁了一个腐朽的国家，他们并没有利用普选。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上述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些党是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并曾和它斗争过，因为在那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恰恰是通过选举才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他们不仅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背叛国际，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如果没有忘记这一点的话，上述观点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否定普选的观念，通过遭受象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法西斯之害的经验教训得到了证实。在那两个国家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伙同另外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器，通过议会方式取得政权，接着就践踏民主自由。这个经验教训一开始就导致革命力量对民主手段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

^①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8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页。

但实际上，法西斯经验教训所证实的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注意的，并不是普选和民主道路有没有用的问题，而是工人阶级的经验教训：当时工人阶级的分裂使工人阶级软弱无力，不能团结一致并把劳动阶层和中产阶层团结在自己周围，利用民主手段，依靠民主手段，甚至使用暴力来对付危险。

因为最终工人阶级吸取了教训（这是那个时期的人民阵线政策的实质所在）：必须团结起来，同其他劳动阶层组成联盟，所以也认识到民主自由的内在的价值，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他们又一次作出了最痛苦的牺牲。

1894—1895年发表的恩格斯的一篇著作重新具有了现实意义。这就是他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恩格斯解释说：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①

相类似的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仅是我们）长期以来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西欧各国展开活动的，而我们没有去考虑产生十月革命的客观条件。

恩格斯继续写道：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藉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②

接着，恩格斯详细说明，以往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是一部分少数人对另一部分少数人的事业，而人民参加这种事业，或者是有利于其中一部分人，

① 见本书第4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5页。——编者注

或者是安然接受他们的统治。但是，除了象1789年的革命那样的特殊情况外，广大人民群众并非是积极的参加者。

恩格斯称为“大大过时了”的筑垒的巷战方式是适于这类革命的。他又说：“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就是说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胜利一样，是极其罕见的。”^①

恩格斯阐明的这论断的理由，我不再加以重复。当然，他没有排除革命的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就象今天，甚至在主张民主道路时，如果面临历史的危机关头，也都不完全排除统治阶级的暴力挑起这种可能性。无疑，当时恩格斯就已把国家之间战争条件的变化，与阶级斗争中发生的变化联系起来。

但是，接着恩格斯就强调了德国工人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②

恩格斯又说：

“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能估量我们行动分寸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宜的退缩，又可避免不适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非常非常足够了。但是它的好

① 见本书第11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0页。——编者注

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时，它给了我们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的独一无二的手段，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① ……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②

恩格斯继续论证，认为在缓慢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把广大民众争取到革命主张上来的过程中这条道路是必须的，而没有民众的直接参加，彻底改变社会组织是不可设想的。

恩格斯又说：

“我们在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赢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并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是要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③

就是说，早在上个世纪，而且在欧洲的这个几乎是唯一的和

① 见本书第10—11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1页。——编者注

③ 见本书第16—17页。——编者注

特殊的德国的例子的基础上（在当时的欧洲，工人阶级还远没有今天的力量，文化力量还不算是革命因素，还没有目前的历史经验，也没有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和非殖民化的胜利），恩格斯就给普选制赋予了会使今天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喧嚷不休的长处。在这方面，恩格斯又说：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面带红光，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①

也就在这篇著作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原始基督教进行了生动的对比。

显然，自从恩格斯写下这些论点以来，自从列宁只把普选看作工人阶级政治成熟的标志以来，欧洲和世界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致今天我们在谈到欧洲发达国家时，不能停留在同样的限度内。

普选不是包治百病灵丹妙药，不是劳动人民和文化力量的政治行动的唯一方法。但是，由于我们上面论述的理由，在今天的欧洲，社会主义力量可以通过普选首先进入政府，然后执政，而且如果通过定期向选民征询意见能够保持人民的信任，就可以继续维持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

摘自《“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1977年巴塞罗那版，第117—122页

（钟琦译 禾子校）

① 见本书第17页。——编者注

恩格斯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 第一个修正主义者

〔联邦德国〕奥西普·K·弗莱西泰因

六

再回过来谈恩格斯。对他来说，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从纯理论上修改或“修正”旧观点的问题。全部理论分歧同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所强调的侧重面的转移相一致，并非偶然。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不断革命”的期望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十九世纪后三十年，他们亲自看到了西欧开始有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尽管是极其有限的。如果说，工人运动向广度发展了，那么，只要看一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就够了——这位年迈的恩格斯又象他年青时那样乐观了。如果他对胜利的信心稍有不足，也许就会把自己曾经作出过的一种考虑作为他对未来的期望了——而且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然而，恩格斯本人曾这样指出：“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有一个危险的颠覆派活动过。这一派人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法律，他们没有祖国，是国际性的；他们散布在全帝国各处，从高卢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来进行报复。……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

帝，则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了。”^①

事实上，这一类比还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基督教派的分裂。当时，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教派，二者都不能完全将对方排挤掉。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流血斗争以后开始了一个“和平共处”时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确，还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设想，在宗教改革的最初年代新教徒同天主教相比代表着比较进步的革命力量，那么他们很快也就丧失了这种特点。随着基督教国家教会的创立，他们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了。另一方面，在所谓的反宗教改革中，天主教会使自身得到了更新。1648年前后，在各种不同的教派之间几乎不再存在原则上的区别，它们都是以相同或相类似的方式创立起来的。而随着革命活力的消失，这种分裂状态也就最终确定下来。随着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产生，一种新的、积极向上的力量才又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这种力量开创了一种不同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第三条道路。假如当时有人向恩格斯这样说道：把社会主义变为“国教”将不会象他设想的那样发生在德国、法国、英国或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落后的俄国或农业国中国，而且同313年基督教的胜利一样，其表面的“胜利”至少意味着内在的失败，那么，这位终生的乐观派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在他那篇颇有争议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他首先对起义者在巷战中胜利的可能性作了考察，指出自1849年以来一切情况都发生有利于军队的变化。“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②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却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不可遏制的，并且是平稳的，就象自然界中的某种

① 见本书第18—19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15页。——编者注

过程一样。政府对此进行的一切干预，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己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赢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并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①

所以，恩格斯一再警告要避免采取盲目行动，因为当权者会以此作为借口来消灭德国社会民主党，而通过和平发展它将很快就可取得胜利。（因此1893年就这样估计：“……十年”或“本世纪末”^②。同时，他自相矛盾地认为，这个党一方面是软弱的，敌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使它受到严重损失；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是强大的，“它几乎能象数学那样准确地确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③。这样，在年迈的恩格斯身上也表现出德国政策所特有的那种缺乏现实感的错误。

如果说，马克思在1872年在海牙就已说过：在英国、美国或许也在荷兰工人们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那么，这位年迈的恩格斯则于1891年这样宣布：虽然在半专制制度的德国不推翻现存政权实现不了社会主义，但在共和制国家却是可能的：“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④恩格斯在他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的另一个地方简明扼要地说道：“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

① 见本书第16—17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9—630页。——编者注

③ 同上书，第290页。——编者注

④ 同上书，第273页。——编者注

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①

摘自奥·K·弗莱西泰因《从马克思到科拉科夫斯基》1978年科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74—76页

（高爱贺译 籍维立校）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74页。——编者注

关于《导言》争论的经过——结束语

〔日〕淡路宪治

作为对《导言》的解释，关于上面我们讨论的“决战”与和平过渡的关系问题，最后我本人还要强调一点。那就是，恩格斯的着眼点在于：由于与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那时情况不同，不应再进行由贸然蛮干的少数人来领导的突击战和街垒战，而应该在普选权条件下利用选举战和议会活动等合法手段，去争取人民的大多数。这就是党活动的最高命令。如果根据这种观点，那么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的以突击战和巷战为象征的那种革命模式就被1895年的这篇《导言》全然否定而放弃了。这样，便否定了以1789年至1830年法国革命历史进程为模式的革命运动的想法，而断定“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而列宁于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撰写的《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所强调的想法，与上述恩格斯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论断就大大背离了。列宁的主张是：

“由罢工示威进而构筑个别街垒。由个别街垒进而构筑大批街垒，再进而同军队进行街头战。许多组织都没有想到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斗争会由罢工发展成起义。这是俄国革命在1905年十二月事件中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果。”^①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52页。——编者注

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不应当展开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①

同列宁的主张对比，恩格斯关于革命斗争的模式的主张，就具有不同的性质了。确实他在《导言》里也提出了“决战”和“公开进攻”的问题，然而这毕竟是在确认“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观点上提出的，主张利用议会合法手段，争取人民的大多数，以确保巩固的地位，使党取得胜利，即与卢森堡所说的“纯议会主义论”，“唯议会主义论”是一样的。而且，如果我们从始终贯彻《导言》的逻辑出发，即《导言》最为重视利用合法手段的议会活动，争取人民的大多数到党的方面，那么“决战”和“公开进攻”对“唯议会主义论”来说就只不过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因而《导言》中关于“决战”和“公开进攻”的主张与列宁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所强调的主张，不能认为性质相同，或占有相同的地位，或如梁赞诺夫所认为的那样，预见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恩格斯认为，正如1848年的突击战没有成功一样，1871年所取得的胜利同样没有获得成果，觉悟的少数人率领未觉悟的民众强行革命的时代，进行突击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七十五岁的老年恩格斯在他逝世前半年，面对最后的局面，而回顾、考察和总结了他和马克思全力参与战斗过的1848年革命以及此后欧洲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的半个世纪的历史。他在这篇《导言》中以深刻自我批判精神阐述了他的主张，其核心正是基于这点考虑的。换言之，恩格斯所设想的“决战”，其有效的不可缺少的前提也正在于通过议会争取人民的大多数，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决战”问题的。进而言之，是否能进行“决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取决于能否将确信胜利的自觉的大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53页。——编者注

多数人争取到党的方面来。

摘自淡路宪治《西欧革命和马克思、恩格斯》，1981
年未来社初版，第287—289页

（韩文臣译 刘焱校）

原书空白页

人名索引

A

阿德勒, 维克多 (Adler, Victor 1853—1918)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1839—1895年曾与恩格斯通信;《工人报》编辑, 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第38页。

阿多拉茨基, 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 (Адорат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Викторович 1878—1945) ——三十年代曾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 1932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写有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方面的著作。——第172页。

艾伯特, 弗里德里希 (Ebert, Friedrich 1871—1925) ——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之一, 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 1912年起为帝国国会议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沙文主义派的领袖; 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初期任总理。——第98页。

奥艾尔, 伊格纳茨 (Auer, Ignaz 1846—1907)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鞋匠;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 曾多

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后来转到改良主义立场。——第115、175、252页。

奥古斯特——见倍倍尔, 奥古斯特。
——第30、36、38页。

B

巴尔福, 阿瑟·詹姆斯 (Balfour, Arthur James 1848—1930) ——英国国务活动家, 外交家, 保守党领导人之一。——第101页。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俄国革命家和政论家,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第一国际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 在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第205页。

巴拉奇 (Barachi) ——英国共产党人。
——第151页。

巴罗, 奥迪隆 (Barrot, Odilon 1791—1873)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首领; 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第17、48、200、268页。

邦光史郎 (生于1922年) ——原名是田中美佐雄, 日本作家, 文艺家协会和推

- 理作家协会成员。——第246页。
- 保尔(Paul)——见辛格尔。——第30页。
- 保尔, 埃登(Paul, Eden)——英国共产党人。——第138、139、151、154页。
- 保尔, 瑟达(Paur, Cedar)——英国共产党人。——第138、139、154页。
- 博古斯拉夫斯基, 阿尔伯特(Boguslawski, Albert 1834—1905)——德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镇压波兰起义(1863—1864);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积极为德国民族主义报刊撰稿。——第16、18、28、33、34、43、126页。
- 倍倍尔, 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施工; 1867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 第一国际成员, 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 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 捍卫巴黎公社; 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 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中派性质的错误。——第10、36、64、88、92、96、108、114、136、153、166、167、170、181、195、205、207、215、216、223、236、249、252、253、259、261页。
- 倍倍尔, 尤莉娅(Bebel, Julie 1843—1910)——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妻子。——第38页。
- 俾斯麦, 奥托(Bismarck, Otto 1815—1898)——公爵, 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和驻巴黎大使; 普鲁士首相; 北德意志联邦首相和德意志帝国首相;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工人运动的死敌, 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5、8、10、18、33、110、127、166、205、218、220、222、238、239页。
- 彼得逊, 埃利斯(Peterson, Ellis)——第137页。
- 比尔, 麦克斯(Beer, Max 1864—1943)——德国社会主义历史学家,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属左翼(青年派); 长期侨居伦敦, 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驻伦敦记者, 写有《社会主义和社会斗争史》、《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学说》等著作。——第100、113页。
- 伯恩施坦, 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 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55、58、60、61、63、64、65、66、69、70、105、106、107、113、119、120、129、130、136、144、14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75、181、187、188、192、202、217、231、237、240、258、261、262、页。
- 伯杰, 维克多·路易(Berger, Victor Louis 1860—1929)——美国社会党人, 美国改良主义的社会党的领导

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和平主义立场；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反对美国政府承认苏维埃俄国。——第134页。

勃兰特，维利 (Brandt, Willy 生于1913年) ——原名赫伯特·弗拉姆 (Herbert Frahm)，1964年起任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曾任总理，1949—1957年和1969年为联邦议院议员。——第205页。

勃朗塔利，尤利乌斯 (Braunthal, Julius) ——第194页。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第3、8、9、10页。

波诺马廖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Пономарёв,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生于1905年) ——曾任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国际部部长，苏联科学院院士，教授，主编《苏共党史》(多卷集)，写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方面的著作。——第242页。

博维奥，卓万尼 (Bovio, Giovanni 1841—1903) ——意大利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和反教权主义者，1876年起为议会议员，那不勒斯的大学教授。——第195页。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 (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 ——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5月12日

起义的组织者，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领袖；曾多次被判处徒刑；巴黎1870年10月31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第9、247页。

布朗热，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 (Boulanger, George-Ernest-Jean-Marie 1837—1891) ——法国将军，政治冒险家，陆军部长 (1886—1887)；企图依靠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动在法国建立自己的军事专政。——第212页。

布卢尔 (Bloor) ——第134页。

不破哲三 (生于1930年) ——原名上田建二郎，不破哲三是他的笔名，日本共产党众议员；从1970年日共十一大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书记处总书记；写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意识形态》和《科学社会主义和执政问题》等著作。——第245页。

C

查钦 (Чачин, Б.А.) ——苏联历史学家。——第194页。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 ——英国国王 (1625—1649)，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80页。

D

大卫，爱德华 (David, Eduard 1863

—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之一,《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经济学家。——第98、223页。

戴克里先(Diocletianus 245左右—313)——罗马皇帝(284—305)。——第19、73、170、257页。

谈路宪治(生于1921年)——日本学者,著有:《富士县地主阶级与其他产业的关系》、《马克思论后进国家革命的状况》和《西欧革命和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第273页。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1844—1918笔名为尼古拉—逊 Николай-Сон)——俄国经济学家,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多年通信联系,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第一卷是和格·亚·洛帕廷合译的)。——第216页。

德布兹,尤金·维克多(Debs, Eugene Victor 1855—1926)——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领导该党左翼,曾五次被提名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美国参战,1918年因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被判处十年监禁。犯过一些机会主义错误。——第134页。

德莱昂,丹尼尔(De Leon, Daniel 1852—1914)——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思想家,政论家,曾同美国工会运动的反动机会主义领

导人进行斗争,对工人运动作出很大贡献,同时也犯过宗派主义的错误。

——第152页。

邓克尔,赫尔曼(Dunker, Herman)——美国工人党人。——第135、138页。

狄金逊,哥尔德沃思·娄韦(Dickinson, Goldsworthy Lowes 1862—1932)——英国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著作家,曾任剑桥大学历史学讲师。——第100页。

杜德,帕姆(Dutt, R. Palme 1896—1974)——英国共产党前副主席,曾任英共机关报《劳工月刊》主编,写有:《列宁生平和教导》、《世界政治,1918—1936》、《共产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原理》及《当代历史的几个问题》等著作。——第143、149、150、152、153、154、155、156页。

F

费舍,理查(Fischer, Richard 1855—192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记者,职业是排字工人,党的执行委员会书记(1890—1893),国会议员(1893—1926)。——第30、31、32、36、39、40、114、170、172、173、175、182、191、221、251、252、253、259页。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派首领之一,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217、223页。

弗兰尼茨基,普勒德拉格(Vranicki, Predrag生于1922年)——南斯拉夫的著名学者,曾任南斯拉夫哲学协会主席,萨格勒布大学校长;写有:《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人与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史》等著作。——第188、页。

弗莱西泰因,奥西普(Flechthein, Ossip K.生于1909年)——联邦德国人,生于俄国的尼古拉耶夫,研究法学和政治学,曾任柏林高等学校政治学教授。——第269页。

弗里茨(Fritz)——指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第15、168页。

G

格姆科夫,海因里希(Gemkow, Heinrich)——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第227页。

格诺伊斯,克里斯蒂安(Gneuss, Christian)——联邦德国博士。——第181页。

格拉古(凯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C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53—121)——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23—122),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之弟。——第18页。

格拉古(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

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公元前163—133)——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33),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第18页。

H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118页。

海伍德,威廉·达德利(Haywood, William Dudley 1869—1928)——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党人,该党左翼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加入美国共产党。——第134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58页。

黑森选帝侯,即威廉第二(Wilhelm II 1777—1847)——黑森-加塞尔选帝侯(1821—1847);1813—1814年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17页。

霍亨洛埃-席林格菲尔斯特公爵,克洛德维希(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Chlodwig, Fürst zu 1819—1901)——德国国家活动家,德意志帝国首相(1894—1900)。——第167页。

J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74页。

加德纳, 赛米尔·罗森(Gardiner, Samuel Rawson 1829—1902)——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80页。

君士坦丁(Constantinus, Flavius Valerius 274左右—337)——罗马皇帝(306—337)。——第19、73、187、269页。

K

卡里略, 圣地亚哥(Carrillo, Santiago生于1915年)——西班牙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曾任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总书记。——第264页。

卡诺, 玛丽·弗朗斯瓦·萨迪(Carnot, Marie-François-Sadi 1837—1894)——法国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历任部长; 共和国总统(1887—1894), 1894年被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刺杀。——第90、167页。

卡普里维, 列奥(Capriivi, Leo 1831—1893)——伯爵, 德国国家活动家

和军事活动家, 将军, 德意志帝国首相(1890—1894)。——第167页。

康普夫麦尔, 保尔(Kampffmeyer, Paul 1864—1945)——德国新闻工作者;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 九十年代初为“青年派”领导人之一; 后为修正主义者。——第195页。

考茨基, 卡尔(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政论家,《新时代》杂志编辑,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 写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著作。虽然著作中有错误, 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 后来他完全转到机会主义立场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派的思想家;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第41、50、63、66、67、78、97、105、106、107、116、130、131、132、135、145、150、154、155、158、159、160、161、162、163、170、179、181、192、202、230、236、253页。

克勒尔, 恩斯特·马提阿斯(Koller, Ernst Matthias 1811—1928)——德国国家活动家, 属保守党, 国会议员, 1894—1895年为普鲁士内务大臣, 实行迫害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第19、114页。

科坦, L.(Cotton, L.)——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人。——第148页。

库恩, 亨利(Kuhn, Henry)——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人。——第120、

136、137、150、155页。

L

拉法格, 保尔(Lafargue, Paul 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 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 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 《社会主义者报》的编辑; 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和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 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第27、51、106、161、163、170、174、179、192、194、201、209、212、221、229、251、253页。

拉法格, 劳拉(Lafargue, Laura 1845—191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 186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 曾积极参加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第42页。

拉萨尔, 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律师; 1848—1849年参加莱茵省的民主运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动, 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创建人之一; 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10、184、205

页。

莱文, 诺尔曼(Levine, Norman)——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大学历史系教授。——第236页。

立花隆——日本历史学家。——第249页。

李卜克内西, 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第一国际会员, 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 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 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 捍卫巴黎公社; 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 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0、51、80、107、119、145、153、154、155、173、174、179、188、192、194、202、205、219、253页。

梁赞诺夫(戈尔登达赫), 达维德·波里索维奇(书呆子)(Рязанов(Гольдендах), 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Буквоед)1870—1938)——早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著作家集团“斗争社”的组织者之一; 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从事工会工作; 1921—1931年任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 1931年被开除出

党。——第105、112、113、114、115、117、118、120、126、127、129、132、135、136、137、138、139、151、152、155、157、158、159、160、274页。

林泰伦,维克多(Rintelen, Victor)——博士,德国中央党在帝国国会中的议员。——第30页。

隆斯基,M.J.(Lonsky, M.J.)——第121页。

吕贝,彼得(Lübbe, Peter 生于1930年)——曾从事出版工作,在大学任教。——第128页。

卢森堡,罗莎(Luxemburg, Rosa 1871—1919)——波兰、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对伯恩斯坦主义积极进行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起建立德国国际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1918年投身于十一月革命运动,1919年1月被谢德曼政府逮捕、杀害。——第60、93、112、113、118、121、145、235、274页。

律斯勒,康斯坦丁(Röbber, Konstantin 1820—1896)——德国政论家和官员;他以柏林半官方的书籍出版局领导人的身分替俾斯麦政策作辩护。——第18、28、43、126页。

罗素,查理·爱德华(Russel, Charles Edward 1860—1941)——美国社会党人,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纽

约的美国人》杂志的文学编辑之一,主张美国参加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第134页。

M

马沙尔(Marschall)——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外交国务秘书。——第216页。

迈尔,古斯塔夫(Mayer, Gustav 1871—1948)——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曾任布鲁塞尔大学、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拉萨尔遗著的出版者;写有恩格斯的传记、社会主义史和工人运动史方面的著作。——第166页。

迈斯纳,奥托·卡尔(Meissner, Otto Karl 1819—1902)——汉堡出版商,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著作。——第3页。

麦克莱兰,戴维(McLellan, David)——英国肯特大学的政治理论教授,在欧美一些大学讲授政治学,写有:《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前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等著作。——第260页。

麦克马洪,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1808—1893)——法国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元帅,波拿巴主义者;普法战争中在色当被俘,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

一，凡尔赛军队总司令，第三共和国总统。——第8页。

曼斯，鲍尔(Manns, Paul)——第115页。

梅林，弗兰茨(Mehring, Franz 1846—1919)——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马克思传的作者，《新时代》杂志编辑之一；戏剧团体“自由人民舞台”秘书；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在创建德国共产党时起卓越的作用。——第153页。

弥勒，汉斯(Müller, Hans生于1857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侨居苏黎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九十年代初为“青年派”首领之一。——第195页。

米尔巴赫，奥托(Mirbach, Otto)——普鲁士的退伍炮兵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城防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43页。

N

纳齐(Nazi)——见奥艾尔，伊格纳茨。——第30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

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205页。

楠木正成(1294—1336)——即楠木成，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南朝武将，拥护后醍醐天皇，灭北条氏，参与“建武中兴”；于1336年足利尊氏再起时自杀。——第246页。

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1868—1918)——俄国皇帝(1894—1917)。——第16、186页。

诺比林，卡尔·爱德华(Nobiling, Karl Eduard 1848—1878)——德国无政府主义者；1878年谋刺威廉一世未遂，政府借此实行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211页。

P

佩罗特，米歇尔(Perrot, Michelle)——法国历史学家。——第199页。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民粹派；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组织者，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了孟什维克的首领。——第69、273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

员。——第9页。

R

饶勒斯, 让 (Jaures, Jean 1859—1914)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历史学家; 法国社会党改良派的领导人; 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 1905年起为法国统一社会党右翼的领袖之一; 该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的创办人和主编; 积极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 1914年被沙文主义者刺杀。——第202页。

S

山本统敏 (生于1937年) ——日本国际问题专家, 编有《第二国际的革命论争》。——第232页。

施潘, 彼得 (Spahn, Peter) ——德国中央党政治家, 帝国国会议员, 1917—1918年担任普鲁士司法大臣职务。——第30页。

施泰因贝格, 汉斯·约瑟夫 (Steinberg, Hans Joseph) ——联邦德国哲学博士, 现为波恩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研究人员, 写有《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著作。——第208页。

斯帕戈, 约翰 (Spargo, John 1876—1966) ——美国社会党人, 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后退出该党; 参加创建美国劳工和民主联合会以及民族主义党; 反对布尔什维主义; 写有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著作。——第134页。

松本新八郎 (生于1913年) ——日本大学文学部教授, 工人教育协会理事, 写有《中世纪社会的研究》、《日本历史人物》等著作。——第246页。

T

塔尔塔科夫斯基, Б.Г. (Тартаковский, Б.Г.) ——苏联历史学家。——第197页。

特拉赫坦伯格, 亚历山大 (Trachtenberg Alexander) ——美国工人党人。——第129、130、132、133、135、136、137、138、139页。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内务大臣, 首相;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政府首脑 (内阁总理), 共和国总统,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8页。

屠拉梯, 菲力浦 (Turati, Filippo 1857—1932) ——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 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后为社会党改良主义右派领导人之一。——第195页。

托洛茨基 (勃朗施坦)·列夫·达维多维奇 (Троцкий [Бронштейн],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1879—1940) ——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 组织“八月联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区联派集体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曾任

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等职；后因进行反党活动，并与季诺维也夫结成“托季联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后被驱逐出境。——第122页。

W

威廉(Wilhelm)——普鲁士国王。——第8页。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国王(1861—1888)和德国皇帝(1871—1888)。——第8页。

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1888—1918)——第166、218、220页。

温特林格汉，T.H.(Wintringham, T.H.)——第144页。

X

希尔奎特，莫里斯(Hillquit, Morris 1869—1933)——美国社会党人，起初倾向马克思主义，后转向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1888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分裂后成为美国改良主义的社会党的创建人之一(1901)，1904年起为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委员，参加过第二国际几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仇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第134页。

小威廉——见威廉二世。——第166、220页。

谢德曼，菲力浦(Scheidemann,

Philipp 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人之一，190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1911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反对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第98页。

辛格尔，保尔(Singer, Paul 1844—191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87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884年起为国会议员，1885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30、153页。

叙德库姆，阿尔伯特(Sudekum, Albert 1871—1944)——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人之一，1900—1918年是帝国国会议员。第一次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1920年任普鲁士财政大臣。——第121页。

Y

约翰逊，奥利夫·M.(Johnson, Olive M.)——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人民周刊》编辑。——第138页。

伊利切夫，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Ильичев, Леонид Федорович 生于1906年)——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博士，曾任《布尔什维克》杂志和《真理报》主编，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外交部副部长，苏共检查委员，写有《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

步和国际关系》、《列宁传》等著作。
——第251页。

永原庆二（生于1922年——日本经济学博士，曾任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日本封建社会论》、《日本封建制形成的研究》。——第246页。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约60—140) ——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18页。

Z

足利尊氏（1305—1358）——本名高氏，日本室町幕府第一代将军。在后醍醐天皇的“建武中兴”中功列首位，赐名

尊氏，1336年另立光明天皇于京都（北朝），后醍醐奔走吉野（南朝），这成为日本南北朝对立之始。——第246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国际和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侨居美国，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联合委员书记，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1872—1874），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1876）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166页。